



李雪峰回忆录  
（上）  
——太行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 目 录

代 序 .....	陶鲁笳(1)
一、走上革命道路 .....	(1)
二、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 .....	(17)
三、从石家庄到阳泉 .....	(21)
四、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	(24)
五、部署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 .....	(29)
六、根据各地特点分区指导工作 .....	(38)
七、传达六中全会精神.....	(56)
八、统一全区群众抗日组织 .....	(62)
九、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 .....	(71)
十、有理、有利、有节开展反顽斗争 .....	(79)
十一、黎城会议与根据地的统一 .....	(90)
十二、第一次整党与实验县工作.....	(102)
十三、根据地内的民主建设与边区政府成立 .....	(111)

DJ11/34

十四、大规模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发动 .....	(128)
十五、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	(147)
十六、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与加强党的一元化 领导 .....	(171)
十七、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	(184)
十八、开展生产度荒与大生产运动 .....	(238)
十九、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	(253)
二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275)
二十一、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与巩固新区的 工作 .....	(285)
二十二、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 .....	(296)
二十三、结束在太行的工作，随同刘邓大军南下 ...	(322)
 后 记 .....	 (332)

## 一、走上革命道路

在回顾太行山 10 年的工作经历前,先谈谈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运城地区永济县(现已改为永济市)。永济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相传中的舜曾在此建都。

我于 1907 年 1 月 19 日(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六)出生在永济任阳村。我出生时家境比较富裕。在我 5 岁时开始上私塾,老师是位老秀才,人很好,有学问。读私塾 5 年,接受了启蒙教育。1917 年我到永济县第五高等小学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学校老师给我们讲五四运动,讲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如何妥协。我们认为对那些卖国贼该反、该打,大家议论纷纷。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宣传爱国思想,实际上都是老师讲的。什么叫爱国思想,我们自己并不清楚。

1922 年,我从五高毕业,那时 14 岁。我一门心思想到省城太原读书,家里却想让我做事,结果我在永济县当了小学教员。1923、1924 年教了两年书,1925 年教了一个学期。经过一些曲折和个人的努力,在亲友的帮助下,我

考上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是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创办的。阎锡山早年留学日本，崇尚军国主义。他极力鼓吹日本的军国主义理论，主张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他办国民师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军国民思想的小学教师。因此在该校中专门设有军事课，配备有军事教员。开始是军事编制，班叫队，两年制。徐向前就毕业于这种两年制班。后来学制改为5年，队改为班。薄一波、程子华他们是五年制班的学生。到我进入国民师范时又改为6年制，分前期师范、后期师范。前期3年学基础课；后期3年学专业课，分为文史科、艺术科。学校校长是和阎锡山一起留学日本、一起搞国民革命的赵戴文。学校管理很严，课程除了军事课、文化课外，还办有实习工厂、农场，让学生实习。我在校时曾在制笔厂实习，学习怎样造毛笔。学校全部官费，每年发统一制服，每月发三块八银元饭费。

在国民师范6年，是我真正开始认真读书的时期。在前期师范的3年中，我偏向于文科，对作文、诗集感兴趣。到后期师范时，我自然选择了文史科，把精力放在文史方面。这一时期开始读的书以国学为主，没有人指导，从书里边找书，范围也大。

这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太原的革命也轰轰烈烈，国民师范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因此，我已不可能闭门读书。这一时期我还没有投身到大革命的行动中去，但也看了一些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小册子，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有关“解放”与“革命”等内容的书报。当时对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一套从思想上讲很反感，而对学术、学者比较尊重。

我从读文史类书中逐渐接触到自然科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地质学、天文学、心理学方面的，甚至还看了一些技术性方面的读物。那时求知欲特别高，只要抓到一本书，总想把这本书看完，但是，很难都理解。对我思想影响大的书中有一本《科学概论》，作者叫任鸿俊。我看的是上卷（下卷没有再出），主要讲科学方法。这时还看了克鲁泡特金的书。这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很有知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他讲无政府主义是从生物讲起的。我在读了一段自然科学的书后，转向逻辑学。由于思想没有成型，什么都想看一看。确实如人们常说的“饥不择食”。由于腹中知识贫乏，拼命想利用在校期间的有利条件多学习一些知识。

大约在1929年，国民师范的月刊约我写文章。此前我已给他们写过一篇题目叫《封建势力与中国》的文章。编辑部给我的题目是写有关民生史观的文章。民生史观是孙中山提出的，我读了许多孙中山的书。这时我刚读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而且写文章还可以有稿费，就答应了。这一篇讲孙中山民生史观的文章，他们要求写2万字。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写了8万字，内容是用唯物史观驳民生史观的，同编辑部原来要求写成以民生史观批判唯物史观的意见正好相反，我就没有交给他们。

1929年以后,我开始转到读哲学书籍。从科学到哲学的转变是从读罗家伦的《科学与玄学》一书引起的。在这本书中,他没有正面否定科学,但强调玄学。玄学就是哲学。当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哲学,是唯心论的哲学。他认为任何科学都离不开玄学。这就引起我读哲学书的兴趣。我从读书中开始转到哲学,再从哲学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是我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过程。

我讲以上这些是想说明,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以前,头脑中曾有过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我是在接触正面的、反面的、唯物的、唯心的等知识的过程中,在摸索、比较中走上革命道路的。

读哲学书时,开始主要是读唯心主义的哲学书。由于当时我很相信科学,慢慢地对唯心主义有了怀疑,唯物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当时理解的唯物论实际是机械唯物论。我前面讲过,曾写过一篇8万字的文章,用唯物论(实际是机械唯物论)专批民生史观的唯心论。当时,把孙中山的书,凡是能找到的都看了,对他讲的三民主义,我基本上弄清楚了。读哲学书时,也读哲学史,读唯心论、唯物论的原著,思考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为什么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讲到生产力,讲到人,讲到生产关系,讲到上层建筑。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从古到今,社会都是靠人推动发展的。唯物史观就是分析人的社会,所以马克

思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1931年秋,我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毕业考试时,大家认为我一定考第一名,因为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又很刻苦。其实我读的大多是课外书,对考试名次无所帮助。考试完出榜时,我排在第四名。按规定,前五名可以保送上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因此我没有参加升学考试,被保送到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实际上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的高等师范部,每年只招一个班。开始归国民师范管,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进行整顿,将高等师范部改为隶属于山西大学的教育学院。我上教育学院时,已把名称改成山西大学教育学院了。

还在国民师范时,我们曾搞了一个书报合作社,和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发行部有关系,他们经常给我们寄进步书刊。我和上海联系用假名,如用过“孟秋声”、“孟鸣求”等,主要是购买书时用。许多马恩列斯的书,进步的、革命的报刊就是从那里购买的。到教育学院后,继续从他们那里购买,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对红军,都知道。对中国学术界的动态,思想界的动向,我一直很感兴趣。

上教育学院时,正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高潮时期,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和报道文章。此后开始集中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其中比较多的是有关



哲学、历史的书。我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读过的、别的书中介绍过的、别人提出的都想读，因此既广又杂；二是喜欢穷源溯流，看到一家的观点，就想找它的渊源，还想看同它相对立的观点，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到太原后，读书从古代到现代，从文史到自然科学，到哲学，再转到社会科学。上教育学院后，比较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了。

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是从20年代后期开始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究竟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研究过中国社会问题，但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开始提出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有的人不同意，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有待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争论不仅在国内有，在国外也有。在当时的共产国际、苏联党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就存在两种观点。斯大林、布哈林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托洛茨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应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后，又引发了中国社会

史问题的论战,涉及许多历史理论问题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中国社会是否在历史上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秦汉以后中国一直处在什么社会?中国为什么始终未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各派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复杂。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怎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是许多人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这一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其他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大量在国内翻译出版,各种报刊刊登各式各样的思想主张和学术观点,使我有机会了解论战各方的观点,从中分析比较,确定自己的观点。

在教育学院的头两年中(1931年、1932年),我开始一边读书,一边还指导一些青年学生读书,并同他们讨论问题。在这时,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书对我影响较大,就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主将之一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一本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在书中,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指导,征引古代文献,剔发卜辞铭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演变过程,提出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个历史阶段,并阐明西周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了封建时

代。他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生产方式的进化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我找来这本书中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读，引起极大兴趣。此后有一本苏联编的、已译成中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也读了。这一段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还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从这些书中，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读了书，就和一些人研究、讨论，实际上是进行宣传，这样团结了一批人。有不少青年学生，这时和我认识，一起读书，讨论问题，许多人后来参加了革命，有的加入共产党比我还早。比如梁文英、乔明甫、杨绍曾、马希贤等。我这时的思想，主要在读书上，先从理论上弄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再去实践。因此，没有先去参加组织。结果，我的朋友中，念书少的反而参加革命早，我这个念书多的人反而参加革命比较晚。

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我震动很大，使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从书本中转到了实践中。太原的学生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组织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各个大中学校都参加了，向省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声援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的支持。当时，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叫苗培成，还担任省教育

厅厅长。国民党在山西很不得人心，学生举行反日游行和向政府请愿，苗培成横加指责，更激起学生不满。12月18日，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有几千人，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取消不准学生抗日救国的反动法令。苗培成和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命令省党部的义勇队向学生开枪，当场打死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打伤10余名学生，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到太原警备司令部要求荣鸿胪司令惩办杀人凶手，查封国民党省党部。这时，刚从大连回到山西的阎锡山乘机查封了国民党省党部。此后，直到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在山西一直不能公开活动。12月18日的游行请愿，体现了群众的力量。此后成立了山西各界“12·18”惨案后援会，召开穆光政烈士追悼会，搞抬棺游行，通电全国，并在太原中山公园建立了穆光政烈士纪念碑。凶手被荣鸿胪扣押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异地审判的名义，押解到河南郑州开释。阎锡山借“12·18”惨案赶走国民党在山西的组织后，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去追究凶手。他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大权。蒋阎之间因中原大战引发的矛盾至此化解。

1932年，阎锡山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一是他刚从中原大战的失败中恢复权力，集中力量致力于山西的政治、经济建设，充实山西实力；另一方面他在大连避难时研究了多年从政治省的经验教训，感到对群众的统治不能过激，要有一套新的办法。他一边扩军，建立以军工为

主的工业体系；一边兴办官办的群众团体，利用群众团体对付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时，山西群众团体纷纷建立，什么中国青年救国会、建设救国社、工人自强协会、农民自强协会、妇女自强协会、教育改进会、地方自治促进会、倡用国货实践团等，许多学生被拉进这些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的共产党组织也改变斗争策略，对官办群众团体采取利用的方针，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进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在山西建立党的外围革命团体，成立了山西省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山西教育者联盟（简称教联）、山西省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山西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等。

我在这一年的冬天，参加了另外一个革命团体——山西革命互济会。这个组织最早是1925年9月由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发动时于上海成立的，当时叫中国济难会，任务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1929年12月改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在各省市设立分会。1930年1月，中国革命互济会山西分会负责人为高举（即高克亭负责）。1931年秋高举被捕后停止了一段活动，到1932年10月恢复活动，由共产党员王伯唐负责。我参加互济会时，山西革命运动正在发展时期，在太原组织了纪念“12·18”惨案1周年活动，会后游行，进行街头讲演。我参加了活动，但没有出头。这时，我的主要精力仍旧是读书，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读马列的书更多

些。实际上我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我参加互济会后,首先把我的同乡好友郑林介绍到互济会,他又介绍他的同学任肇庭(即任志远)参加。我们很快发展到 20 多人。到 1933 年,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在山西的党团组织在街上公开搞“飞行集会”,号召群众起来夺权,使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遭受破坏。当时我不主张那样搞,因为条件不成熟,因此我们互济会被破坏不大。破坏最大的是山西抗日反帝同盟会,他们公开在教育会内挂牌办公,引起当局注意,领导被捕,会员名册落入敌手。这一年 10 月,共产党员安敦厚(平遥人,字子希)找我,介绍我加入共产党,从此我成为共产党员。他让我仍负责互济会的工作,担任互济会党团负责人。他还和我商量,要恢复被破坏的抗日反帝同盟会。但不能再用这个名字。改称反日会,不公开挂牌。开始反日会就安敦厚和我两个人,不久我又介绍了同学王邦荣到反日会,实际工作由我和他搞。

1934 年春天,中共山西特委被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团体负责人被捕。我由于没有公开出面活动,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仍在暗中活动。特委被破坏后组织了中共山西临时工委,由王伯唐负责,我也参加了临时工委的领导工作,主要分管宣传。临时工委中还有李启华(当时叫郭进忠)、张国声。临时工委组成后,决定趁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 1934 年暑期开始,将中等学校毕业考试由各校自行考试改为会考一事,发动一场反会考斗争,由我负责

领导。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实行会考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强迫学生在校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我通过当时的左翼组织,首先发动国民师范、第一师范的学生,提出会考是法西斯制度,目的是扼杀学生自由,反对学生爱国。原来我们提反会考制度,后来把“制度”两字去掉了,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因为会考制度是国民政府的命令,全国都一样,反对就成反政府了。反会考就不一样了,只是要求不会考,学生都能毕业就可以了。口号一变,参加的人就多了,也容易争取到各方面的支持。

1934年5月,太原各校学生联合成立了太原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同学会,由国民师范的学生刘跃夫、陈捷弟、李汝山等出面,组织反会考斗争。这场斗争是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每一次大的运动我们都在事先进行了策划研究。6月初,应届毕业生同学会向新闻界公开讲述了要求免去会考的理由,得到记者们的同情支持。我们又通过各个左翼革命团体到全省各地进行联络,争取各地统一行动。中旬,应届毕业生同学会派代表到山西省教育厅交涉,要求免除会考。由于代表中混入捣乱分子,交涉没有成功。我们决定,举行游行示威、请愿。6月19日,我们组织了2000多名学生到省教育厅请愿。教育厅长冀贡泉不敢出来见学生,派一个科长应付。学生往里冲,非要见厅长不行。这时,守卫教育厅的军警出面阻拦,许多学

生被打伤,30多人被抓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劝同学会领导要适时组织同学退却,不要硬来,以避免流血。同时要撤消总罢考的计划,准备参加会考,要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经过这场斗争,省教育厅也怕把事情再闹大,释放了被抓学生,降低了考题难度,太原2000多学生除个别因学习太差未毕业外,绝大多数顺利毕业。

反会考斗争虽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但是在斗争中锻炼了青年学生,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革命的骨干。从斗争情况看,我们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同工农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学生自己干,很难取得胜利。另外我们对上层的情况也不清楚,没有充分利用上层的矛盾。当时我们没有那么高明的策略思想,只想着搞得轰轰烈烈,还是比较幼稚的。

1934年冬天,中共山西省工委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批准正式成立,王伯唐任书记,我任宣传部长,张国声任组织部长,郭进忠仍是工委委员。

反会考斗争后,我们把工作扩大到各界,不仅在学生、教师中,还到工人中去讲课,做工人的工作。

1935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要山西工委的工作报告,王伯唐找我们几个开会,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顺便送到上海去。因为我正好有机会,就是教育学院组织毕业班去南京、上海参观,利用参观做掩护,去送材料。我到上海按照约定的接头地点、时间,把工委的报告送去了。

从上海回来,才知道我走后山西的党组织又一次被



破坏,郑林也被捕了。夏天,参加完毕业考试,在运城的山西省立第二师范的校长找我,想让我去当教师。我向组织上汇报后,组织上说运城正缺人,同意我去,决定让我利用当教师的机会恢复运城的党组织。我正准备走时,被阎锡山的特务盯上了,他们准备抓我。幸亏一个过去给我们做过饭的厨师,绰号叫二不楞的平遥人,及时给我报信,在段若宗等人的帮助下,我们设计摆脱了特务,我化了装坐火车离开太原到了北平。这时,再回山西已不可能,因此也就没有到运城第二师范去。我留在了北平,等待接关系和分配工作。这就到了1935年9月了。

我到北平时,华北正处在政局大动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节节退让,北平的党组织于1935年12月9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的镇压。一二九运动后,学生在北平宣布总罢课,得到华北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并把这场抗日救亡斗争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在全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新高潮。

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山西,因此未直接参加北平的抗日救亡斗争。直到中共中央12月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后,我的组织关系才从山西经过中央转交给北方局,并决定我不再回山西,留在北方局工作。1936年1月,北平市委书记林枫调到北方局工作,北方局决定由我出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吴德任副书记,何凤元任组织部长,徐高阮任宣传部长。

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工厂进行宣传。在宣传中,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把参加宣传的同学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市委在民先内建立了党团,由黄敬任书记。

我任北平市委书记时,正值学校放寒假,虽然学生运动比较活跃,但参加人数不太多,处于低潮。1936年的春节是1月24日,元宵节是2月7日。我上任大约在春节以后,元宵节前这一段时间。元宵节过后,我们正在组织学生复课时,北平反动当局根据国民政府发布的《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开始大肆逮捕在一二九运动中积极参加活动的学生,有200多名爱国学生被捕入狱。同时,反动当局下令取缔北平学生联合会。反动当局的镇压激起学生、教师和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声援学生。这时发生了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学生郭清被捕后在狱中被折磨至死事件,更激起民愤。北平学生联合会于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三院组织有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在长安街上遭到军警镇压,50多人被捕。三三一抬棺游行后,北平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斗争更加困难。刘少奇在天津从报上看到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消息后,立即给中共北平市委写信,批评这次行动,指出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

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他提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人民的进攻。北平市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总结了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抬棺游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善后处理,纠正了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经过营救,因抬棺游行被捕的学生大部分被释放。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还主动争取国民党将领宋哲元。经过工作,宋哲元有了转变。以后我们以各种方式通过他把一批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营救出狱。薄一波等61人从草岚子监狱中被释放,也是通过宋哲元起了作用。

1936年4月底,北方局改组北平市委,李葆华接替我任市委书记,我仍在市委,曾先后任过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直从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抗日救亡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要求。1937年1月中共北方局派我到河北省石家庄,担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到石家庄工作不久,北方局通知我到延安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大约在4月初,我离开石家庄经郑州、西安,到陕北,去参加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

## 二、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我在河北石家庄担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当时30岁。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任白区工作代表团团长，团员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组成，我是作为直中特委代表参加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我记得代表团中包括北方局的高文华、鲁辰，铁总书记吴德，北平市委的黄敬、杨学成、李昌、林一山，天津市委的李启华、李铁夫，冀东特委的李运昌、李一夫，保属特委（即保定特委）的李菁玉，冀南特委的张霖之，津南特委的赵鏞，冀鲁豫边特委的陈少敏、纪德贵，山东工委的黎玉、郭子化，河南工委的刘子久、周骏鸣；山西工委的张友清，绥远工委的李衡等。此外还有广东的方方，上海的刘晓、张毅。这时，华北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大规模进攻华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国共正在进行合作抗日谈判。中国革命和国共关系正处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央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就是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

备。

会议开始后,首先召开的是苏区代表会议(后来把它称作全国代表会议),苏区、白区和红军的代表都参加了。张闻天到会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时作了结论。博古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都作了专题发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要积极地去宣传、鼓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同时要和资产阶级抗日派建立同盟。毛泽东强调指出,要经过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他说:“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毛泽东作报告,对毛泽东的伟大战略眼光和透彻的分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内心佩服和拥护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讲了哲学问题,讲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的讲话,启示我初步树立了凡事从实际出发这种正确观念。这对我以后到抗战前线太行山,在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中能从实际出发,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苏区会议从5月2日开始到14日结束,共开了13天。

苏区会议后,5月17日至6月10日开了白区工作会议。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在会议第一天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着重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政策的变化,我们斗争的组织形式

和工作方式也必须改变；在党和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必须加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以免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应争取一切爱国力量走上抗日的道路，争取一切武装部队成为抗日军队。刘少奇认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所谓建立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就是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领导群众前进。所谓正确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密切配合起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密切配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起来，在斗争中善于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善于利用矛盾，逐步取得胜利。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在会上引起了争论，一些还没有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解脱出来的同志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有的甚至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些分歧意见。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方针、策略和原则，提出党的工作要在新的形势下有个转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张闻天6月6日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闻天总结后，反对刘少奇意见的同志转变了认识，在会上进行了检讨。通过这次会议，与会同志对白区工作怎样

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创造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对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中放手发动群众,大刀阔斧地开展白区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等看望了与会代表。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记得在这次会议期间,一次我因有病披着一件大衣进入会场,突然感到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主席。他笑着问我:“你病了?”我顿时感到他对我这样一个参加会议的一般同志如此亲切,非常高兴,一时竟感动得答不出话来。他接着说:“刚到延安不适应,你很快就会适应的。”毛泽东当时的微笑和关怀,使我长期难以忘怀。

### 三、从石家庄到阳泉

白区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决定把河北省委一分为二，一为河北省委，另成立中共平汉线省委，领导平汉沿线北平以南到安阳一线的工作。平汉线省委由李菁玉任书记，原保属特委组织部长刘秀峰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省委委员还有著名的“红色教授”杨秀峰和原保属特委委员薛振彦和朱泽民，秘书长是李德中。省委领导4个特委：保定特委、直中特委、直南特委和直鲁豫特委。平汉线省委参加苏区和白区会议的只有李菁玉和我两人。会议一结束，我们就从延安经西安回石家庄。我先动身，走到富平县庄里镇贺龙的司令部，得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我们拼命往回赶，在7月中旬赶到石家庄。这时，李菁玉还没有回来，我立即布置直中特委的工作。8月下旬，我到了太原。这时，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杨尚昆、彭真、李大章等已经汇集在太原，布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我从太原回到石家庄，李菁玉、薛振彦也到了石家庄，正式建立起平汉线省委，开展工作。刘秀峰兼保定特委书记。他实际没到平汉线省委工作。我



兼直中特委书记。杨秀峰从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处得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简称“冀西民训处”)主任的职务,公开在平汉路西侧发动群众抗日,组建冀西游击队。冀西民训处负责13个县的抗日动员工作。省委的一切工作,围绕发动、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斗争进行。大约在9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保定会见了国民党的徐永昌、刘峙等军政领导后到石家庄短暂停留,接见了李菁玉和我,要我们抓紧时间发动民众抗日。周恩来要我们到太行山中的阳泉,他说,刘伯承和张浩很快要到阳泉,要我们和129师师部一起发动群众抗日。周恩来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介绍我们去的信。

9月下旬,日军占领保定,石家庄受到敌人的轰炸。北方局指示我们立即撤退到阳泉。和我同行的有杨秀峰夫妇、李菁玉、吴作民、陶鲁笳、贾庭秀、陈舜英等同志。我们是在敌人连续三次大轰炸前后从石家庄撤出的,我是在敌人第三次大轰炸后最后一批撤退的。我们撤退时,石家庄已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得一塌糊涂。这时火车已经不通,我们只好步行到井陘。在这里我们以平汉线省委名义和当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通过做井陘县县长、公安局长、警备队长的工作,从县里拉了一些人,筹集了一些钱,在井陘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这支游击队编入129师。在井陘,我们派了一批人到直南、保定地区活动,建立抗日武装。我记得当时省委曾

派一个年轻人到保定,把一个地主武装拉过来。这支武装叫联庄会,是抗日的。这个年轻人后来牺牲了。我们还派人到阜平和聂荣臻、罗荣桓联系,但没有联系上。10月中旬我们撤到阳泉时,阳泉很小,分为大、小阳泉,我们住在大阳泉。

我们在阳泉时,还是以平汉线省委的名义活动。这里的党组织有陶希晋领导的正太铁路沿线特委、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和何英才领导的阳泉矿区委等党组织。我们和他们接上关系后,在铁路和矿区发动工人进行抗日活动,组织起工人抗日游击队。10月上旬129师师部在政委张浩率领下来到阳泉,师部驻在平定义井村,我和李菁玉去见张浩,把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交给他。10月12日师部在义井召开干部大会,我们住在阳泉的地方干部都参加了,听了张浩政委的政治报告和刘伯承师长关于军事形势的讲话。师部派了两位老红军干部,一个叫张广才,一个叫杨树根,到阳泉教我们游击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们的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 四、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

129师到平时，日军正猛攻娘子关，国民党军队有的溃退，有的被围困，晋东形势危急。为了配合国民党友军部队作战，129师在正太路沿线长生口、七亘村等地连续袭击、伏击、阻击敌人，打乱了敌军迂回部署，解救了被围困的国民党军，掩护了大批国民党军撤退。在平定，我们和李一清领导的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5团取得联系。这时，八路军三支战略部队已全部开上山西抗日前线。中央根据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决定重新调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根据日军很快将南下、西进的紧迫形势，中央确定华北地区党组织的任务是和八路军主力部队配合，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坚持抗日斗争，重点是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到山区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为此，决定在正太路以北成立中共冀察晋省委，在正太路以南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撤销平汉线省委。新组建的冀豫晋省委活动范围是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河南交界的广大地区。在这里，和129师配合，依托纵横南北的太行山、太岳山，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我们接到北方局通知，我和李

菁玉从平定先到和顺县,同 129 师随营学校(教导团)的袁鸿化、张贤约联系,11 月中旬到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同师部住在一起,正式成立了中共冀豫晋省委,对外称 129 师编辑部。北方局确定李菁玉任冀豫晋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从山西省工委调秘书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安子文、彭涛、何英才、杨秀峰为省委委员,张子衡为省委秘书长。省委成立时,在省委机关的只有我和李菁玉两人,组织并不健全。在阳泉,张浩向我们传达了洛川会议的精神,对抗日战争中的两条抗战路线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我们都是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深知发动、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当即,李菁玉和我商量决定:李菁玉留省委机关联络各地方党组织,使新省委和所领导的各个地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战斗》,由陶鲁笳负责;我到辽县以南去联络各个县的党的关系,布置各县工作。这样分工,是吸取了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时,工作被动,没有能够深入各县,没有建立起工作阵地,结果节节“后退”的教训。省委当时的内部动员口号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隙、先行建立阵地”。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党员仅 30 来人,加上原属平汉线省委的元氏、赞皇、磁县等县以及中条山、豫北的一些关系,党员有 100 多人。这些同志都是经过严酷环境的考验,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是以后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我正准备南下到各县时,徐子荣和我们接上了关系。他是山西省工委的秘书长,对各地党组织较为熟悉。特别

是他直接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县公开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每个县的共产党员特派员赴任前,都由他代表省工委谈话,分配任务。牺盟会是山西当权者阎锡山批准成立的以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的群众抗日团体,全称叫“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牺盟会里,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薄一波、牛荫冠、戎子和(当时叫戎伍胜)等共产党员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各县的牺盟特派员都有一定权力,有活动经费,为我们联络各县提供了许多方便。省工委给是共产党员的特派员的任务,一是秘密发展党员,同时公开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我和徐子荣从辽县开始南下到晋东南各县联接关系、布置工作。一路上,依靠徐子荣和各个县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利用牺盟会的公开合法名义随处开办两三日的短期训练班,培训党员和积极分子。

省委在1937年秋冬季开辟太行区工作时,指导思想上一直把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放在第一位。一切工作围绕抗日进行。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在省委11月15日给晋中特委的信中。省委明确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发动广泛的抗日的游击战。(二)迅速猛烈地扩大八路军,拥护八路军。全党同志动员起来,进行扩红运动。(注:指扩大八路军。“扩红”是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扩大红军的用语。)(三)发展游击区,创造根据地,建立彻底抗战的人民抗日政权,实行动员人民抗战、改善民生的政策。这三项任务中,主

要做的是第一项和第二项。对于创造根据地的工作，当时我们思想上还不很清楚。对于什么是根据地，怎样去创造根据地，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这时有一个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党的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以发动工人为主转向以发动农民为主。刘少奇形象地说：“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袍，穿起短衫，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我们这些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思想上的大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在1937年秋冬季还处在被动的过程中。因此，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发动组织民众，但效果并不突出。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落后于抗战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党在全国抗战中政治影响的发展。

我和徐子荣从辽县、武乡一直走到南面的晋城，然后又从晋城转回来，检查南下时布置的工作落实情况，主要检查党组织建立、恢复情况，游击队、自卫队组织情况和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情况。到12月底回到辽县西河头村129师师部时，正值部队进行反六路围攻作战准备，我们看到刘伯承一手拿蜡烛，一手拿放大镜正看着地图，和参谋处长李达研究作战部署。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仅五六天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从此八路军在太行山中站稳了脚跟。这时，李菁玉已经和各地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我们回到西河头不久，邓小平和彭真也到了西河头。邓小平是接替张浩任129师政委的，彭真是作为北方局代表到

省委检查指导工作的。彭真到后,找我谈话,告诉我北方局决定派李菁玉和 129 师东进纵队一起到冀南去开辟工作,李菁玉走后由我担任冀豫晋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张子衡已经到了冀南。省委由我和徐子荣(宣传部长)、何英才(组织部长)以及杨秀峰、彭涛、安子文组成。1938 年初,李菁玉随东进纵队下山到冀南,改组后的省委开始工作。直到这时,省委机关才健全起来。

## 五、部署创建太行抗日根据地

李菁玉到冀南时，中央刚刚开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和彭真是在洪洞参加完北方局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会后到太行山的。在西河头，我第一次认识了邓小平。为了传达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也为了总结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在彭真的指导帮助下，于1938年春节时，召开了有各地特委、县委和部分区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在这次会上，彭真代表北方局宣布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并在会上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精神。我代表省委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方针和党的工作的报告。各特委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3天小组会和1天大会发言，彭真作了结论。会议充分肯定了省委成立以来两个多月的工作成绩，指出，两个月来，动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和工人参加抗战，在部分乡村中已建立起群众抗日堡垒；太原失守后组织了相当大的群众游击队、自卫队，建立起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配合主力部队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初步实现了农民生活的改善，吸引了部分落后群众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帮助八路军及一部分友军



补充了部队；建立并扩大了党的组织。会议在讨论前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主要问题是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动员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对群众宣传不够等。根据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晋冀豫区的实际，会议提出全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主力南移，形势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要加速领导并动员这一区域内的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建立广泛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创建大批游击队、自卫队，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彻底肃清汉奸，积极进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一切政治阴谋和伪军伪政权，树立坚固的抗日堡垒，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会议突出地讨论了围绕动员民众抗日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大问题，以及加强党的工作适应形势的要求，团结动员一切力量抗日问题。为此，决定大批吸收工人和贫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大力组织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大力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根据冀西、豫北会门较多的特点，积极争取广大会门群众抗战，在会门中积极进行抗日动员工作，用各色各样的办法和关系，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推动他们抗日。晋东南地区会门比较少，这同阎锡山统治较严有关。会上还讨论了如何争取地主、富农抗日的问题，指出绝大部分地主、富农是有抗日要求的，应把他们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对改善农民生活，不宜提过高的要求。会上批评了和顺县农会提出减租 50% 的要求。会上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精

神,其中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提法,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提出,既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要不要坚持中央过去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此,彭真在结论中指出:“中央过去指示我们的独立自主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它的正确应用是在保障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要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那怕同盟者张皇失措动摇逃跑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动员领导广大群众积极抗战,这是正确的。”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彭真还召集省委和各特委负责人开了一个小会,专门讲了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辽县活动分子会议是省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使晋冀豫区内的共产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走向统一,明确了党要围绕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开展工作。抗日是大局,要抗日就必须发动群众。因此省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同时,129师召开了干部会议,内容是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讨论进一步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会中,邓小平把我和129师参谋长倪志亮找去,专门研究关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对根据地问题一直不够明确,我问邓小平,什么叫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邓小平说,根据地首先是为抗日而建立的,要抗日就要有武装,因此根据地必须要有武装。根据地是一个地理区域,要使根据地在—一个地区存在和发展,就要有政权,通过抗日政权来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根

根据地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巩固,因此必须要有群众,这是基础。我们党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武装、政权和群众,缺一不可。会后,129师师部和省委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建立根据地的三大问题:武装、政权、群众。这一次会议,师部的刘伯承、邓小平、倪志亮和省委的徐子荣、何英才、彭涛、杨秀峰、安子文和我等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把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放在突出地位,在每个县组织一个县基干支队(相当于营),在自卫队内要建立担架队、运输队和帮助抗日军人家属的耕地队。在政权建设上,要建立群众信任的、民主的抗日政权,要以各种名义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要使各种抗日进步分子经过训练后到区村政府中工作。联席会议在讨论群众工作时,强调要把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不要隔离和疏远任何人。在实行合理负担时,不要使富户太吃苦,要真正合理。要扩大山西的牺盟会,农会会员可以全体参加牺盟会。要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参加春耕。要随时召集抗日军人家属开会,征询意见,解决困难。要组织群众识字、读报,成立夜校,进行宣传。根据地要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势,把群众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经过邓小平的讲解和这次联席会议,我对根据地开始有了认识。

经过以上连续开会,我们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明确了无论是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开辟创建根据地,都要把

抗日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发动、组织一切力量参加到抗日斗争中。为此,会后省委配合 129 师在太行山上大规模地开展战略大展开的工作。太原失守后,129 师进入太行山区时,采取了分兵发动群众的办法,派出了许多支精干部队,在太行山区各地,一边开展游击战争,一边进行发动群众,开辟、创建根据地。为了培养、训练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129 师在辽县西河头村师部所在地开办了游击训练班,培训准备分散派往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干部。八路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使我们在各地开展的建党工作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为了使地方党员干部学习抗日游击战争,学习红军发动、组织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省委有计划地选调一些县委、区委以上党员干部到 129 师游击训练班接受训练。这些地方干部以前虽听过“游击战”这个名词,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过学习,大家对于什么是游击战,如何组织自卫队、游击队,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如何组织群众支前参战等工作,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29 师分散到太行山各地的八路军,或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或以支队、大队等名义,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相配合,进行建党、建政、组织游击队的工作。这一段,省委和 129 师配合非常密切,在八路军的护卫和帮助下,省委在晋冀豫区内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到 1938 年 3 月中旬,省委已建立起晋中、冀西、太南、冀豫和晋豫等 5 个特委和设在沁县的省委办事处,并建立了 20 多个党的县委。这一时期,省

委和 129 师还注意建立抗日政权,扶助了昔阳县政府,恢复和建立了平定、榆次、太谷、寿阳等县政权,保护和改善了和顺、辽县、榆社、黎城等县政府。在太行山上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组织了各县的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大大发展牺盟会和决死一、三纵队。我们还创办了省委党校,各特委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大批培训干部。尽管条件困难,任务繁重,但大家的劲头很大。八路军在太行山区不断打击敌人,鼓舞群众抗日的信心。群众把共产党八路军看作是可依靠的亲人,拿出一切好东西供给我们的军队。八路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使群众相信八路军,依靠八路军。军民结合,党群结合,使党和八路军在太行山上站住了脚跟。当时,我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着抗日,为着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这是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的主要原因。

辽县活动分子会后一个月,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晋东、冀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控制掌握的根据地。为了及时指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省委 1938 年 3 月中旬在西河头村召开了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集中研究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晋东的辽县、和顺、昔阳、平定等 4 县和冀西的井陘、元氏、赞皇、临城、内丘、邢台等 6 县共 10 个县县委、区委的负责人。这是省委单独召开的第一次专门研究根据地建设问题的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左右,主要讨论对建立根

据地的基本认识,如何对付敌人进攻和我们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武装问题、统一战线工作与政权问题、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问题等。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大家对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在群众中打下了基础,因此对建立根据地很有信心。会上,省委提出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利用自然山是指利用太行山复杂的山川道路及自然山脉的形势,建立基点、据点及前进阵地,利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一切便利阻止敌人进攻,向敌人发动攻击,打击敌人。建立“人造山”,主要是指发动、组织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和抗日部队同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有了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即使没有自然山的条件,在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在这次会上,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第一项任务。因为这时党组织已经建立,抗日武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群众工作就突出出来。抗日战争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单凭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而不把广大群众发动与组织到抗日阵线里来,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此,会上省委提出:“在政治上,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与揭破敌人的一切阴谋与欺骗,最后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组织与武装起来,这已成为我们当前最严重的任务。”省委强调要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尽量启发群众的自动性和积极性,避免一切包办、命令以及代替群众的现象。为此,要采取民主的工作方式,依照统一战线与抗日高于一切

的原则,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要顾全各方面的利益,通过适当的调解解决。民主问题要和抗日联系起来,在抗日过程中实现民主。抗日群众组织要取得合法地位,采用公开合法的工作方式,在统一战线范围以内活动。在群众工作中,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要一起抓,特别要把占全区人口90%以上的农民动员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同时要做好敌区与敌占区的群众工作,采用公开与秘密两种方式,既要严密地划分工作范围,又要紧密地相互配合。会上还讨论了武装工作问题,指出:“领导与组织武装,是我党在目前阶段中唯一重要的任务。”在抗战中,游击战争必须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在抗日斗争中壮大、巩固游击队,使游击队取得群众的信任。游击队是群众自己的武装,它绝对不能脱离群众或违犯群众的利益。要强调游击队的铁的纪律,要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在根据地内,自卫队、游击队、基干队是三位一体的。自卫队不脱产;游击队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熟悉本地地理、风俗、人情,和群众有天然的联系;基干队是以八路军为主组成的基干游击队。所有抗日武装都要在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军事上,上述抗日武装要围绕在八路军基干游击队周围配合正规军作战。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与政权问题,强调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深入到除党的工作外的一切工作中去。要联合当地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友军共同抗日。不能把统一战线同群众工作、政府工作、武装工作等分离和并

列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要使党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者领导者,要坚持独立自主,防止国民党用统一战线约束、限制、妨碍党开展工作。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合法地位,但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应坚持抗战与统一战线的立场。会议强调以上策略,我们没有跟着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走,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强调要经过统一战线,使旧政权走向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改造旧政权,使之适合抗战与民主的需要。会议还讨论了抗日政权的财政、经济、教育等问题。在这次会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大量发展党组织,大量吸收并提拔工农分子的党的建设任务。通过这次会议,各级党的领导人对于什么是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会后,省委把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报告》,发给全区区以上党委,指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从一月活动分子会议到三月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是省委对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认识上的飞跃。我们这些从白区城市来到敌后农村的党员干部,从发动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斗争中,从老红军的言传身教中,对在敌后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有了信心和决心。



## 六、根据各地特点分区指导工作

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刚刚开完，省委就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是3月24日由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胡服(刘少奇)三人签名的给北方局驻省委代表朱瑞的电报，一封是4月5日由洛甫、胡服签名给彭德怀并转朱瑞和我的电报。两封电报主要强调要省委抓住时机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明确指出：“摆在冀豫晋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豫晋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中央设想，“为了建立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应推动行政主任薄一波等出面”，“以冀察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前例，请示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在会议上推定筹备委员会，办理合法手续及准备召集大会”。这两封电报发来时，正值日军集中3万余大军向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之际，省委和129师集中精力反九路围攻。4月8日，省委和师部在西河头联合召开全区各特委书记和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讨论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进行反九路围攻作战的问题。这次会议由邓小平和我主持。这是根据地创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联席会议后，各地

县以村为单位,召开民众大会,揭露敌人的欺骗,解释粉碎敌人围攻的意义,宣传中国军队抗战的胜利,进行有力的鼓动,提高民众抗战的信心。各地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替军队抬伤兵,运粮食子弹,号召民众不替敌人带路,替自己军队带路,侦探敌情,报告自己的军队和政府,肃清汉奸,捉拿敌人的奸细。同时,破坏道路桥梁,破坏敌人交通。我们提出“清野空舍”口号,动员民众在必要时搬走一切粮食,不留一颗米粒给敌人,赶走牛羊骡马,搬走锅盆碗盏,拔出磨心,掩埋水井,饿死敌人,渴死敌人。在反围攻中,沁县“清野空舍”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日军进城时,到处都是空洞洞静悄悄的,死一样沉寂,结果日军不敢住在城里,退到城外野宿。经过反九路围攻作战,在晋东南的八路军歼敌4千余,收复了18座县城,八路军在太行山上站稳了脚跟。广大民众在反围攻中表现出空前的抗战热情,和抗日军队密切结合,初步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此役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取得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后,中共中央再次就在晋冀豫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发出指示。5月4日,张闻天、刘少奇签发了给邓小平、朱瑞和我的电报,并同时发给朱德、彭德怀。电报强调:“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央要求朱瑞和省委机关、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与在沁县的八路军总部靠拢,分别召开党的、政

府的、群众团体的、地方武装的会议，以推动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这时，省委机关和刚刚成立的晋冀豫军区机关（倪志亮兼任军区司令员，黄镇任政委）住在辽县下庄一带。接到上述电报后，省委机关南下到沁县，和朱瑞住在南底水村，从此，朱瑞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直接指导省委的工作。这时，129师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由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一部主力于5月初进到冀南开辟创建冀南平原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率一部主力从晋东南向东进入冀西，准备破袭平汉铁路，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徐州会战。129师主力东进后，省委到沁县靠向八路军总部，在朱瑞指导下全面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省委到沁县后，晋冀豫区的工作已走上发展的道路。这时，山西的晋中和河北的冀西两个地区的工作搞得比较出色，各有其特点。129师和省委开始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时，是从山西晋中地区最早开辟工作的。晋中工作的特点是特委成立后首先突出抓地方武装。开始，依靠阳泉矿工自卫队，紧接着又汇合了榆次、太谷两地的游击队。129师进入太行山区后，首先在正太路以南的晋中地区开展工作，特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取得八路军主力的配合与帮助，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秦基伟、赖际发将其带领的游击支队和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改组为秦赖游击支队，成为晋中地区的地方基干抗日武装部队，同特委一起以和顺石拐镇为基点，开辟

创建晋中抗日根据地。晋中特委抓住石拐镇所在的第三区,使第三区成为特委的典型实验区,各项工作,特别是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相当活跃。省委及时总结了和顺的经验,在《战斗》第二期和武汉版《新华日报》上介绍了和顺发动群众的经验。4月初召开各特委书记和各游击支队政委参加的联席会议时,请特委书记陶希晋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经验。在根据地初创阶段,晋中特委的工作是全区最好的。

冀西工作是从混乱的局面中逐步理顺的。开始,特委机关没有建立起来,但各地都有一些党员在积极地工作。如邢台有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的一部分同志活动;临城、内邱有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开展工作;赞皇有一批老同志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工作。以后129师派出骑兵团到冀西开辟工作,使冀西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辽县西河头会议以后,冀西特委机关健全起来,冀西全面工作在4月反九路围攻以后开展起来。5月份是冀西工作自抗战以来最好的一段,当时我们叫“五月的赞皇”。省委、特委所以决定从赞皇抓起带动冀西全区的工作,是因为我党过去在赞皇有斗争历史,群众条件很好,抗战以后八路军进到赞皇,与那里的一批党的老同志相配合开展工作,在群众中树立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工作基础较好。赞皇在冀西中部,北边为井陘、获鹿、元氏,南边为高邑、临城、内丘、邢台、沙河。在这里创造新的工作局面,不仅有条件,而且便于向北向南发展。我们在赞皇集中力量

抓了一个月发动群众,以农会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从农民抗日运动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工作有了骨干,全县的抗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省委抓住赞皇工作经验,组织冀西各县学习赞皇经验,并在晋冀豫区普遍推广,对转变全区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38年6月,省委在沁县南底水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召开的。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朱瑞作了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反九路围攻以后晋冀豫区出现的新形势,研究如何进一步坚持与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如何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会议开了约半个月左右,最后通过了朱瑞起草的《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当时我们叫“六月决定”。这个文件强调,要大力发展及健全各级党组织,真正在创造根据地各个工作部门中树立党的领导。文件指出,要反对关门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提出创造晋冀豫区为坚持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会上针对各地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提出要开展反“左”右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求党员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提高理论水平。这是针对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2月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后,受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影响,虽然纠正了过“左”的倾向,但形成另一极端,群众斗争相当沉寂,不敢大刀阔斧地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只追求组织形式和发展数字,没有造成从下到上的热潮与运动。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在强调独立自主

时,未能把握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仍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对阎锡山的联合,对薄一波领导的第三专署的工作,对牺盟会的活动,一些同志不能正确认识,“囿于一隅”的观点支配了这些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注重防范和打击。会议确定今后要大大发展党,猛烈扩大游击队,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省委强调“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把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及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纠正群众工作过‘左’的倾向及过右的过高的空洞的斗争口号”。为确实发动群众,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群众的生活,“减租五或四分之一,减息至二分以下,缓债至一季或半年以上”。会后,为了推动全区的工作,适应战争环境,便于省委领导,省委采取大特委制,在全区作了新的划分:

辽县以北加上武乡,划为晋冀特委。包括原晋中特委、冀西特委和辽县直属县委及晋东特委的一半合组而成。晋冀特委是全区最大、工作最有基础的地区,过去省委工作大部分即在这个区域。这时,党员人数已有7000多人。

在辽县、黎城、襄垣东部与河北、河南交界处,建立冀豫特委,同原特委领导范围相同。这里受敌人打击较大,是太行根据地开创时期工作较为薄弱的地区。这时全区党员约千人。

在黎城、潞城至长治公路以东和豫北靠晋东南一带,组建晋东南特委。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过去曾叫晋豫特委。

这里的工作，很不平衡，晋东南一带工作基础较好，豫北的林县、淇县、安阳一带还没有开辟。这时特委领导的党员有 800 多人。

在晋南和豫北交界地带建立了晋豫特委。这里的工作由唐天际领导的晋豫支队开辟，党的工作基础较为薄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健全起来。新特委组建时党员约有 800 名。

新组建了太岳特委，在沁县、沁源、屯留、长子、介休等县一带。特委领导的党员有 500 来人，是党员人数最少的。

以上 5 个特委，到 6 月底有党员 1 万名以上。

六月会议后，群众团体经过整顿，太行区内在我党领导下的农会会员达到 6 万多，工会会员 7000 多，自卫队 5 万多。地方武装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晋冀区活动的秦赖支队有 2000 人，梅花范支队有 1000 人，桂干生支队有 1000 人；在冀豫区活动的张贤约支队有 1200 人，张国传支队有 800 人；在晋东南区活动的赵基梅支队有 1200 人；在晋豫区活动的唐天际支队有 500 人；太岳特委领导的武装有 200 人。这时，全区在我党领导下的基干支队已发展到 8000 多人，有 2500 支枪，成为支撑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六月会议后，我起草了给中央和北方局的一个工作报告。省委成立后，在 129 师张浩政委 1 月份回延安时，曾带给中央一个工作报告，汇报进入太行山以来党和群

众工作。这次的工作报告汇报 2 月至 6 月 5 个月来省委的领导和省委本身工作及各特委的工作发展特点,以便求得中央和北方局的指导。在报告中肯定了省委 2 月活动分子大会以来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大大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几个比较强力的基点,领导了粉碎九路围攻的战争,使边区党有了比较大的基础,为创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有计划地出版了党的文件和书报,训练和提拔了工农干部,组织了一批群众团体,领导和推动了各级政权,对全区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省委在工作中能够把握客观形势发展的特点,及时提出任务,加以执行。但是,这段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省委的领导还有很大被动性,没有深刻了解一切服从战争和工作适合战争需要的积极意义,工作中显得忙乱;深入检查、适时总结、及时指导不够,存在着手工业的工作方式;群众运动开展缓慢,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群众发动不充分;组织建设刚刚开始。

在发出以上总报告后,省委为贯彻落实六月会议决定,几个负责人分头到各个地区巡视工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导当前的工作。除彭涛已在晋冀地区外,何英才到晋豫,我到晋中,徐子荣到晋东南和太岳。

我是在 6 月下旬(大约在 25 日以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到晋中的。为什么要去晋中?因为晋中是开辟根据地时期,党和八路军开展工作最早的地区,也是 129 师在太原失守后进入太行山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我巡视的



晋中主要指正太路以南、平辽公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地区。省委成立时也在这个地区,是省委直接指导工作的地区。2月活动分子会议前,这里已有八路军主力和基干队,地方干部也较多。经过广阳战斗,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和九路围攻及其他接连不断的大小胜利后,扶植和建立起一批抗日政权,打击了汉奸维持会,提高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和信心,党所领导与扶植的抗日力量成为团结群众与安定这一地区的核心力量。2月活动分子会后,晋中在特委领导下大大发展了党,有计划地培养并提拔了党的及群众的干部,提拔了工农干部及部分产业工人到党的领导机关来,初步建立了组织制度和组织工作,出版了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建立了群众组织,发展了抗日武装,支持与领导了人民战争,领导武装和群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在这一段工作中,特委在成绩面前有些飘飘然,对自己的缺点、不足之处没有警觉,因此同省委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比较突出的是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与贯彻上的偏差,特别是对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缺乏深入的理解,“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已有表现,影响到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

山西统一战线有其特殊的形式。

抗战开始时,在我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在山西,阎锡山已同我党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打开了山西全民抗战的局面。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给阎锡山写信,争

取阎与我党合作抗日。在我党推动下，阎锡山在山西公开动员群众抗日，并根据山西的特点，让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其领导的牺盟会内工作，打着阎锡山公开合法的旗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使山西成为全国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模范区。阎锡山还支持牺盟会内的共产党员组织建立新军的建议，建立起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包括决死队、工卫队、政卫队及后来由国共合作建立的战动总会领导的各游击队等）。这样，在山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由阎锡山任会长、属阎锡山系统但实际领导权在共产党员手中的牺盟会和新军两个组织、动员群众抗日的团体和军队，成为我党在抗战初期与阎锡山结成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牺盟会和新军在山西被称为“新派”，以区别于阎锡山系统的其他组织和军队，其代表人物为阎锡山方面的梁化之和共产党方面的薄一波。对于阎锡山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曾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29日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抗战开始时，我党派了许多干部、青年到牺盟会、新军中去工作，帮助牺盟会、新军发展。在山西各县都有牺盟会组织，各县牺盟特派员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新军中的决死一纵队、决死三纵队在太行、太岳山活动。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于戴阎锡山帽子开展抗日斗争的牺盟会、决死队不

理解,有的甚至采取排斥的态度。在晋中区,这种排斥、不理解的现象一度较为严重,个别同志将搞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叫做“一波路线”(薄一波路线),出现了新形势下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影响到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影响到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六月会议上,北方局代表朱瑞根据杨尚昆的意见,已指出晋中工作的这一问题,要求省委帮助特委提高认识。我到晋中巡视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使特委总结认识前段工作中的不足,以推动晋中工作大踏步前进。对于晋中工作,省委和129师师部向来十分重视。粉碎九路围攻,接到张闻天、刘少奇5月4日给邓小平、朱瑞和我的电报后,邓小平亲自帮助省委把辽县以北地区组成了一个特委,帮助特委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师部和省委对晋中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要把这一地区搞成根据地的模范区,不仅成为巩固的抗战基地,而且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我正在晋中巡视时,朱瑞转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7月5日联名发给杨尚昆并朱德、彭德怀转朱瑞的电报,内容主要是关于巩固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记得其中一个内容是在一切属阎锡山的团体及机关、部队的文件口号中,要多用阎锡山的术语,少用我党的术语。这就是“戴阎锡山的帽子”的意思。在和顺罕桥沟召开的晋冀特委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我代表省委在总结时强调了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加强群众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三个方面的问题。7月14日写出《对

晋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大纲》，报中央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报告大纲充分肯定了晋中工作的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批评了“左”的“囿于一隅”的观点，指出：现阶段晋中工作的主要缺陷表现在“统一战线没有深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左’倾关门主义已与工作以不少损害，一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够，有错误，政治及党的基本知识水平低下；党与群众工作不够深入与不够巩固；政权忽视下层与抗战建设；工作开展了，干部能力的提高则很慢，主观客观之间不能相适应”。报告大纲提出，晋中的工作基础较好，要经过努力“使晋中成为有力的根据地与模范区”，“迅速争取工作的大步转变”。为了加强晋冀特委的领导力量，省委派彭涛、王孝慈到特委担任副书记，同书记陶希晋一起领导该地区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巡视，省委领导对全区的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了进一步研究讨论全区的工作，省委决定召开省委委员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领导方法，着重研究在深入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时，如何把党的水平提高一步以及转变作风和深入下去的问题。会议召开期间，于8月19日接到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冀豫晋省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晋冀豫区委，原县委以下的区委改称分区委。因此，这次省委会议改称为中共晋冀豫区委会议。

区委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8月15日至

18日,开了4天,由宣传部长徐子荣主持,参加人包括我、组织部长何英才、党校校长王卓如、秘书长吴作民,组织科长顾卓新列席。会上主要讨论了形势、区委领导方式、区委工作及区委各部门工作、各特委的工作等。在讨论形势时,传达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张高峰事件及目前形势的报告,周恩来副主席《保卫武汉及发展前途》一文。经过讨论形势,区委对敌人将在占领武汉后(当时武汉还没有失守,日军正在大规模进攻武汉),抽调兵力进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争趋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提出“变敌后方为前线”的口号,决定赶在敌人回师华北前争取时间,深入和巩固建设根据地。针对前段工作号召多、落实少,分散多、集中少的问题,区委提出,为使全区工作走上更坚实巩固发展的阶段,政权、武装及民运工作的统一与集中领导已成为重点课题。为此,区委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下面,首先是加强对特委工作的领导,通过组织高级巡视团到各特区,指导各地工作。在第一阶段会议结束时,省委正式改为区委。第二阶段会议以区委名义,于8月20日在屯留县寺底村召开。

第二阶段会议参加人员比第一阶段增多,增加了北方局代表朱瑞、太岳特委书记安子文,列席人员增加了侯振亚和关山复。会议改由我主持。

会议一开始,我作了报告,主要讲了议定的第二项议程,即关于政权、群众、武装等问题,讨论党团领导、经济建设、民运领导的统一、工人运动、敌军工作等。党团问

题,是我在晋中巡视中发现的问题。过去的政权、武装和群众团体中曾建立了党团,但发挥作用不大,党团领导中强有力的干部很少,甚至有些动摇分子也在党团内。要加强对政权、武装和群众运动的统一领导,就必须健全和加强对党团组织的领导,使其在特委、县委领导下独立地工作。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我主要强调不能单纯地从改善群众生活的角度看待,而要把改善群众生活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注重生产问题。要通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保证群众既得利益,以促进全区的经济建设。我在报告中强调了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指出银行是建立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核心和心脏,要通过银行保证八路军和决死队的粮食不发生问题,使银行和工商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群众运动的统一问题,我主要提出要健全、充实和改进各群众团体领导机关,首先是县一级,然后以特区建立统一领导机关。群众工作在当时主要是动员群众参战支前。包括人力和物力两方面的动员,这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关于工人运动,主要强调加强党对工救会的领导,要组织产业工人参加根据地生产,参加抗战。敌军工作,主要是瓦解肃清敌人,刺探收集情报,铲除汉奸。

我报告后,各个委员就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由朱瑞作总结。他在总结中突出地讲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及同阎锡山的关系问题。抗战开始时,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国民党地方党部也随之

退往南面，一时，在华北几乎看不到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活动。我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和八路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华北最大的党、最大的军队。抗战一年后，国民党才看到丢失放弃在华北的工作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因此在1938年夏，开始在华北恢复地方组织，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及其他实力派（如阎锡山）的既有地位。朱瑞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民党对我们的排挤、限制、调查、破坏，要以统一战线的诚恳态度，光明磊落、仁至义尽地对待他们。同时，要警惕，要做阎锡山的工作，要帮助阎锡山系统的进步力量牺盟会、决死队。

区委会议刚刚开完，我们收到了刘少奇8月18日给朱瑞转省委诸同志的信。这封信是刘少奇在收到省委6月22日给中央和北方局的报告及省委给中央的大批材料后写的。刘少奇在信中肯定了省委“方针一般都对，一般的工作也很好”，“在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指出省委在前段工作中存在着“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要求在工作中注意“党内团结，同志的团结”；要“扩大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只要他们愿意入党，愿意为党工作，即可吸收他们，在党内再给他们以特殊的教育”；要“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来反对敌探”；要“推动各群众团体召集晋冀豫全区或分区的群众代表会议”等。

刘少奇在信中特别强调了在山西工作，要十分注意

统一战线的特殊形式问题。他指出：“在山西，我们工作环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已经有了我们的武装，参加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并参加了统一的救亡运动，而这种参加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你们在山西已经不是完全的在野党，军事、政治、民众运动以及各种政策法规等，你们都要过问，而且都应该负责；然而，你们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在野党，在法律上正式的、公开的政治地位，你们还没有取得（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没有前例）。你们必须充分地认识这一个特点，并且根据这种特点而采用恰当的特殊的工作方式，然后你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否则是要在许多地方碰壁的。”刘少奇批评了晋中特委4月23日以“经字1号通知”直接统筹统支物资的做法，指出：“是八路军的队伍，是正式公开共产党的官吏和团体，党是可以公开正式地去指导他们的。除此以外，党只能采用特殊秘密的方式去指导他们。这是在山西工作，尤其在发表党的文件时应特别注意的。”

接到刘少奇的上述指示信后，区委对如何根据山西的特殊情况，展开创建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改变了过去党公开出面领导群众运动的作法，采用通过群众团体中的党团秘密领导的方式，让群众团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进行动员、组织抗日斗争。为此，区委在9月30日发出机密通知第二号《关于党团的决定》，提出“为了加强群众工作及党的领导，必须建立与健全党团，充实党团工作。”决定规定，要“派最



好的同志参加党团”，使“党的主张和决定首先和有力地经过党团取得在群众中的实现和群众的拥护”；要“健全党团生活，定期开会，充实会议内容，讨论党的主张、决定、指示和群众团体中的各种问题”；“党团同志过党与群众团体的两重组织生活，有两重组织关系”；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团的领导”、“密切同党团的关系”；要在党团中“组织特别小组，加强党团同志的组织生活及学习”。区委采取的这一措施，一方面使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另一方面又使群众团体有自己工作的独立性，更便于公开活动，提高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群众中的威信。

太行根据地开辟阶段，党的工作一直围绕发动、组织群众自觉参加抗日斗争进行。日军大举侵入华北后，我党我军在国民党军队及政权领导人仓皇溃退的情况下，向敌后挺进，提出坚持华北抗战，保卫家乡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及主张，赢得了华北民众的拥护。我军在太行区抓住时机，寻机打击敌人，树立了威信，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广大民众在残暴的敌人打到自己家乡，残酷地奸淫烧杀抢掠中，激起了抗日热情，很容易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宣传和抗日主张。当时，谁能坚持在敌后抗日，谁能保护人民群众，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是凝聚、发动、组织民众的旗帜。正是由于我党我军在宣传上和在实际工作中把抗日的大旗高高举起，因此，仅在

1937年10月进入太行山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的一年中,我们就在太行区创建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开辟创建根据地主要的是依靠我们的武装力量,打击日军和汉奸,肃清骚扰民众的散兵游勇和土匪。但是,在战争爆发、社会秩序大乱的情况下,要很快安定社会秩序,大量补充抗日武装,保证军需供应,初步建立抗日政权和彻底改造旧政权以适应抗日的要求,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积极的参加抗日战争,是无法实现的。在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我们省委、区委逐步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并在开辟、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使太行区的共产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成为全区最有影响、最重要的政党。党的力量的壮大是同群众发动的程度紧密相联的。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就没有党的发展壮大,也不会很快在敌后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 七、传达六中全会精神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太行区回延安参加全会的有3人：朱德、彭德怀、邓小平。他们在会上分别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党在根据地的工作等。

全会召开时，正是日军大举进攻武汉的紧张战斗时期。10月12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就准备迎击日军对华北的“扫荡”向敌后各地负责人发出电示，指出华北将转向严重与艰苦的战斗环境，要求各地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进行紧急战备动员。接到电报后，10月19日到20日在潞城故漳村南大庙中，左权副参谋长主持召开了有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和晋冀豫区委负责人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左权传达中央来电，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作主报告，刘伯承师长讲军区工作，我讲党的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10月20日），以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中共晋冀豫区委名义，联合发出《关于紧急

动员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指示》。该指示强调全党全军全民紧急动员，全晋冀豫区 800 万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粉碎日寇新的进攻。指示指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广大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开始取得政治上的自由与经济生活的改善。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抗战的利益一致的，群众利益的迅速实现，将更加加强坚持抗战的力量。”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指示要求大力发展群众抗日救国组织，使之成为抗日政府执行一切抗日政策与法令的有力助手。为增强抗战力量，动员群众，要迅速公布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的各种新法令；加强政治机构，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国民参政会，实行村政民选；切实实现五一减租，分半减息，低利借贷；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难民等。

武汉在 10 月 25 日失守后，回师华北的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平原上，太行山中相对平静，没有大的战争。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我们在 1938 年 10 月至 12 月，把统一全区群众组织作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点。首先，在特委一级，成立了各个救国总会，如晋东青年救国总会，正太路工人联合救国会、晋南总工会；山西第三、第五行政区工救总会、农救总会、青救总会、妇救总会、冀西农民联合会等。

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调整了中共北方局领导，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等 9 人组成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

委，杨尚昆任书记。北方局机关从晋西转移到太行山中，与八路军总部靠拢。11月下旬，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到达太行山中。此后，北方局机关一直住在太行根据地内。

为传达贯彻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杨尚昆指导下，我们于12月3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晋冀豫区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特委和主要县委的负责人。这是继年初全区党的活动分子会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党的工作会议，也是北方局机关进入太行山后直接指导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杨尚昆在开始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结束时作了《六中全会精神的总结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对区委来说，这次扩大会议既是一次集中学习中央精神的会议，又是一次总结抗战以来党在太行区工作的会议，也是一次研究党怎样巩固建设根据地的会议。

六中全会是抗战开始后，在没有条件召开党的七大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对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党员干部来说，对中央的声音感到十分亲切，特别想知道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人们思想上对形势的发展

更加关心。通过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对于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对于当前敌人由进攻到相持,而我们由退却到相持的发展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全会指出,要不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些分析对我们鼓舞很大。在讨论中,我们结合太行的实际,分析了本区面临的形势。这时区委领导的范围已包括晋东南、冀西、豫北毗连区域的70余县,东西宽约300公里,南北长约340公里,幅员约10余万平方公里。这里是天然的便于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全区内东障太行、西峙太岳,山脉连绵,在战略上十分有利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全区东西北被平汉、正太、同蒲铁路包围,南面终止于黄河,四面任何一方的出击,都会对敌人形成极大的威胁。本区物产丰富,不仅粮食土产可基本自给自足,而且有丰富的煤铁和硝磺等战略物资,对支持长期抗战极为有利。抗战开始后,我党已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党、武装、政权、群众团体团结一致,带领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斗争,为坚持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家非常有信心把太行区建成坚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扩大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十二月会议上,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

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错误主张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产生过糊涂认识,似乎在开展工作时,要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使一些地区的工作受到束缚,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会上大家对全会确定的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对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认识到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正确的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应当一致起来。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时,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亡。因此,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民主、民生问题同时要适当解决,否则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太行区,统一战线中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处理与阎锡山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是特殊形式的问题。一方面,要拥护阎锡山抗日,拥护和协助山西的法令与进步的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我党、我军的独立性,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斗争中,逐步树立农民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能不能在敌后站稳脚跟,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六中全会确定大力巩固华

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重申抗战开始时确定的全党应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党和国民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可以合法地、公开地在战区和敌后开展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用以支持长期抗战。

扩大会议根据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全区抗战以来党的工作、政权工作、敌区工作、民主民生斗争、民运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何英才、徐子荣、顾卓新等分别作了《全区党的建设问题》、《民族化通俗化问题与宣传工作》、《争取全区工作平衡发展问题》等专题发言。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区委作出《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于1939年1月正式发出。决定提出:“目前晋冀豫边区的任务是,要在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下,从巩固中求得全区工作的全面与平衡的发展,保卫与建立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迅速完成紧急动员工作,动员一切生动力量,准备应付严重局面的到来,准备粉碎敌人的新进攻,配合华中,保卫大西北。”决定对坚持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扩大与统一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工作、敌区工作与锄奸工作、根据地中党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把六中全会精神贯穿到了本区工作的各个方面。



## 八、统一全区群众抗日组织

我们在开辟、创建太行根据地时，一直把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战争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用很大的精力去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党和八路军进入太行区后，通过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动委会、牺盟会等合法组织，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如青年学生训练班、小学教师训练班、牺盟秘书训练班、农民训练班、工人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妇女训练班等等，培训群众中的抗日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发动、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区委扩大会前，全区已在专区、县建立起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扩大会上，根据六中全会提出的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要求，提出本区群运的任务“主要为动员参战与支持战争。为此，提高群众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争取民主是中心一环。动员群众参政，改善群众生活（必须联系到参战），提高文化与政治教育，造成参战热潮。”

在这里，特别提出在动员组织群众中，“争取民主是中心一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上“民主”两字，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民主”两

字呢？这是因为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是抗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根据地内，把抗日战争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群众参战与支持战争，首要的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获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同时，在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敌后根据地建立在农村，敌后抗战依靠的主力是农民，因此，发动组织群众抗战，最主要是发动组织农民抗战。但是，农民长期在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尤其是在封建地主压迫统治之下，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文化，生活得不到保障，自己对自己的力量没有认识，很难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分散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教育和实际参战、支前、参政、议政、改善生活等的锻炼，给群众以民主的知识和实践，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参加到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来。因此，在这次扩大会上提出：“提高群众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争取民主是中心一环”的口号。为了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在这次会上确定组织各种党的专门工作机关，如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扩大会后，晋冀豫区的群众运动以建立全区统一的群众组织为中心，出现了一个高潮。1939年元旦，在太行山中的山西沁县召开了有4万人参加的“晋冀豫各界拥

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专区各个救国会的代表，八路军、山西新军、国民党军的代表，各抗日政府的代表等。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会作抗战形势报告。会中，各界代表酝酿协商成立了全区工、农、青、妇4个救国总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会后，各救会筹委会加紧工作，很快在二七京汉工人大罢工纪念日建立起晋东南工人救国总会，杨珏任主席；在三八妇女节成立了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康克清为名誉主席，刘亚雄任主席；在3月12日植树节宣布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成立，池必卿任主席；在三一八惨案纪念日组建起晋东南青年救国联合总会，石西民任主席。以上各总会成立后，在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联合成立了晋东南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共推袁致和为主席，杨珏、池必卿、石西民、刘亚雄为副主席。这些群众抗日团体都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区委确定，工救、农救两会属工人、农民自己的阶级组织，青救、妇救两会和各救总会为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各组织都冠以“晋东南”，而不用“晋冀豫”，是为了利用山西的合法形式，便于开展工作，实际是晋冀豫区全区的组织。到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各救国会都将“晋东南”改为“晋冀豫”。此后，各群众团体的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根据地内群众组织的建立和统一，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准备了条件。

全区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建立和统一后，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运动，成为区委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

此,区委在1939年3月开始对全区的群众运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着手研究群众运动的发展规模和特点。负责全区群众运动工作的区委民运部,在彭涛部长主持下,于3月16日向区委写出《晋冀豫区群运工作总结报告》,初步总结了全区的群众运动工作。该报告将抗战以来全区的群众运动分为3个阶段,即: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2月临汾失守是群众由自发地参加抗战到有组织地参加抗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对不适合抗战要求的政治机构部分地进行了改革;武装了大批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动员大批群众参加到抗日军队中;开始在县一级建立群众抗日团体。第二个阶段从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到8月区委召开会议,9月作出“九月决定”,这是全区群众广泛普遍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并走向统一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各县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和自卫队,开展了改善群众生活、反对贪污的斗争。第三个阶段从区委“九月决定”后开始,进入了全区群众运动走上统一,争取民主,开展生产建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先是以专区,而后以全区统一了各个群众抗日团体;在全区发动了民选村长、反对摊派不公以及反贪污的运动;执行五一减租、分半减息,开始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实行合理负担;在各县推动农救会开办合作社、工救会与富绅合办工厂。据区委民运部统计,这时(3月中旬)全区有组织的群众有130多万人,其中工救会员17万,农救会员82.3万,青救会员11.2万,妇救会员10

万。按地区统计,山西三专区 33.5 万,五专区 47.42 万,七专区 17 万;豫北 2 万;冀西 17 万。

区委在研究了民运部的工作总结后认为,晋冀豫区的群众运动工作虽然已经打开局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群众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做到普遍、统一、平衡和深入,群众工作方法方式一般化,对本区的历史传统和地区性特点估计不足,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群众团体有些官办性,从群众斗争中培养群众领袖与地方干部不够。为使全区群众运动工作更深入地开展下去,区委决定于 1939 年 4 月召开党内的晋冀豫区民运干部联系会议。

这是抗战以来区委专门研究全区群众工作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以上民运干部。彭涛在会上作了《十七个月群众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朱瑞作了《开展巩固深入统一的群众运动,粉碎敌人的新进攻》的报告,朱德总司令到会讲了话,最后我代表区委作了会议结论。会议从 4 月 10 日开到 15 日,共开了 6 天。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晋冀豫区的群众工作,指出其主要成绩是: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参战工作,全区有 6000 余人参加了抗日部队,扩大了八路军、山西新军,普遍组织了游击队;开展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工作,全区有 250 万群众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占全区总人口 800 万的 31%,群众从村到区、到县、到专区直到全区,都有了组织,成为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广泛开展了民主运动,开始进行民主选举村长、区长、县长,群众获得了参政权利;争取了民主的改

善,减轻了苛捐杂税,实行了合理负担,救济灾难民,提出减租减息;培养了大批群众工作干部。会议检讨了群众工作的缺点,认为主要是群众运动的发展没能做到高度普遍、统一、平衡和深入;群众工作方法方式一般化,没有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传统和特点开展工作;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忽视群众领袖与地方干部的培养。针对以上情况,我在会上的总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着重讲了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发言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包括必须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工作的问题,民主、民生与参战问题,战争、群众运动与统一战线问题,战争改变一切、战争创造一切的问题等。第二部分讲目前的中心任务,强调了迎接与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意义、战争动员与动员武装、对敌经济斗争及经济建设、对敌政治斗争与文化建设问题,克服工作上的弱点问题等。第三部分讲如何加强党的群众工作领导的问题,提出党在战时要配合军队开展动员群众参战支前,要主动做好配合工作;党在领导群众工作时要依据敌人进攻的特点来领导群众,要依靠群众,武装群众,战胜敌人;要保证100%地完成党所决定的任务;要发扬民主作风,加强党内团结;要宣传、教育群众;要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大胆培养提拔群众领袖当干部,等等。

这次民运干部会议实际是全区群众组织统一后的培训会议。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通过参加会议,对于群众团体的性质、任务,对于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对于党的

群众工作的政策方针,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把全区的群众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民运干部会后,区党委(根据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委员会的简称由区委改为区党委,县以下分区委简称改为区委)利用形成的新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及时引导群众解决民生、民主问题。民生问题,主要通过进一步实施合理负担政策来解决;民主问题,主要通过开展改造旧区村政权的斗争来解决。

合理负担的口号,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和阎锡山都提出过,其内容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我党在开辟创建根据地时接过这一口号,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认真实行。我们把合理负担作为一项动员抗日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是针对农村中不合理的摊派制度的。在封建地主把持村政权的农村,官府征收田赋和各种附加税时,采用按户摊派和按亩摊派两种办法。按户摊派,不管财产收入多少,地主、富农和农民出一样的负担;按亩摊派,使租种土地的农民承担了替地主、富农出粮款的重负。再加上把持村政权的地主、富农多征少交、贪污中饱,使大部分负担加在农民身上,形成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如果继续实行这种摊派制度,由于战争而增加的军需民用,必然大部分仍要由农民负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1938年宣布废除了旧时期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动员富户多

出。当时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召开群众大会，根据分派给全村的粮款总数，自报公议，按每户土地财产多少评议，一般由地主、富农负担大部，中农负担少部，贫苦农民主要负担勤务。在抗日的大形势下，不少地主、富农主动出钱出粮，只有少数顽固分子抗拒。为了坚持持久抗战，这一年还开展了“囤积救国公粮”运动，动员富户拿出更多的粮款，支援军队和贫苦农民。这时虽然提出过减租减息，并发布过法令，但并没有在根据地内真正实行，只停留在宣传上。但是，由于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广泛宣传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停租停息。合理负担所解决的是政权、军队和农民的关系，实施这一政策把战时财物重负加在富户身上，贫苦农民减轻了负担，恢复了生机，促使了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

改造旧区村政权的斗争，同实行合理负担、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进行。在1938年实行合理负担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把持区村政权的地主、豪绅对抗日政策的抵制。抗战开始时，我们重点抓了县以上政权，到1938年底，专县一级政权基本上掌握在我党和抗日积极分子手中，对区、村两级政权，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重建或改造。日本侵略军进攻太行区时，在保命、保财产的抗日斗争中，地主豪绅的大部分和农民一道支援抗日。打退敌人进攻后，把持区村政权的地主、豪绅照旧盘剥农民。因此，对农民来说，根据地建立后影响其积极性的，一是仍受剥削的困苦



生活,二是仍被压迫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造区村旧政权,让农民掌握区村政权,成为势在必行大事。1939年春,改造旧区村政权的斗争结合反贪污、反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展开。各地由力量已经壮大的农会出面,在抗日县政府的支持下,从检查和清算区村粮款账目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清查结果,罢免贪污、中饱、受贿者,选举或任命新的区村领导。贯彻实行这种办法,把大部分区村政权掌握在农民手中。随着反顽斗争在根据地内的发动,与农民做对、欺压农民的地主豪绅受到规模更大的群众斗争的冲击,加快了改造区村政权的速度。到1939年底,太行根据地内区村政权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这一年,全区各级群众团体一直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九、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

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太行根据地中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于1939年9月10日至28日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对外名义是“民运工作会议”。这时全区已有30150名共产党员，遍布在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党、政、军、群团及广大农村、工厂、学校中。会上总结了抗战以来全区党的工作，提出了会后党的工作任务，选举了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于太行党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党代会是根据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精神召开的。最早提出召开党的七大，是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六中全会批准了以上决议，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各地代表由各地的“代表大会选出”。

1938年12月我们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提出准备召开晋冀豫区党代会，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

会上还决定把抗战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写成报告,报北方局和中央。为了总结工作,区委先后在12月召开了宣传教育会议,1939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组织工作联席会议(简称组联会议),区委宣传部于3月16日写出《中共晋冀豫区委宣传部工作报告》,民运部于3月17日写出《晋冀豫区群众工作总结报告》,组织部于3月写出《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组联会议总结》,区委党校于3月17日写出《十个月来的党校工作》。在各部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3月中、下旬,我主持区委委员会议,研究总结区委抗战以来的工作。朱瑞代表北方局参加了区委的总结会。经过讨论,最后由我执笔,写出《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从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晋冀豫全区工作发展概况及基本总结》。

《发展概况及基本总结》是我们区委第一次就全区工作发展总体情况向北方局和中央的报告。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工作过程上讲党在各个阶段的工作。报告把17个月的工作分为太原失陷前后至九路围攻、粉碎九路围攻至1939年元旦、元旦拥蒋反汉奸运动至3月。第二部分从党的领导工作角度总结区委及各地委工作的经验教训。在这一部分中,首先总结了区委前期的工作,指出在辽县活动分子会议前,省委刚刚组建,工作上争取主动,力求迅速打开局面。但这时我们还不懂得怎样创造抗日根据地,不懂得建立基点的作用,存在着把工作重点放在接敌区域,便于敌进我退时能够“抓一把在手”的被动

观念。

报告接着总结了活动分子会后分区指导各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1938年5月前,省委重点抓了晋中、晋豫两个特委的工作。晋中这一时期工作比较全面,是全区最好的单位,各种工作配合比较好,并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晋中特委领导的特点是大刀阔斧、泼辣敢干。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把握好山西特点,出现了一些“左”的问题。

5月开始,省委重点抓冀西工作,帮助特委从混乱局面中理出头绪来。先从赞皇县的工作开始,以农会为中心,发动农民运动,推动全区工作。

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六月决定”,会后在6、7两月组织领导干部到晋豫、晋冀两区巡视,主要纠正晋豫偏重武装忽视群众工作及晋中“左”的错误,这对全区工作影响较大。经过巡视,两区工作进步都较大。

8月区委组织巡视团到冀豫地区检查工作,根据该区地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的实际,确定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办法,工作突飞猛进获得发展。特别是邢台解决红枪会、磁县选举县政府、黎城整顿党组织,都有典型意义。冀豫工作在这时的缺点,主要是工作发展不平衡,群众运动没有广泛发动起来。

9月,区委派出巡视团到太南地区工作。太南开始时未能转变白区工作作风,表现得比较消沉。但优点是工作稳健。巡视中,指出了工作弱点和优点,使该区工作迎头

赶上。

太岳区是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12个县党的工作都已开展,特别是沁县、沁源,工作都很扎实。该区的弱点是发展不平衡,安泽、浮山党的工作较弱。

以上总结仅是区委初步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研究和写总结报告,对全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9年5月,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出要求各地在年内召开党代会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我在5月20日主持召开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迎接与准备七次大会的问题》的决议和《选举条例》。会议决定在8月召开全区党代会,要求各县委在7月20日左右,地委在7月25日左右分别召开党代会,选举出席全区党代会代表;确定在党代会上的主报告为两个:一是我代表区党委作工作报告;二是组织部长何英才代表区党委作党的建设报告。同时确定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民运部等在会上作专题发言。会议决定组成区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由何英才、徐子荣、陶鲁笏、赖若愚、吴作民5人组成,负责筹备。6月4日,区党委正式发出《关于召集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各地根据决议开始着手进行准备。7月5日,我再次召开会议,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8月7日,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准备委员会发出开会通知,确定9月1日召开大会。各地区在7、8月分别选出代表。

大会筹备时,由于反顽斗争形势已经紧张,日本侵略

军于7月发动了对晋东南的第二次大规模围攻(史称第二次九路围攻),使一些地区未能按规定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代表。全区5个地委中,晋东、冀西两区代表由选举产生;太南地区一部分选举、一部分指定;太岳因战事紧张未能选举;晋豫选出少部分。

1939年9月10日,代表大会在武乡县东堡村正式召开。东堡村在根据地腹心区,距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驻地砖壁不远,比较安全。大会召开时,有各地选出的正式代表135名,另有列席代表137名,总共272名。经过审查,有6名代表不符合条件被取消资格。审查合格的正式代表为:晋东36名、冀西31名、太南21名、太岳14名、晋豫9名、区党委各机关单位14名、北方局机关2名、新华日报社2名,共129名。正式代表中有16名妇女代表。从党龄看,1年以下的6名(规定10个月以上党龄可当选),1年至1年半的41名,1年半至2年的37名,2年至3年的14名,3年至4年的7名,4年至5年的3名,5年以上的14名(不包括区党委的8名负责人)。大部分代表是在创建根据地后入党的。从文化程度看,小学程度21名,中学以上程度56名,大学3名,其余49名为文盲或初小以下文化程度。从职业上看,73名是脱产干部,53名为不脱产党员。从年龄看,20岁以下的19名,21至25岁的68名,26至30岁的16名,31至40岁的16名,40岁以上的仅有3名,绝大多数是青年人。

9月10日大会正式开幕,由徐子荣致开幕词。开幕

式上通过了区党委负责人的代表资格，共 8 人：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彭涛、安子文、王卓如、王树声、黄镇。这 8 人没有参加各地选举。开幕式上还通过了 13 人的名誉主席团和 14 人的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团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爱尔克里、狄亚斯、刚野、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王明、朱德、彭德怀、胡服（刘少奇）、朱瑞。主席团为：杨尚昆、李大章、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彭涛、王卓如、张玺、王孝慈、张晔、刘建勋、程式兰等。大会秘书长为徐子荣。大会向中共中央、朱德、彭德怀发出贺电，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慰问电。张玺在开幕式上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上，代表们向遭受水灾的冀南灾区捐了款。向大会发贺电的有八路军总直属队党代会和八路军总直属队党支部。朱德到会祝贺，受到热烈欢迎。

从 9 月 11 日起，大会进入报告阶段。11 日至 13 日，杨尚昆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报告分 7 部分，即：两年来敌后抗战的基本总结；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阶段与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华北战局的现势；新阶段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根据地准备反攻力量；新阶段中党的任务；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尚昆在报告中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团结，适当改善民生；武装民兵，开展普遍的群众游击战；开展敌占区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等 5 项任务。

在 14 日大会上，我代表区党委作了工作报告。我的报告分三部分：全区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过去工作基本总

结；目前全区党的战斗任务。15日，何英才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报告也分三部分：本区党的历史的发展；两年来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工作。对以上三个主报告，会议分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日彭德怀到会作了一次形势报告。形势报告后，大会进行专题发言。陈克寒讲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刘长清讲壶关县农村支部建设，于林讲赞皇反磨擦，宋子杰讲交通发行工作，张晔讲太南区工作，马更青讲敌区工作，高宗智讲晋豫区工作，王继均讲沁博地区做土匪工作的经验，刘有年讲陵川反磨擦工作，王卓如讲农民运动，李敏唐介绍一个模范党支部，赵国强讲职工运动，申芝兰讲青年工作，秦武山讲党的工作作风，李哲人介绍敌区工作经验，李伯钊讲文化工作。大会专题发言一直进行到26日。

27日，大会进入选举阶段。先选出席七大的代表，后选区党委委员。经过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为：李雪峰、何英才、王孝慈、王维纲、王树声、关山复、陈敬贤、赵武成等。新选出的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有：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彭涛、安子文、王维纲、王卓如、张玺、王孝慈、赖若愚、李哲人、张晔、王树声、程式兰、刘建勋、冷楚、陶鲁笏、吴作民、唐天际、嘉康杰等。

28日上午，杨尚昆作大会总结，下午我致闭幕词后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全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显示，我们党已成为晋冀豫区最大的政党，是晋冀豫区的执政党。会议确



定,全区党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围攻,准备反攻力量。党代会召开时,太行区的妥协投降逆流已相当严重,特别是山西局势的逆转,使反对顽固派的斗争日益突出。会中收到中共中央于9月21日发出的《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指出山西“逆流继续发展,而反逆流的斗争收效不大”。要求“在山西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坚持山西的团结进步与抗战”。因此,大会后期,研究部署了开展反顽斗争的问题,并在东堡召开了士绅座谈会,指出投降妥协危险,号召各界团结起来制止反共投降妥协逆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我在闭幕词中特别强调全区党组织要“反对投降妥协危险,反对防共限共,运用群众的直接力量打击与粉碎山西顽固势力,打破其反共与反进步的行为,停止其逆转,使其继续进步。要准备舆论、准备群众、准备自己”。

## 十、有理、有利、有节开展反顽斗争

开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简称反顽斗争),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为坚持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而开展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抗日的特殊环境中,目的并不是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是为了使国民党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同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

太行区的反顽斗争,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领导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在太行区,我党创建根据地时,三个地区建立政权的情况不同。河北的冀西,由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以合法方式建立冀南行政公署所属的各县抗日政府。河南的豫北,由朱瑞领导的八路军联络处出面,开辟当地的抗战工作,建立抗日政权。在山西的晋东南,由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的第三、第五行政区,合法地委派县长,建立抗日政权。以上三个地区,最早都由八路军派出部队,同地方共产党组织一起,动员组织民众,创建根据地。这三个地区当时都有国民党部队驻扎,同八路军合作抗日。当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区几次发动进攻、围攻时,国

322

共军队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好。特别是1938年4月反九路围攻中,国共军队紧密配合,取得了反围攻的大胜利,奠定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被日军击溃后,部队混乱,士气不振,威信不高,在华北战区处境困难。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人进攻时,高举抗日大旗,动员全民抗战,主动挺进到敌人占领区,一边打击敌人,一边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受到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威望日高,力量日强,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军队要在华北生存,必须依靠八路军和当地抗日政府,因此,双方关系比较融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较好。虽然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中,太行区也曾发生过国共之间的不愉快磨擦,但由于我方的忍让,未能发展成较大的磨擦事件。

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一直对共产党耿耿于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合作,本来就是被迫的。因此,对于其内部的其他右派势力,采取支持纵容的态度。战争初期,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主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使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大大减轻了压力,因此,蒋介石尚能抑制其他右派势力。武汉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现共产党在抗日的同时,其政治、军事势力已深入到敌后广大地区,填补了国民党政治、军事势力撤出后的空白,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敌后纷纷建立和有效地行使权力,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大为惊骇。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改变策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则加紧诱降劝和,以“反共防共”为诱饵,加紧诱降活动。蒋介石受美英的牵制和国内人民的压力,未敢公开降日,但对日方的“反共防共”却有同感。1938年12月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时,明确提出反共防共的意见。会后,蒋介石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防共反共方针,紧接着制定了防共反共文件。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看到时机成熟,在各地开始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抗日阵营内的反共逆流在敌后各地纷纷出现,为敌后抗战蒙上了一层阴影。

太行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重点争夺的地区。

早在1938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时,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政府的意向越来越明显。鹿钟麟到任后,重用反共顽固派头目张荫梧任河北民政厅长,于11月发布撤去杨秀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的公告,向各县另派县长,形成冀南一个县有两个县长、两个县政府的局面。1939年,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为了团结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于6月13日刊登在华北《新华日报》上,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河北问题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毫不让步。彭德怀副总司令持八

大纲领找鹿钟麟会谈时,明确表示必须承认冀南行政公署及其委派的县长的合法性,双专员、双县长的混乱局面必须改变。鹿钟麟自恃有军事实力为后盾,支持纵容张荫梧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进攻,一再制造杀害抗日武装和抗日人民的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8月17日八路军向张荫梧等顽固派的急先锋发起反击,张荫梧弃军逃跑,后被蒋介石下令撤职,冀南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在豫北,国民党顽固派河南第四督察专员郭仲隗保安团于1938年12月4日在博爱县许河村袭击八路军道清支队,打死打伤数十人;在修武县,反共顽固派武装抢夺了县政权,豫北的形势也日趋紧张。

进入1939年后,山西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阎锡山在武功会议,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一改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的态度,以扶持旧派、抑制新派为重点,支持晋军中的旧派将领,取消国共合作组建的动委会,改编山西新军,撤换抗日县长。3月到4月,阎以召开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的名义,把山西的新旧军、牺盟会、动委会、各专区专员等主要干部集中到黄河以西的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企图压迫共产党员交出军队,交出政权。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阎锡山的变化,多次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通过多种渠道做阎锡山的工作,使其与我党我军合作。但是,阎锡山错误估计形势,妄图不顾一切,首先把新军中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调出,将新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然后把共产党在各级政权中的干部全部排除,使专

区县的政权置于其掌握之中。对此,我们始终保持警惕,有所准备。

早在1939年5月,秋林会议刚开完,区党委就根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关于要警惕统一战线中磨擦出现的指示,研究了形势变化的特点,明确提出磨擦是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是不可避免的。在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时,不能一味让步。在6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上,我专门讲了反摩擦斗争与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强调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要发展党,巩固党,依靠群众力量打击反共顽固分子,保卫和巩固现有的抗日阵地。会议刚开完,接到杨尚昆于6月7日写的信,专门讲山西时局的变化和我们的对策。后来了解,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秋林会议及阎锡山的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对山西形势和阎锡山动态作了分析,这封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的。杨尚昆在信中明确指出,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向右转的一个会议”,阎“极力想巩固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想保持山西地盘,认为有了力量,保持了地盘,就是中央不抗战也好,自己还可以偏安一隅,依然关起山西的大门来做土皇帝,这是贯穿这次宜川会议的一个中心思想”。秋林会议“是山西的一个退步”。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继续巩固与扩大山西的统一战线,杨尚昆提出:一,“必须用一切努力,保持我们在山西各方面已得的阵地,决不应轻易地放弃。特别是在军队与政权中”。二,帮助支持新派“巩固阵地”,“巩固新派力量与地位”。

三，“对山西旧势力，应采取争取方针，特别是注意到农村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士绅地主阶级”。“但决不帮助旧军队发展与扩大其实力”。四，“坚决反对顽固分子。这种反顽固分子的斗争，应该成为山西一切进步势力与广大群众的行动”。五，“必须适用目前政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努力开展真正的群众工作，使各群众团体真正成为有群众基础和为群众所信赖的团体，这应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六，要把“地方性的群众武装力量确实掌握在党的手中”。七，“加强党内阶级教育，说明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矛盾性”，“爱护与保护所有公开工作干部”，“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内统一战线的教育”。（以上信中的着重号，是杨尚昆自己加的）。

区党委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进行研究，并把主要精神传达到各地委，要求各地做好应付突然事件发生的准备。同时，特别要求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广为宣传我党的主张，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成为各派、各支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认识，使太行区在反磨擦斗争中处于主动的有准备的地位。

1939年后半年，太行区的反共顽固派在冀西、豫北、晋东南各地频繁制造事端，我们不断接到各地发生磨擦

的报告。在第一次党代会前，区党委整理了一份冀西磨擦的材料，通报了发生在冀西的磨擦事件和我党、我军、抗日政府处理这些事件的对策及经过。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我们明确提出全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开展反妥协投降斗争，号召“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克服妥协投降危机和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为了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争取中间势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在根据地内召开了士绅座谈会、群众大会、干部形势教育会等，讲清形势，说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中共山西省委名义公开发表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提出“巩固山西各党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的倒退”。10月，彭德怀奉命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他走前，要我们时刻提高警惕，要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彭德怀沿路视察八路军和新军，强调做好工作，特别要把新军各部队掌握在我党手中。在沁源，彭总还向牺盟会、决死一纵队和第三行政区内的党员干部发表了《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的讲话。

到11月份，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把年初五中全会确定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改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准备向华北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在太行区，国民党军队于11月调



整军事部署,以位于沁水、阳城、屯留、长子地区的国民党93军、27军,中条山地区的7个军,吕梁山区的阎军一部,压迫太岳区决死一纵队及晋南的新军212、213旅;以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率领的独8旅等部及太南地区国民党的4个军,包围压迫决死三纵队、第五专署及八路军344旅、晋豫边支队等部;任命97军军长朱怀冰为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河北省民政厅长,并令该军进至冀西邢台县山区鹿钟麟的省政府附近,企图与10军团暂编第3师、孙良诚的铁军、张荫梧的民军、别动第四纵队侯如墉、冀察二路夏维礼等部配合鹿钟麟,控制冀西地区,切断山区与平原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11月下旬,孙楚结合太南的国民党军,加紧部署对晋东南三、五专署及决死队、八路军的进攻。形势已到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

12月初,阎锡山在晋西发动事变,集中6个军的兵力围攻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率先发动反共高潮。晋西事变很快向全省蔓延,演变成山西十二月事变。由于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华北敌后的反顽斗争成为一时最紧急的任务。

事变发生前,太行区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首先是在11月3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在冀西黄北坪召开了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投降妥协必首先牺牲华北,故反妥协投降即是坚持华北抗战之一面。必须把反投降与坚持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两种口号

联系起来,把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联系起来。”要求党政群团“一切重要部门要把握在可靠分子手中”。我在会上主要讲了要保持党的领导机关的纯洁性,绝对不能让顽固分子的代理人混入领导机关。要动员各级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好政权、武装工作,把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团结起来,要清除顽固分子。第二个会议是以区党委名义在辽县芹泉召开的各界座谈会,129师的倪志亮、黄镇和区党委的徐子荣都去了。徐子荣易名徐文中代表区党委阐述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主张,明确指出山西投降妥协已出现严重的危险倾向,“现在,这种逆流已经袭入了晋东南”。在这种形势下,“要对那些制造磨擦、制造分裂的妥协投降分子给以严厉打击”。

两个会议刚开完,收到中共中央于11月19日发出的关于山西反投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以理直气壮的姿势,坚决地有步骤地”开展反投降斗争,“对于最坏分子最坏行为,须毫不犹豫地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有胜利把握地打击之”。根据中央的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把太行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了部署:以386旅、344旅、晋豫边支队等部活动于武乡、襄垣、平顺、壶关、阳城等地,掩护和支持三、五专区政权及决死一、三纵队的反顽斗争;以385旅、冀西游击队等部活动于内邱、宋家庄、松烟镇之线以北地区,并控制青城镇、白鹿角等要点;调青年纵队2团、东进纵队1团由冀南进入冀西,协同先遣支队控制内邱、宋家庄、松烟镇之线以南、邯

长路以北地区,以保障太北、太南的联系,同时加强太行和冀南地区的联系。在冀西,争取了国民党冀察游击第2路第2师范子侠部宣布脱离国民党,参加八路军,改编为平汉抗日游击队,范子侠任司令员。这些有力的措施,使我军处于主动的地位。

晋西事变发生前后,在晋东南的阎锡山军队和国民党军联合向决死队、牺盟会、抗日县政府发动进攻。在晋东南,孙楚根据阎锡山的指示首先发难,以其第八集团军进攻决死一、三纵队,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阎锡山命令第19军所辖的暂编第2旅、新编第2师分别从晋东北南下,向晋中地区发动进攻。中央军第93军和第27军由晋南向北进攻晋冀豫根据地,配合阎锡山部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刘、邓指挥129师主力,首先集中打击最嚣张的孙楚,暂时中立太南国民党军。孙楚被打后,向西撤退,在太南的国民党军暂时未动,太南稳定下来。

在冀西,刚上任的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河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到处抢占八路军的要点,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抢劫物资,公开叫嚣“驱逐八路军”。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朱怀冰谈判,劝其停止反共反八路军。但朱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制造事端。在忍无可忍之下,八路军先后向顽固派军队侯如墉部、乔明礼部先行打击,将其主力歼灭。朱怀冰仍不悔改,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包括129师、南下支援太行区反顽的晋察冀挺进支队、

冀中警备旅等部)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朱怀冰部万余人。为了争取顽固派继续抗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没有穷追残部,给其留下了一条生路。3月,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达成划定两军边界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北面为八路军活动地区,南面为国民党军队驻扎范围。此后,太行区国共军队暂时处于互不侵犯状态,保持着共同抗日的局面。

反顽斗争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同我党、我军和抗日民众的矛盾,是抗战特殊环境中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顽固派一再制造磨擦,挑起事端,其目的是为从抗日军民手中抢夺被他们丢给日本侵略者的地盘,扩充其实力,扩大其统治地盘。抗日军民当然不会拱手把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经过艰苦奋战解放的地区交给国民党顽固派。我党我军不答应,广大抗日民众也不答应,因此,要发动反顽斗争,打击最反动、最顽固分子。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还没有公开降日当汉奸,我党我军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抗日阵营中,因此,在打击的同时给其留以出路,并晓之以礼,力争团结其抗日。这就是毛泽东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 十一、黎城会议与根据地的统一

1940年初,晋冀豫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9年7月日军向晋东南地区发动大围攻(史称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纵贯晋东南的白晋公路(祁县白圭到晋城),开始修筑白晋铁路,在沿途驻重兵,把晋东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同时,日军占领了邯长公路(邯郸到长治),太行区又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这样,晋冀豫区实际被日军以“十”字分为4部分: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南的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的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的晋豫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对被分割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北方局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于8月初决定将统一的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分为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黄克诚)、晋东南军政委员会(书记薄一波,领导山西三、五专区和决死一、三纵队)。反顽斗争后,上述四区实际上已处于进一步被分割局面,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晋冀豫区正式分为四个区域,成立四个区党委,即:晋冀豫区党委,领导太北地区党的工作,我任书记;太南区党委,领导太南地区党的工

作,张玺任书记;太岳区党委,领导太岳地区党的工作,安子文任书记;晋豫区党委,领导晋豫地区党的工作,聂真任书记。新成立的晋冀豫区领导的范围,实际上就是太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地区。为了统一对原晋冀豫广大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3月底决定,撤销太南、晋东南军政委员会,太北军政委员会改名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南和原晋冀豫区的工作。

区党委领导的范围缩小后,区党委领导人做了调整。我任书记,徐子荣为组织部长,薛迅调回区党委任教育部长兼区党委党校校长,彭涛任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黄镇任军事部长,程式兰任妇委主任,刘南生任青委主任,吴作民任秘书长。区党委委员还有王卓如、赖若愚、刘建勋、冷楚、陶鲁笏等。这时区党委领导4个地委、29个县委和两个直属县委(辽县、黎城)。全区共有24978名党员。

为了研究全区党的工作,在3月份,我主持召开了有各地委书记、直属县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顽斗争后如何巩固太北根据地的问题、如何改变党的工作作风问题、如何加强对政权的领导问题和如何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组织春耕运动的问题等。在这次会上,我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巩固根据地与依靠群众的问题。“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在1939年春就提出来了,以后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经过反顽斗争,我们认识到太行这块抗日根据地还不够巩固。主要表现是顽固派

从各方面破坏根据地,从各方面限制根据地的发展。反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仍停留在局势混乱时期的工作作风和方式上。正因为这样,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异己分子乘机贪污,欺凌群众。这是导致根据地不很巩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人不懂得,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违反群众利益,以取得群众的拥护。只有满足群众的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完成各项任务。这些人虽然口头上也喊叫巩固根据地,但事实上都在摧毁根据地。我在指出上述问题后,提出:“我们要爱护根据地,就必须同时和首先要反对摧毁抗日根据地,反对剥削阶级意识,反对抓一把。”我们的各级干部“首先奉公守法,遵依各种制度,不滥捕人,不乱杀人,不勒索、不乱筹款,这才能安定民生,取得各阶级的拥护,使政权起强力的杠杆作用”,这种政权“必须建筑在广大的民主基础上,建筑在正确的政策上,用正确的政策和民主制度,来依靠群众和团结各阶层”。“为了巩固政权的威信,政权就必须依靠群众,一切服从战争而又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我们要明确了解,巩固根据地的关键,在于谁能获得群众,取得群众拥护”。

二是关于深入工作的问题。1939年春,我们提出“深入工作”的口号,要求各级领导把大刀阔斧与点滴作风结合起来,深入地开展工作。但是,一年来,工作仍没有深入,潦草从事、匆忙急躁、只图迅速、一味行政命令等恶习仍普遍存在。因此,在会上我提出了点滴作风和具体领导的问题。点滴作风,是深入工作、巩固组织的基本作风;是

有计划、经常、具体、切实，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自下而上、脚踏实地、最富于组织性、富于事业精神的作风。点滴作风要表现在具体领导上。具体就在于明确，在于恰当——恰如其时、恰如其地、恰如其分，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时机与不同的工作方法方式，就是具体。具体领导，包括具体分析、具体办法、具体兑现、深入动员、恰当方式、严格检查、及时帮助。具体领导，表现在会议上，在讨论问题时，有头有尾，源源本本，弄清楚，有办法，切合实际。工作中，对每一个工作地区，每一件事，每一个问题，都要求考察各个不同特点，给以不同解决。把点滴作风和具体领导紧密地联在一起，就能够深入工作，巩固组织，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是关于加强对政权的领导问题。太行根据地在反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弱点是政权没有统一，许多同志不曾有过领导政权的经验，养成许多同志对于政权不尊重，不懂得掌握政权的方式和艺术，不会系统地进行政权工作，甚至使政权“节节脱节，节节被包办”，以党代政十分普遍。在会上，我提出要首先从实际上打通各级政权，深入村政，建立系统而民主的权力机构，树立对政权尊重的态度。如果政权不能真正统一，就不会有真正的力量；没有力量也就不会有根据地的真正统一和一致。针对反顽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未经政权同意而乱捕、乱杀、乱要钱物的问题，我强调要在事实上、法律上和习惯上，体现抗日民主政权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



的联合政权，必须有立法和司法，有法律和法庭，有锄奸和公安，有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没有这些的建立和完善，根据地无法巩固。为了巩固政权的威信，政权就必须依靠群众，一切都从战争而又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也就是从改善民生、爱护民力出发，从统一、秩序和持久战的观点出发。为此，“必须尊重政权，建立政权的统一领导，改造行政机构，废除公文程式，吸收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各级政权，特别是依靠群众工作的开展，彻底改造政权，建立村级民主政权，使政权与广大群众结合为一体，能够依靠群众力量，开展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锄奸，保卫各条工作战线上的工作。”

四是关于胜利完成春耕运动的问题。根据地内的军需民食，主要取之于农村，依靠农民。但是，抗战开始后，敌人的抢掠破坏，大批军队的进入和政民干部的给养，使本来就贫穷的太行区农村资源枯竭，民生凋敝，耕地缩减，物价暴涨，农民处在啼饥号寒之中。早在1938年3月召开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时，省委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反顽斗争开始不久，区党委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已十分明确。因此，1940年1月31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指出：“以全力进行春耕，对于巩固根据地，解决军民食粮，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真正进一步地依靠群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求动员全党的力量，动员所有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力量，开展春耕运动，力争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要求县村设春耕委员会，领导

春耕运动。各级干部要深入农村调查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发动。这是根据地第一次组织领导农民进行生产的运动。指示发出后,春耕运动很快在根据地内发动起来,干部积极活跃,群众兴奋热烈。特别是经过调查研究和春耕检查,进一步了解了下层组织的实际情况,了解到部分农民土地关系及租佃关系问题,宣传了抗日政府法令,进行了必要的社会统战工作。为了组织督促春耕工作,区党委组织了春耕检查团到各地去,大大促进了春耕运动的开展。在这次会上,我在肯定上述成绩后,主要强调要通过深入的春耕检查工作,进一步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巩固党与群众组织,巩固政权与群众的关系,要在春耕运动中在基点地区创造实验村、实验支部,推动巩固根据地的工作。

三月会议,是反顽斗争后检查总结前段工作的会议,对于以后贯彻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起了准备作用。

黎城会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由于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晋东南的黎城县召开,因此人们习惯上称1940年4月召开的此次会议是“黎城会议”。

反顽斗争告一段落后,中共中央于1940年2月1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全党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发展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并提出了十大具体任务。

同时，中共中央向北方局发出《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抗日民主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革命的专政”，“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总结了反顽斗争的经验，提出我党在抗战中的策略。以上决定、指示和报告，指明了反顽斗争后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为贯彻以上决定、指示和报告精神，总结反顽斗争经验教训，部署华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在4月11日到4月26日开了半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

黎城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小会，从11日开始到15日结束。在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下，先传达学习了上述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各个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各区情况。我记得参加小会的有：杨尚昆、李大章，冀南的杨秀峰、宋任穷、李菁玉，太岳的薄一波、安子文，太行的李雪峰、李一清、黄镇等。129师参加会议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朱德在会议中间到会讲了话后就离开了太行。会议开始后，把戎子和叫去参加了会议。学习完中央文件后，各个区党委汇报各自的工作。太行由我汇报，我主要讲了

反顽斗争后的形势及区党委3月会议的情况。杨尚昆、邓小平听得很仔细，不断插话问了几个问题。冀南区党委由李菁玉汇报，太岳区党委由安子文汇报。杨秀峰、宋任穷、薄一波等做了补充发言。

会议的第二阶段，参加人数扩大，主要是听报告和讨论报告。我记得报告地点在黎城县北面的北社村一个大庙中。太行区的几个地委书记参加了大会。大会从16日开始，先由杨尚昆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政治报告，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阐述了我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代表北方局提出了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重点进行建军、建党、建政的三位一体的任务。21日，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报告，薄一波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22日，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讲话。

报告之后，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对中央关于策略问题的指示、北方局的三大建设，大家认为很及时。在会前，一部分干部因反顽斗争中顽固派的表现，对地主、资产阶级是否还要团结，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府中是否还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发生了动摇。一些地方出现乱捕、乱杀现象，排斥地主、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政权，提出根据地内的政权“在政策上是统一战线的，而在其阶级实质上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的

观点。另一部分干部则认为对顽固派应作具体分析，能争取的应争取。至于没有参加到反共反人民活动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只要拥护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都应吸收其代表参加到抗日政权中来。会上传达了中央2月1日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后，统一了认识，澄清了混乱思想。在此基础上，决定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块根据地。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用建立联合办事处的方式，统一三块根据地政权。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同时，统一财政经济政策，实行统收统支，并根据中央同意的北方局4月1日提出的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办法，邓小平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讨论策略问题时，许多同志提出，应立即制止在反顽斗争中出现的乱捕、乱杀的严重倾向。针对这种倾向，北方局在会中提出了保障人权的意见，要求各地立即执行。区党委根据北方局指示，会议还没有开完，就以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随便捕人杀人行为，县政府不经专员公署批准没有杀人权，区村政府没有捕人权”。这个通知纠正了乱捕乱杀的违法行为。会议结束后，山西第三专署颁布了《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向社会公布。保障人权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制止反顽斗争后期出现的“左”的偏向，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各阶层民众，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一

些迁出根据地的富户,在保障人权政策公布后陆续迁回。

在执行保障人权政策中,也发生了一些右的偏向,主要是过分强调了团结中间力量,对顽固派地主没有区别地保护,对一些积极分子群众施加了压力,整了一部分干部群众。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发动群众,一些地方在强制执行中客观上给群众泼了冷水,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以后区党委发现这种消极影响,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这种消极影响直到1942年大规模发动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后才消除掉。由于以上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如编并地方武装为正规军等),会议后在评价黎城会议的功过时发生了争论,直到1943年1月温村会议时仍在争论。温村会议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召开的。针对会上对黎城会议的不同看法,分局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黎城会议“功绩表现在:甲、确定了建设与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明确观念,解释了中央关于巩固根据地的三个基本环节(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特别注意在大磨擦之后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明确了统一战线的观念。乙、执行了40年4月三大建设(建党、建军、建政)的方针,提出了‘十年树林百年树人’的精神,初步确定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开始财政经济的建设,规定了许多‘爱护民力发扬民力’的具体办法,并获得很大成绩,打定了几年坚持斗争的基础。丙、纠正了当时的混乱,克服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巩固了各阶层的团结。丁、实行了政权军队的统一,建政建军收到相当大的

成绩,政权威信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大大加强”。关于黎城会议的缺点或错误,邓小平认为主要表现在:“没有估计到群众运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多少带有平均方式”,“没有足够认识到当时许多地方发动群众工作很差,没有把群众运动提高在应有的位置”;“在纠正混乱的‘左’的现象中,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大转变”,“更多的着重了行政的、组织的办法”;“发生了对于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两方面的错误”。以上缺点和错误,在1940年9月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黎城会议结束后,三大建设立即加紧进行。建党工作主要是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建军工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进行,主要是对129师、军区、军分区进行整编和对部队进行整训。129师扩大到12个旅,山西新军中的决死一纵队、决死三纵队和212旅编入129师序列。调整了军区、军分区,成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军区,129师兼太行军区,386旅兼太岳军区,冀南军区为独立的战略区。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其活动范围和5个地委相同。

建政工作主要是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8月1日,冀太联办在涉县宣布成立,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任,下辖太行、太岳、冀南3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个县。太行区是冀太联办直辖区,分5个专区、36个县。冀太联办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边区从分散走向统一,从此,根据地内不再存

在双重政权,统一由冀太联办领导。冀太联办公布了施政纲领,共 20 条,是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准绳。以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政策,使根据地逐步走上法治的道路。

在黎城会议上,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将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冀南、太行、太岳区的党政军工作。自从邓小平到太行后,我就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深切体会到邓小平的雄才大略。在他和刘伯承领导下,太行区内党政军一直团结得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在我的一生中,太行十年在刘、邓领导下工作,是最愉快的时期。



## 十二、第一次整党与实验县工作

黎城会议前,太行区根据本区实际已提出整党问题。抗战开始后,大量发展党员,是我党组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共产党员仅有30多人,远远不适应开辟、创建根据地,发动组织开展抗日斗争的要求,因此省委提出“大大发展党”的口号。到193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时,晋冀豫区的党员已发展到8600余人。这次会议提出“再扩大党一倍”的口号,到年底,党员人数已超过2万人。1939年9月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时,登记的党员人数有30150名,是省委成立时的100倍。不到2年时间,党员人数迅猛发展到3万,这是组织建设工作上的一大成绩。这时,在晋冀豫区内,共产党已成为最大的政党,成为根据地内的执政党。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我党成为全区工作的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使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领导了全区的抗日斗争。在这一时期,我们比较好地完成了中央提出的“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任务。

这样大量发展党员,同白区时期采取严格审查相比,很难保证每一个党员都能达到合格的标准。当时由于强

调“大量”，因此出现了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发展党员的现象，有的甚至出现用拉夫式的方法不顾条件地登记党员。结果，使许多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人混入党内。为此，我们很快在1938年6月工作会上提出“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的要求。但是，这次会上仍提“大大发展党”的口号，因此未能有效地制止拉夫式的发展党的倾向。刘少奇1938年8月18日给省委的指示信明确提出“要反对拉夫主义”，指出“目前公开提出发展党员若干万的号召，也不妥当”。我们对这一问题已有亲身体会，因此，在9月以后，开始注意纠正拉夫式发展党员的错误倾向。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党的原则是：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个时期的清理、整顿与巩固，然后再发展。要保证全党内工人、雇农、手工业者、劳动农民占优势。会上批评了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与拉夫主义，要求必须纠正这两种现象。我们在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中，提出了纠正拉夫式的突击或竞赛的发展方式的意见，并在1939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组联会议研究了纠正的措施。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提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从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要进行审查党员的工作，加强对党员的马列主义教育、阶级教育与党

的教育。根据中央的指示,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我代表区党委宣布:暂停发展党员,对新发展的党员重新审查登记。经过审查,清洗坏分子和劝退不合格分子,吸收经过斗争考验的工农分子。同时,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

第一次党代会后,由于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顽斗争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审查登记新党员的工作未来得及展开。在反顽斗争中,不少新党员经受不住考验,发生了问题。实践说明,采用群众运动式的方法发展党组织,势必不能很好地掌握入党条件,不能严格审查发展对象。大批不合格党员进入党内,使纪律严明、战斗力特强的党组织受到影响。省委发现,在全区党组织中,脱离群众的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在许多干部中严重存在;干部贪污腐化的现象和叛变逃跑的事情不断发生;一些下层组织领导成份复杂,富农、流氓把持着党的领导,欺骗党,压制同志,利用党欺压群众,给党以很大的损害。有的地区在反顽斗争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到1940年春季,这种党组织的不巩固和混乱及党员成份复杂的问题,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极大障碍。省委研究后认为,如果对现在的党组织不加整顿,不肃清组织的混乱,我们整个工作将不能从现在的阶段上再提高一步与前进一步,甚至会向坏处发展。正在这时,中共北方局召开了黎城会议,决定在进行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过程中,对现有的党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在整党中建

党、巩固党。

会议还未结束，区党委就召开了全区第二次组织联席会议（简称组联会），根据会议精神，安排整党建党工作。整党的重点是针对党内成份复杂的状况，进行清理整顿，保持党内成份的纯洁，加强阶级骨干力量。建党的重点是在整党的基础上着重抓好支部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支部。整党工作进行了大约4个月左右时间。经过整顿，严重的组织混乱现象基本上或大部分肃清，组织面貌初步清晰了。党员成份特别是党的下层领导成份有了很大的调整，即工人骨干与贫雇农成份显著增强。严重的党内思想混乱现象基本被克服，党员对党的认识进了一步，干部接近群众的意识大有进步。提拔了一批新干部，调整了党的组织，党内生活特别是支部生活有了进步。

经过这次全区性的整党，太行区党员人数和党员成份发生了变化。1939年11月统计，全区有36111名党员，经过第一次整党，到1940年8月党员人数为24978名，减少了11133名。8月份的统计中，还包括了在整党中发展的新党员。原有党员中不符合党员条件和不参加党的生活，整党中不同党组织联系的人数，比区党委原估计的要多。整党后，全区党员的成份为：产业工人占0.12%，手工业工人占0.49%，雇工占9.7%，贫农占48.3%，中农占39.3%，富农占1.03%，知识分子占0.02%，商人占1.02%，流氓占0.02%。

在整党中，实验县的工作，是区党委的一项卓有成效

的工作。设立由区党委直接领导的实验县,用以典型示范总结经验,指导全区,是在第一次党代会上提出来的。开始,依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中央根据地内建立兴国模范县的例子,提出建立模范县。区党委还在1939年10月3日发了一个《六个月模范县建设的主要标准》。后来考虑用实验县的提法,更能反映区党委以点带面的指导思想,改为实验县。当时确定的区党委直接抓的有辽县、黎城、武乡、榆社、和顺5个县。后来武乡、榆社、和顺改为地委的实验县,区党委只搞辽县、黎城。百团大战后,实际上区党委抓的实验县只剩下由我直接负责的辽县。

辽县是129师和省委进入太行山后开辟、创建的最早根据地之一,师部和省委(后来的区党委)较长时间驻在这里。后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也进驻辽县。因此,辽县是太行区以至华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里既有雄厚的党的基础,又有较多的党的领导机关,驻扎的八路军也较多。为了加强对辽县实验县的领导,区党委确定由我和彭涛指导该县党的工作,并调整了县委领导班子,由杨待甫任书记,程平任副书记,翟英任组织部长,于野平任宣传部长。1939年10月彭涛代表区党委到辽县宣布了区党委的决定,召开了建设实验县动员大会,提出了创建实验县的标准和任务,要求辽县“争当兴国第二”。区党委要求辽县在粮食、民主、民生、武装、生产、群众团体建设和党的建设7个方面做出成绩,创造经验。

区党委指导实验县的工作，不是指导具体地如何完成各项任务，而是着重实验如何根据区党委确定的工作方针，深入工作，巩固组织，起示范作用。实验工作开始时，正是太行区内顽固派制造磨擦，局势紧张混乱的时期。这时区党委提出“经过严重斗争，争取时局好转”。为了组织反顽斗争，区党委要求实验县首先搞好支部建设，建立坚强的党支部。在辽县，提出建立实验支部，创造模范支部的要求。在确定实验支部时，对全县136个支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中挑选了15个实验支部，由县委和区委领导分别包点，抽调干部以创造基点的名义帮助支部工作。这时，我党在根据地内尚不公开，党支部和党员不能公开身份，而是以政权、武装、群众团体、教师等名义活动，起领导作用，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使党支部在群众中实际上成为坚固的堡垒和领导的核心。在反顽斗争中，组织发动群众揭露反共顽固分子的破坏阴谋，使他们陷入孤立，从气势上压倒反共顽固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发动群众囤积救国公粮，开展扩兵运动，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屯粮2.2万石，征款8万元，扩兵1000多。在创建模范支部中，培养了一批干部。在1940年4月区党委召开的第二次组联会上，辽县县委组织部长翟英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建设实验支部的经验。翟英的发言经过整理发表在区党委机关刊物《战斗》1940年增刊第二期上。

黎城会议后，实验县的工作进入第二期。这一期是在

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根据地从混乱走上统一,进行整顿和建设的时期。从激烈的、群众性的斗争转向较为正规的整顿、建设,这是一个大转变,是很陡的转弯。这时,整党建党成为实验县党的中心工作。通过整党建党,纠正“左”倾偏向,加强政权建设,坚决贯彻新政策。在整党中主要解决党员成份、党员教育及支部领导三个基本问题。通过解决这三个问题,为建党打下基础。辽县在整党中注意解决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把整党和建党紧密地联在一起,用党的政策团结群众,通过政权保证民主政策的正确执行。

在指导实验县的工作中,我在1940年7月写了一篇《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文章针对普遍存在的党的干部虽然深入基层,但未深入群众;到了下面但不会自下而上工作;身在村乡精神还在县区的问题,提出要研究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研究在群众里面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以进一步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在文章中强调干部要尽量地不脱离生产,参加生产,强调“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工作的转变首先决定于干部的转变,决定于干部意识的转变”。“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接触打成一片的地方去深入群众”。“从群众里面,自下而上地艰苦工作,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方式,这才能真正深入工作,才能发挥基点作用,才能取得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

使群众动起来”。

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问题，是党在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贯彻始终的问题。中共中央在1939年11月1日作出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指出“一切不了解群众、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党部与党员，都不是好的党部与党员”，要求在目前时期中，全党要“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在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进行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中，区党委在1940年12月初召开了研究党的建设的工作会议，我在会议开始的第二天（12月5日）作了《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的报告，着重讲了党与群众工作问题。当时，敌人的大“扫荡”刚刚结束，敌人在百团大战后的报复“扫荡”中大肆烧杀抢掠，根据地人民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这时，只靠宣传动员很难鼓起群众信心。这次会议就是要研究党如何进一步深入群众，研究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使党的工作同群众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密切党与群众关系。在报告中，我分析了太行区面临的严重情况，预计1941年根据地将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面对困难，群众必将承担比1940年更多的负担，群众对党则会有更高的要求。我分析，群众对党和抗日政府的要求是“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身家性命，直至要求保卫生活自由、民主自由，要求保卫根据地，要求民主政治——要求自己管理自己，



要求巩固既得的生活利益”，“要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更普遍的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十分关心、寻求与解决群众的切身要求，把群众切身要求与抗战对于群众的要求结合联系起来，在发展群众运动，深入群众工作上，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3年来只顾要求群众，而忽视对于群众要求的满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当前要通过各项工作，解决群众的要求与抗日的要求之间发生的矛盾。领导的责任，正在于研究这些矛盾的各方面，研究矛盾的实质与具体内容，寻找其客观的联结点与一致性，把它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上与认识上一致起来。我提出，在群众的组织上，必须依据群众的具体要求组织群众，通过组织群众，保卫群众的既得利益和要求，从这种要求上巩固群众组织，“随时把握和发挥其政治上、思想上的要求，提高群众的了解，教育群众”。“从群众所要求了解与所能了解的问题上给群众解释，把党的政策与群众了解结合起来”。这些认识，都是经过3年的实践，特别是从1940年的三大建设和百团大战后根据地出现的问题中总结出来的。

## 十三、根据地内的民主建设 与边区政府成立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问题，也是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问题。抗战爆发后，我党在开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面对国民党各级政府纷纷遣逃的混乱局面，把改造旧政权，组建抗日新政权作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新体制的基础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我们在太行区建立新体制时，一方面吸收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内工农民主政权的内容，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坚持工农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和参加政权管理的权利，继续维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各种利益；另一方面，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将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都包括在抗日民主政权之内，给他们以应得的权利，团结他们抗日。为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新体制，刘少奇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10月16日以陶尚行名义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为新体制勾划出一个轮廓。我们在太行创建根据地时，最初就是按照这一文章提出的体制，结合当地的实际，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将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概括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要在华北、华中、西北各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指出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这种政权中,要实行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的“三三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抗日民主政权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冀太联办的组成人员成份,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同各方面协商后组成的。邓小平1940年底在辽县三里庄主持召开县委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传达北方局黎城会议和9月高干会议精神,研究三大建设问题。会后,紧接着召开晋冀豫区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重点研究和讨论了政权建设工作,特别研究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确定1941年把进行村政权大选作为四大任务之一。

1941年1月5日,我在《战斗》第48期上发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纲领》,提出为完成建军、建政、建党三大任务,完成武装、财政、生产、民主及开展沿线工作的具体战斗纲领。我在该文中提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具

体实行各级政权的“三三制”，准备村选工作。为此“必须自上而下有计划地组织领导，更必须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11日，华北《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指出1941年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的建设事业之一是政权的民主建设，在根据地内“建设一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统一战线性的抗日民主政权”。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成为1941年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晋冀豫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各根据地首先开展了村选运动，继而进行县选，为召开边区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进行准备。

太行区的村选运动，原计划从1月开始。后因发生皖南事变和开展反“扫荡”推迟到5月。冀太联办和区党委及各地、县党政群领导分别深入到各区村指导村选运动。村选大体经过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公民登记、划分选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等过程。村民先选出代表召开村民代表会，最后选出村长和村政委员，建立村政委员会。根据地内民众参选积极性很高，大多数村庄投票率在80%以上，有的达到95%，选出村长和村政委员会，群众都要为其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经过村选，广大民众提高了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新的村政权农民占绝对优势，一般都在80%以上，富农和开明士绅占15%左右。各村都有妇女参加村政权。

村选开始后，我写过一篇《论村选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战斗》第49期上。在这篇文章中，重点强调应选好代

表和开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直接体现选民的意愿,代表大会则决定全村今后的政权由什么人执掌,怎样使村政权为广大选民服务,组织今后全村的工作,组织人民生活,兴办公益事情。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政治民主、社会民主,正处在一个新的时期,而继村选之后的正规的县选与边区大选的实际准备,又将放在各阶级先进人士的身上来了”。“‘百尺高楼从地起’,我们要切切实实的、郑重其事的求得村选的胜利,使今后民主政治的推进获得有力的保障。”

村选准备时,区党委和太行军区联合召开了太行军区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总结 1940 年的工作,提出 1941 年地方武装建设的任务。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重点讲目前的形势与党的政策。王树声总结了 1940 年军区的工作,提出了 1941 年军区建设的任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到会作了军区建设中诸问题的讲话,刘伯承作了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讲话,王树声作了会议总结。这是太行地方武装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特别是 1940 年百团大战后期暴露出来的地方武装发展较慢,将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后地方武装力量较弱的问题,强调要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确定地方武装由军区、军分区、县、区、村五级组成的体制。会上,邓小平指出:“所谓武装建设,应该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等三方面的建设,这三种抗日武装和半武装力量,在抗日斗争中是缺一不可的,而将三种武

装与半武装力量结合为一个整体,以进行胜利的武装斗争,则是军区的责任。”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把一切地方武装置于地方党的政治领导与监督之下,保证党在武装中的绝对领导,是极其重要的”。这次会后,太行区的人民武装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月,全区开展了民兵大检阅;4月1日冀太联办和太行军区联合颁布《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暂行条例》,规定从边区到县、区、村都建立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其任务是领导人民武装,进行群众游击战争,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维持抗日治安,担任抗日勤务。条例规定,民兵为人民武装的高级组织,是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骨干。各级武委会领导由选举产生。5月7日,区党委作出《关于目前武装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加强人民武装工作中,开展武委会村选运动,以发扬人民武装的群众性、积极性,真正使武装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5月26日,晋冀豫区武委会筹委会颁布《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工作纲领草案》,6月到9月,根据地内从下而上进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各级武委会领导,建立起自己的管理体系。武委会的民主选举,推进了根据地内的政治民主建设,推动了人民武装的发展。到1941年底,太行根据地内有组织的民兵发展到50500人。建立抗日武装,是根据地内抗日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包括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部分。人民武装由自

卫队和民兵组成,自卫队由 16 至 55 岁的抗日民众组成。民兵是自卫队的骨干,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由各级武委会领导。民兵在平时受政府指挥,进行自主活动,不脱离生产。在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接受正规军或脱产的游击队指挥。

太行区内民主政治建设高潮,是选举边区参议会议员,召开临时参议会,正式建立边区政府。这项工作早在 1938 年 4 月 5 日和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晋冀豫边游击战争的指示》和《关于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就已提出。当时中央的意见是在晋冀豫边区建立如同晋察冀边区一样的抗日民主政府。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特别是反共顽固派在晋冀豫区不断制造磨擦,使这一工作未能推进。反顽斗争结束后,为统一全区的政权,先建立了过渡性质的冀太联办,为正式建立边区政府作准备。

1941 年 2 月,北方局开会讨论成立边区政府问题,决定由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向冀太联办提出召开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边区政府的意见。为此,冀太联办于 3 月 16 日至 4 月 5 日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3 月 16 日,邓小平向冀太联办送交北方局《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提出在抗战 4 周年时召开临参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3 月 18 日,冀太联办会议决定接受北方局的建议,邀请各界组织筹委会,领导全区推选参议员,积极准备召开

临参会。3月29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作《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的报告，详细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

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为筹备临参会的召开，决定正式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由杨秀峰任主任。为什么决定这时召开的参议会是临时而不是正式的呢？主要是由于这期的参议员不是采用直接平等的不记名投票来选举，而是用推选的办法产生。推选办法是一种临时办法，因此参议会用“临时”表明其局限性。但是，临参会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人民代表机关，是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大民权，决定全区施政方针，审议各种法令及审查批准财政预算。第二次行政会议确定，临参会由133人组成，其中20人为冀太联办行政会议委员。133人体现“三三制”原则。因此，在推选临参会参议员时，先由各党各派各界各救国团体选出代表组织临时代表会，在代表会上以民主方式选举参议员。允许各党各派各界各救国团体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候选人在该选举区或团体提出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从事竞选活动。同时规定，临参会聘请不超过10人的参议员，以解决敌占区不便公开办理推选工作地方的爱国领袖及积极抗日的学者、绅商、专门人才。

4月5日，北方局向第二次行政会议提出《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十五项主张》。十五项主张的主要内容有：  
1. 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与晋冀豫边区人民共存亡。2. 与



一切抗日党派亲密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3. 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4. 加强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5. 加紧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行民选各级政府。6. 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7. 确实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8. 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增加工业生产。9. 加强农村阶级团结,增加农业生产。10. 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所得累进税。11. 对敌占区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内实行自由贸易。12. 加强文化教育运动,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13. 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14. 面向敌占区,缩小敌占区。15. 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第二次行政会议一致通过了这十五项主张。

第二次行政会议结束后,我于4月10日写了《晋冀豫人民抗日斗争及其政治生活的新时期》,论述临参会召开的意义,阐述十五项主张的意义及对边区建设将发挥的作用。该文发表在4月17日出版的华北《新华日报》上。在文章中指出:“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成立,将是我全边区民主政治的开端,将是人民政治生活与团结抗战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目前建设主张,将是这新时期的具体战斗纲领,将是人民生活中的新规律,我们热望全边区人民紧张起来,迎接这个新时期与生活的新规律,并把它变为现实生活的实际。”

在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是民

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大家都接受，但具体实施起来，并不是每个干部都能自觉地去执行。在根据地内，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以党治国”的观念。根据地是在我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在根据地内是执政党，因此，不少干部思想上以党代政，党高于一切的“以党治国”观念很强烈。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根据地内的民主政治建设。为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在4月15日出版的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35期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具体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提出了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说明党对政权采取指导与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支部工作、加强民主教育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邓小平的文章特别批驳了“以党治国”的观念，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思想。”他列举了三种主要表现：

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

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至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主张，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

邓小平在批判了“以党治国”的观念后，明确提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怎样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呢？邓小平提出：“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7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太行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中建立了党团，受同级党委领导，理顺了党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关系。

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对根据地内民主政治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大大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保证了党的“三三制”原则的顺利实行。

1941年是太行区民主政治建设大力推进的一年。从

年初开始的村选及各群众组织(包括武委会)的村选开始,民主空气越来越浓,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及各群众团体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第二次行政会议后,一个推选临参会参议员的运动在根据地普遍展开,从军队到地方,从各党各派到各阶级各阶层,从各群众团体到各级抗日政府,积极热烈地选举代表,进行竞选活动,召开推选会,投票推选临参会参议员。

我是由辽县人民推选的临参会参议员。5月推选活动结束后,辽县农会、青救会、商会联合推荐我为辽县参议员候选人,得到县工会、妇救会、开明士绅等的响应。另一名被推选的候选人是民主人士阎濂甫。我和阎濂甫到辽县各地各自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发表竞选演说。我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大家推选我,首先是因为我是区委书记,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区党委的信任,提名我为参议员候选人。其次是我经常到辽县。辽县是由我分管指导的区党委的实验县,各界人士和干部对我比较熟悉,竞选时大家能列举很多具体事实支持我。6月22日,辽县推选临参会参议员的大会在桐峪镇第三高小内召开。参加推选会议的代表59人,各区参观团及临参会筹委会代表百余人。会议先由县教育科长宋耕如就选举方法和意义作了报告,我和阎濂甫在会上发表了竞选演说。筹委会代表浦化人监督竞选投票。经过推选代表无记名投票,我以51票的绝对多数当选。宣布选举结果后,整个会场一片欢腾,锣鼓、笙簧欢快地敲响奏起,无数锦旗、献

词及礼品推在我面前。礼品中最有意义的是象征光明的蜡烛及象征团结的胶。这样的场面我平生是第一次经历，使我深感根据地民众对党的无限信任和我肩上担负的重任，不能辜负民众对抗日新政权的热切希望。到6月底，各地推选参议员的工作结束。

临参会筹备期间，北方局根据华北根据地发展的形势，提议把鲁西根据地合并划归晋冀豫边区。6月27日，筹委会通过决议，将鲁西区归入冀太联办管辖，称作冀鲁豫区，这样，边区范围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会上决定把会议名称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临参会参议员扩大到197人。同时确定了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区划。

经过充分的筹备，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于1941年7月7日在辽县峒峪镇隆重召开。应到会参议员197名，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46人，包括邓小平、李大章、李雪峰、滕代远、申伯纯、何云、王悦生、王必帆、杨珏等，占不到1/3。由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一部分参议员未到会，实际到会的参议员为134人，其中太行区31名参议员全部到会。会议连续开了一个多月，到8月15日结束。会上，杨秀峰代表冀太联办作了工作报告、彭德怀应邀作了《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北方局提出的15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边区施政纲领以及《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

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劳动保护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军事支差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等各个主要法规，选举了临参会驻会委员和正副参议长。共产党员申伯纯当选为参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当选为副议长。会议选举产生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杨秀峰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戎子和）当选为副主席，浦化人当选为高等法院院长。延安《解放日报》为庆祝会议召开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边区“东自津浦，西临汾河，南起苏鲁，北迄冀晋，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根据地已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7月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举行首次委员会，讨论区划和任命各级政府官员。边区划分为22个专区，设3个行政公署。太行区不设行政公署，为边区直辖区，下辖6个专区，39个县，面积有25583平方公里。6个专区为：

一专区：辖内丘、临城、赞皇、获鹿、高邑、元氏、井陘、平东、昔东、和东等10个县。专员杨维。

二专区：辖平西、昔西、和西、寿阳、榆次、太谷等6个县。专员梁文瑞。

三专区：辖祁县、榆社、武乡、襄垣、辽县、武西、辽西等7个县。专员刘亚雄（女）。

四专区：辖黎城、平北、平南、潞城、长治、壶关等 6 个县。专员张茂甫。

五专区：辖林北、安阳、偏城、武安、涉县、磁县等 6 个县。专员赵进扬。

六专区：辖邢东、邢西、武北、沙河等 4 个县。专员范文彩。

9 月 1 日，边区政府正式办公，并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施政纲领》，共 15 项，内容包括：1. 保卫边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团结进步，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2. 加强与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建立人民子弟兵。3. 加紧民主政治建设，逐渐实现民选各级政府。4. 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5. 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切实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财产所有权。6. 对敌实行统治贸易，根据地实行自由贸易。7. 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巩固阶级团结。8. 加强农村阶级团结，给予农村一切贫苦人民与游民分子以生存教育的机会。9. 逐渐确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 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11. 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12. 建设卫生行政，减少人民疾病死亡。13. 面向敌占区，开展敌占区工作，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14. 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自由平等权利。15. 保护外国侨民，加强国际友谊。这一纲领，以北方局 15 项主张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参议员的意见，反复多次修改后

颁布。

临参会的召开,大大推进了太行区民主政治的建设。会后,参议员返回各县,宣传民主政治和“三三制”政策,把大会的民主精神传达贯彻到根据地各个地区。

继第一次大会后,临参会在1942年9月、1943年9月又开过两次会议。这两次会议由于根据地已进入困难时期,战争频繁,没有集中召开。1942年9月太行、太岳联合召开。1943年9月太行区单独召开。1943年后半年,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到1944年,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为进行普选和召开正式的参议会创造了条件。1944年6月,临参会驻会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进行普选和召开边区参议会。鉴于各区的形势、条件不同,不可能统一进行普选,决定采取分区选举和分职业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会议决定,在普选参议员的基础上,召开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太行区会议。确定太行区会议参议员共146名,由太行区各县及各部队、各行业、各团体经过普选产生。

经过1941年的村选运动,太行民众的民主意识已建立起来,到1944年,全区95%以上区村政权都是经过民选产生的。由于有了这一基础,在1944年开展普选县参议员和边区参议员,广大民众有了更加强烈的参选意识,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参选非常踊跃。到1945年2月,146名参议员全部选出。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53名,略多于1/3。



1945年3月2日,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在涉县温村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参议员117名,29名参议员因公请假或未及时赶到。这些参议员代表太行区450万民众。敌占区的60多名各界人民代表和士绅组成参观团列席会议。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太行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大生产,大练兵,发扬民主,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作了军事报告,宣布太行区已收复3万余平方华里的国土,1945年要继续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临参会议长申伯纯作了临参会工作报告。会上讨论通过了新的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参议会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如有1/5参议员或1/30公民提议,参议会应立即召开会议,听取人民的呼声,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会上选举申伯纯为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长,邢肇棠为副议长,我和吕守元为驻会委员。杨秀峰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3月19日会议结束。会后,成立了边区参议会党团,我任书记,负责领导和指导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的工作。

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后,太行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走上完善的阶段。此后不久,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根据形势的发展,边区政府从太行山迁移到太行山下邯郸武安附近。原有的边区政府直辖太行区的体制已不适应。为了加强太行区的行政领导,搞好根据地建设,更

有力地支援战争,边区政府决定,于1945年11月25日正式成立太行行政公署,属边区政府领导,任命刘岱峰为行政公署第一任主任。这时,太行行署管理6个专区、51个县(市)、310个区、6348个行政村,全区人口4851269人。1946年3月26日,太行行署向各地发出进行普选、成立县参议会的指示。此后,全区开展了普选,有21万余人在普选中当选,分别进入村、区、县各级政府中任职。1947年4月15日,太行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到1947年4月我离开太行区到中原工作时,太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已完成了从上到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崭新社会在太行区建立。

## 十四、大规模减租减息 群众运动的发动

通过减租减息，削弱封建剥削，减轻农民负担，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同时交租交息，团结地主抗日，是我党在抗战中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太行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从抗战开始宣传、实行，到1942年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其间有过曲折。

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减租减息。1938年初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召开时，都提出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后，每次较大的会议，都提出要实行减租减息，例如在1938年“六月决定”中规定“减租五或四分之一，减息至二分以下”，但是并没有认真实行。当时主要是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用此办法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军政需要的财物。合理负担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摊派办法，不能长久使用。对此，在1939年召开全区第一次党代会时，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在会上指出全区减租减息“实际上执行得不好”，要求各地党委和农会广泛深入地

教育,发动减租减息斗争。会后,在部分地区进行具体部署,并选择少数村庄做试点,但大多停留在宣传上。

1940年春,太行根据地开始出现困难,特别是晋中、冀西的春荒,使很多农民生活日益困难。为此,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发动党政军群团全力投入春耕运动中。区党委要求在春耕运动中开展减租减息。我们组织了7个小组,分头到根据地腹心区榆社、黎城、武乡、辽县、襄垣、潞城和长治,指导春耕和减租减息,以取得经验,推动全区。这是区党委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对农村经济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了解了根据地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各方面的生活情形,了解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同全国农村一样,在太行区,地主、富农仍占有耕地的绝大多数,他们人口只占7%左右,但却占有60%以上的土地。贫苦农民在农村的比例不少于45%,但只占有耕地10%。农民在经济上仍处在劣势,受着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农民虽然抗日积极性很高,但由于经济上困难重重,因此,在行动上严重阻碍了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土地是农民最大、最迫切的要求。抗战后农民破产的少了,一般土地流失停止,但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贫穷状态。合理负担只是解决了政府和军队的需要,虽然农民负担减轻了,但并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在太行山农村中,残存着极残酷、极野蛮的超经济剥削方式,例如当头制(厘下地)、甲地制、租粮地(钱粮地)等,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农村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压抑了广

大农民参战和保卫、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热情,使许多抗日的法令无法执行。各地在春耕运动中结合初步开展减租减息,已可看到农民在减租减息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后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感激之情,提高了生产情绪。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农村土地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的问题,牵涉到农村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利益,影响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更加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春耕运动结束后,区党委继续组织对农村土地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等进行调查,为普遍开展减租减息做准备。冀太联办成立后,在施政纲领中专门有实施减租减息的条款,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和“年利率不得超过一分”。1940年12月3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颁发减租减息条例,使晋冀豫区的减租有了法律依据及具体政策规定。12月5日,我在《战斗》第47期上发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一文,从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中的教训的角度谈减租减息,指出在太行区“减租减息的执行,从三年的口号、号召到现在,有许多地区还没有深入下去”,因此“越斗争群众越疲倦,越冷落下去”。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全区党的干部认识减租减息对发展、巩固根据地的作用,确实搞好这项工作。但是,由于百团大战后期群众遭受到巨大损失,情绪低落,在1940年秋冬和1941年春,减租减息仍没有发动起来。

进入1941年后,太行区的困难局面进一步恶化。

1940年10月到12月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报复“扫荡”使人民群众蒙受巨大损失。从1941年3月开始,敌人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是其重点进攻区。在这一年的3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和连续不断的小型“扫荡”,并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敌人的势力一直伸入太行腹心区昔阳、和顺等县。与此同时,太行区发生旱灾,农村大面积减产。困难局面的加剧,使区党委更加感到群众工作,尤其是农民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根据地主要在农村,支持抗战的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农村。在敌后开辟创建根据地首先依靠农民的支持,要巩固、发展根据地,克服困难,只有依靠农民。事实已经证明,谁能把广大农民组织发动起来,谁就能在农村站住脚跟,巩固住根据地,坚持到抗战胜利。从以上认识出发,1941年1月5日我在《战斗》第48期上发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纲领》一文,强调“农民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减租减息”,要求全区党、政府、农会加强对减租减息的领导。同月,区党委发出《关于农会工作的指示》,指出抗战4年来“减租减息不彻底”,已经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要求各级农会必须认识到“减租减息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个中心问题”,“减租减息做的好,就等于农会工作做好了一半”。2月15日,区党委作出《关于加强群众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区党委直接领导的群众工作委员会,我任该委员会的书记,直接领导群众工作。决定规

定,要研究减租减息,研究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研究雇工与雇主的关系,研究改善雇工生活问题以及青年、妇女、生产、武装等问题。此后,我们组织农救会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进行减租减息的实验。我记得派下去的有农救总会主任池必卿及陈大东、左奎元、王梦周、任瑞廷、王仪亭等同志。下去前我召集他们开会,要他们下去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剥削关系、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减租减息实行中的问题等。

这时,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和进行村选、选举临参会参议员的工作刚刚开始。调查的同志结合村选,接触了很多农民群众,了解到许多我们过去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问题。例如我们早就发现减租减息发动时比较困难,农民一方面想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又不愿积极参加。原因是什么?调查中发现,关键问题是永佃权没有解决。一些开展过减租减息的地方,地主采取收回佃农土地,转租给别人或交亲友耕种,或自耕,或典出,甚至卖掉土地。把佃农租佃的土地收回,使佃农无地可种,给农民造成很大压力和威胁。减息后债主不向外借钱,贫苦农民告贷无门,急用钱时无处可借。不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无法使减租减息继续下去。因此,在筹备临参会,起草《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时,专门就调查中发现的永佃权等问题作了规定。临参会一结束,在区党委领导下,由晋冀豫边区农民救国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根据临参会通过的《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草案),发动减租减息为中心

议题。会后，各地农会广泛宣传这一条例，重点宣讲减租减息是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进行减租减息是合理合法的。1941年秋冬，太行区的减租减息宣传发动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区党委对减租减息问题的认识还比较低，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区党委直接抓的大事要事，还停留在主要依靠农会去做的阶段。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4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是同时发到区党委的。这时，日本侵略军山西派遣军正在向太行区发动春季“扫荡”，我们正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这次敌人集中1.2万兵力向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麻田镇一带发动称作“铁壁合围”的“扫荡”，其目的是捕捉寻找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在为时一个月的“扫荡”中，敌人未能找到总部和师部，却付出了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我军在反“扫荡”中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太行3分区司令员郭国言、6分区司令员范子侠、1分区31团副团长曾纪云、3分区政治部主任郝维青等优秀干部光荣牺牲。反“扫荡”一结束，区党委立即开会，学习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并听取农救会和实验县关于减租减息及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结合太行区的实际，学习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作为区党委的书记，经过学习对照检查，确实感到自抗战以来，虽然一直讲减租减息，讲教育发动农民，但是并未深刻了解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教育发动



农民的深刻意义。我感到，我们在执行土地政策和发动农民斗争方面已经落后，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搞好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为此，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以晋冀豫区农民救国联合总会的名义，于3月29日发出《农民土地斗争纲领》，并在4月7日华北《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发表时我写了按语：“该纲领系参照中共中央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根据本区实际情况而制定，充分发挥了拥护地主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缴租缴息、调节各阶层关系、增加根据地社会富力的精神。”斗争纲领根据农救会调查中了解到普遍存在的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和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强调在减租减息中一律按抗战前租额减少1/4，在重订租约中，争取订5年以上的租佃年限；旧债凡交利超过原来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免交；公有荒地开垦后归开垦者所有；私荒一年内不自行开垦者农民可自行开垦；公私荒开垦后5年内不出负担不交租。斗争纲领的公布，目的在于向农民和地主公开宣布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向各级干部宣布中央的精神。

二是在4月中旬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过去的土地问题与农民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过去太行区农民运动的曲折发展及规律。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重点讲了过去农民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我指出过去的教训主要在对减租减息的意义认识不够和没有认识到在领导农民开展斗争时必须采取的策略。特别是

1940年黎城会议后,对中央提出的“反对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的策略,在执行中有片面性与平均主义。对于“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和实行这一战略“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未能认识和执行。在领导农民斗争时,在统一战线大局着重拉的时候,没有执行打的策略,没有认识到必须要有酝酿和打的阶段,才能发动起农民,组织起斗争。在具体指导上,表现为忽打忽拉,不是正确的一打一拉。在工作上,表现为忽紧忽松,不是一鼓作气。在指导地区斗争上,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机械地运用“先进区推动落后区”,把工作局限在先进地区与停留在基点上,没有把基点上的先进经验具体地运用到落后山庄,生硬地企图直接以先进推动落后,结果不平衡更加突出。在反倾向问题上,没有从发动农民的目的与要求上,从社会基础、社会关系的变动实际上(即削弱封建势力),从政策上去认识“左”与反“左”。而是从表面上和若干现象上来反“左”,结果一见农民运动和局部蛮干就停止了斗争,损害了农民与干部的斗争热情。在分析了前段工作后,我们讨论了如何根据太行区的实际执行中央土地政策的问题,于4月15日以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区党委在抗战中对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全文如下:

### **区党委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

(一)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发动农民,联合地主与联合富农。土地要求为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土地又是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因此,要使农民真正能够发动起来,又能联合地主阶级抗日,只有发动农民斗争,实现我党之土地政策,特别在今天敌、我、顽复杂严重斗争情况下,不充分发动农民就无从依靠群众支持艰苦斗争,也就不能使人们与地主阶级达到进一步的抗日团结。

但同时要保持地主阶级的若干权利,否则也不便利联合。今天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经过斗争又适当让步,才能达到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联合他们共同坚持抗日的目的。

(二)我区农民运动基本上还处在策略的一、二阶段,只有少数先进县份进入第三阶段,但就在这些县份也表现不平衡、不深入,因此,应按照不同县份,分析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策略方针,对不同村的与问题上的不平衡,也要耐心的分析,反对平均主义一般化,策略运用上忽视地区上复杂不平衡性,正是过去执行政策策略中痛苦的教训。

根据目前情况,一般可分为三种地区。一种是农民从未发动过或开辟时期一度发动而又消沉下去,社会基础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地区。第二种,农民经过发动土地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今天需要进一步普遍深入斗争的地区。第三种已到拉的阶段,而又表现不平衡的地区。第一种地区

开始着手要寻找最易击破的对象,最能发动群众的问题,发动斗争,启发农民斗争勇气,以便推动斗争普遍深入。第二种地区放手发动斗争要求贯彻土地政策。第三种地区也要充分发动农民争取平衡,但须更加注意斗争中复杂的争取工作,然而今天的环境总与过去不同的。今天地主阶级有了觉悟与团结,因此,一切斗争又必须是合法斗争,不能像开辟时期的蛮干,一切斗争均须约束在法令之内,不能立法违法,但又绝不是限制斗争,限制农民,而是表示要软,实际要硬。法令正是为了便于基本群众运用合法,便于一打一拉,正是为了帮助指导者掌握有节的原则。农民一经起来,可能有越法行为,司法机关要多予调解,尽量使农民不吃亏,不要给刚起来的农民泼冷水。

其次,今天负担较重,民力消耗较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又严重存在,与开始时期不同,而又碰到敌人的清剿扫荡,顽固派的乘机活动。因之,在执行土地政策时,又要注意与减轻负担节省民力联系,否则,易为敌顽所乘。

(三)今天基本上主要任务是反对右倾,反对官僚主义。四年来的教训,统一联合束缚了斗争,未打而先拉,未到拉的阶段而过早的以拉为主,方式上蛮干的“左”,掩盖了实质上的右,反“左”时表现取消了斗争,加之工作中的片面性,遂使农民运动受到不少的波折,今后政府要纠正“唯法主义”必须运用法令支持农民,不能束缚农民斗争,要了解民隐民情,简易行政司法手续,使下情容易上达,问题容易解决。农会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斗争,发展与壮

大农会,贯彻土地政策,同时组织春耕生产。过去提出从生产发动农民,从细小问题上发动农民,而忽视土地政策的执行是不对的。各救也要帮助发动农民。必须了解没有农民的解放其它团体也就建立不起来,建立起来也会软弱无力。要教育所有干部以群众的话解答群众问题,使农民认识剥削关系与剥削实质,尽量暴露地主阶级的凶恶,对农民的欺压狡诈,暴露其伪善面目,打破农民“良心下不去”旧观念,启发其阶级意识,明确阶级对立,坚决回答驳斥“等天晴”,“中央军来了八路军要走”等谣言,以鼓舞农民斗争勇气,防止地主抽地转典等威胁,巩固斗争情绪。

(四)目前执行土地政策是当前中心工作,要与三风检查结合进行,执行土地政策就是三风检查在群众中的实施,也只有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党的政策才会真正在群众中实现出来。因此,一切的工作要认真的进行调查研究,要检查过去土地政策实施情形与指导发动农民斗争,贯彻土地政策;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是不行的。同时与春耕工作并不矛盾,而恰是推动春耕工作的主要关键。事实上只要土地问题有了适当解决,群众情绪进一步提高,其它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区党委扩大会后,各地、县委根据会议安排和区党委“四·一五”指示,除边沿地区以开展对敌斗争为主外,在

根据地腹心区,积极准备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运动刚刚开始部署,就遇到敌军自抗战以来对太行区发动的最大一次“扫荡”,即1942年5月“扫荡”。

敌军1942年2月对太行根据地“扫荡”后,利用边沿区群众动荡不安的心情,在太行山东,沿平汉路西侧修筑北起元氏仙翁寨,南至武安任家岭的第三道对根据地的封锁线。在太行山西,沿着白晋路两侧,以特务活动与小股武装相配合,进行“清剿”,胁迫边沿地区群众“维持”,并开始修筑武乡经榆社至辽县的公路。太行根据地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敌军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于5月集中2.5万人的兵力,发动代号为“乙号作战”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其目的是捕捉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等首脑机关,摧毁以太行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战争情报后,太行即进行总动员。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在民兵、群众配合下,一边打击敌人,一边从敌人的包围圈内向外转移。区党委机关和边区政府机关随129师师部转移,我和杨秀峰、蔡树藩等一路,在师部警卫部队掩护下跳出敌合围圈,到达黎城县北面的北社、港东地区,同刘伯承师长会合。在这里,我们听到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附近的十字岭遭敌包围,左权副参谋长、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同志牺牲的消息,非常悲痛。左权牺牲后,辽县人民为永远纪念左权,于1942年9月将辽县改为左权

县。

反“扫荡”结束后，已是6月底7月初。区党委抓紧时间，开会部署，培训参加领导群众运动的干部。这时刘少奇从华中经太行回延安。他到太行时，已是9月中旬。他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后，认为太行未能在抗战前期抓住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是一大失策。他介绍了华中的经验，强调减租减息是根据地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在农村中造成农民的政治经济优势。他还在党校讲了发动群众的问题。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开展起来。这时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有两个好的条件：一是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政策明确，斗争策略明确；二是经过调查研究，对太行区农村的实际明确，对农民的要求比较清楚。因此，运动一开始就确定减租减息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减租保佃和清债退押。具体做法是：佃农和地主重订租佃契约，清退前一段超交的租额，保障农民的水佃权，解决明减暗不减的问题，使地主真正把地租减下来，使农民按边区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交租，这就是减租保佃；开展清理旧债，在清算超额剥削中把农民被抵押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物品以及借债文约收回来，这就是清债退押。这些要求都在边区政府的法规之内，农民只要依法交租，地主就无权收回出租的土地，使无地或少地的靠借债度日的贫苦农民有了地种，使遭受超额剥削的农民收回了自己原有的耕地及其他财物。清算了旧的债务后，一切借贷契约全

部当众烧毁，从而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减租保佃、清债退押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区党委和各级党委为此不断从实际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各地工作。一般做法是先训练干部、骨干以掌握政策和正确的策略，然后入村访贫问苦，个别发动。在此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讲和诉苦，启发农民自觉起来清租算债，要求地主主动减租减息。对于顽固分子，独霸一方的大地主、大恶霸和破坏运动的人，召开诉苦、揭发斗争大会，以农民的声势，加上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迫使他们减租减息、清债退押。斗争中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支占政治优势的阶级队伍，在农村中造成农民政治上的优势，使农民团结起来投到斗争中去。这支队伍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农会为骨干和领头出面，包括青年、妇女、民兵在内，要取得村政权的支持。斗争达到高潮时，区、县抗日民主政府要站起来表明态度，支持农民的斗争。

在领导减租减息运动中，区党委特别强调提出“重新”发动群众和加强薄弱区工作的方针。这是因为在中央决定下达前，我们对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动很不够，对其意义认识更差。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是一个全新的阶段。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确实认识到了减租减息对于发动群众和削弱封建势力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发动群众对于整个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认识掌握群众运动发展规律和斗争策略在指导群众斗争中的重要性。“重新”发动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根据各地实际，确定重新发动的



任务。在先进地区,主要任务是继续发动群众,面向落后群众,面向落后村,如武乡县;在薄弱区,主要任务是依靠较有工作基础的村庄,选择顽固不执行土地法令的大户及恶霸,把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进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以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用“先打后拉,打中有拉”的策略;推动群众运动发展,如武安县;在没有搞过减租减息的地区,主要任务是重新发动,先从检查党支部、党员、干部本身存在的问题入手,找出问题的症结,确定重新放手发动群众的策略及方法,如邢台县。区党委在领导这场大规模运动中,重点抓了武乡、武安和邢台三个不同类型的县。从总体上看,这次群众运动反映出来的特点同过去比,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一是声势大。这次减租减息运动,从上到下层层发动,召开大会多,从气势上形成农民斗争的政治优势,震撼着根据地农村社会。减租减息之后的农村,农民在政治上已占了优势。

二是斗争激烈。运动开始后,农民敢于揭发诉苦算账,地主敢于依据法令讲理,不像反顽斗争中那样有恐惧感。在群众斗争中地主逃亡的也比过去少。每一个大会几乎都有激烈的争辩,反映了农民、地主都在运用中央的土地政策,为自己的利益寻找法律政策依据。通过减租减息,把民主斗争的积极性和民族斗争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巩固了农村的统一战线。

三是成果显著。经过斗争,太行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

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成果。据武乡县统计,经过 8、9、10 三个月的群众运动,全县 50 多个村(占根据地行政村半数以上)解决租息问题 12000 多件(不算普遍订约),典地订年限 7000 多顷,租地订约(由永佃权改订契约)160 多顷,清债 22.6 万多元(冀钞)、铜钱 82000 多吊、粮 540 石,退文书 13400 多张、欠利条子 2800 多张。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后,参军、参战、支前积极性更加高涨。

四是引起社会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变化。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太行农村的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地主、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封建部分都有较大削弱,其占有耕地在减少,有的下降为中农;贫农雇农土地有了显著增加,不少上升为中农,中农户数明显增加。这一变化是区党委从各种类型的 12 个县中选取 15 个典型村的 2419 户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调查结果可以从下表看出:

1942 年减租减息运动前后各阶层户口土地变化情况

	1942 年	户 口		土 地		每户平均 土地(亩)
		户	%	亩	%	
地 主	前	60	2.75	5918.56	23.04	98.64
	后	49	2.02	2094.67	8.79	42.28
经营地主	前	11	0.50	410.57	1.59	37.32
	后	10	0.41	218.24	0.91	21.82
富 农	前	158	7.25	4797.84	18.68	30.37
	后	167	6.90	3463.73	14.53	20.74

	1942年	户 口		土 地		每户平均 土地(亩)
		户	%	亩	%	
中 农	前	823	37.80	9510.69	37.02	11.56
	后	1132	46.79	13072.80	54.87	11.54
贫 农	前	1065	48.98	4815.61	18.98	4.57
	后	1019	42.12	4779.22	20.05	4.67
雇 农	前	41	1.88	64.35	0.25	1.57
	后	23	0.95	94.90	0.39	4.12
其 它	前	19	0.87	95.20	0.41	5.10
	后	19	0.78	100.90	0.42	5.30

五是运动开展不普遍。1942年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虽然规模较大,但是开展得不够普遍。从全区情况看,6个专区中,一专区因反“蚕食”斗争紧张,群众运动开始较慢;二专区敌情严重,根据地缩小,群众运动规模较小;三专区是腹心区,动员快,规模大,斗争激烈;四专区开展得比较慎重,进展也较慢;五、六专区大部分是工作薄弱区,在发动群众时比较注意策略,由于干部缺乏,进展比较慢。据区党委在15个县统计,根据地1925个村庄中,开展过反贪污、反恶霸、反摊派及减租减息的村庄只占60%左右。三专区的榆社县是根据地腹心区,80个行政村中减租减息开展得好的只有13个,不够好的有43个,根本未开展的有14个。

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开展的

解决抗日根据地内农村土地问题的运动,其前提是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抗日,巩固发展建设抗日根据地。中央在土地政策决定中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是指导减租减息的总政策。中央强调,在抗战中,党的土地政策首先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中央指出,党的土地政策在抗战中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士绅。因此,中央强调,在实行减租减息后,必须实行交租交息以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此,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只能是有限的阶级斗争。中央还指出,在抗战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因此党的土地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执行以上土地政策,不可能从一开始就非常准确地把握住分寸,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1942年刚开始发动群众时,出现反复,也在情理之中。当9月召开临参会第二次会议时,会上出现的围绕减租减息展开的农会代表和士绅代表之间的激烈争论,正是反映了双方各自代表农民和地主利益的尖锐交锋。这种争论,是根据地民主政治实施的反映,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不少“左”的举动,如在地主顽抗

时发生打人现象。对此，区党委曾三令五申制止，到后期就很少发生了。

## 十五、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决定了发展人民武装和开展对敌斗争,是根据地内共产党组织始终列为重要地位的工作。根据地的军事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体制。地方军和人民武装都是由地方党委领导创建、发展和开展对敌斗争的。

早在1937年10月中共冀豫晋省委初建时,就提出了建立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问题。省委决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组织广大民众,首先是农民和工人参加抗战,组织群众游击队、自卫队,向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优秀青年参军,扩大主力部队。1938年3月省委召开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时提出:“现在的战争已由正规军队的全面抗战发展为群众的武装抗战了。”因此“领导与组织武装,是我党在目前阶段中唯一重要的任务”。这一阶段中,由于129师将2/3以上的兵力分遣到各地,同地方党委一起全力进行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因此很快就在晋冀豫区广大区域内建立起众多的游击队,如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先遣支队、游击支队、道清游击支队、晋豫游击支队、冀西游击支队、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榆次纱

厂工人游击队、邢台浆水游击队、挺进支队、太行游击支队、平汉游击队、磁县人民游击队、太行梯队等等。这些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抗日信心,使太行区在1938年4月的第一次反九路围攻作战中处于主动地位。粉碎围攻后八路军政治部在5月写的《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的经过》总结报告中盛赞太行人民积极主动配合主力军作战的作用,指出:“每一次战斗中,担架队和运输队都很踊跃地工作,给军队非常大的帮助。每村的自卫队也很警戒机动,常常自动地捉住汉奸、敌探,或者发现汉奸之后报告军队。”经过反围攻作战,军民之间建立起生死与共、相依为命的血肉联系,使太行根据地在敌后日益壮大。我在1938年6月22日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写的工作报告中统计,这时太行区内已建立起地方武装,仅活动在各地的地方武装主力支队,就有8000多人,拥有2500支枪,组成5个团(支队)、2个营(大队)。全区组织的不脱产自卫队,达30多万人。

太行区的人民武装建设,到1940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增兵华北,于1939年开始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敌人大肆增修铁路、公路,在沿线构筑碉堡,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封锁墙,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和网状分割。晋冀豫区被分割成太北、太南、太岳、晋豫4块。敌人的目的是通过封锁沟墙,围歼八路军主力,摧毁根据地。刘伯承师长把日军这做法称作“囚笼”

政策”，敌人妄图将根据地包围分割像狱中的囚笼一样，而后摧毁。面对敌人的“囚笼政策”，刘伯承提出通过运动战、游击战，“配合群众斗争，粉碎敌人，首先是粉碎敌人囚笼战斗”。为开展反“囚笼政策”斗争，刘伯承提出建立民兵制度的意见。他认为，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半武装”，由17岁到37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民兵的任务包括：“①游击，破路拆堡，空舍清野，戒严。②掩护和配合基干军队作战。③锄奸，肃清敌探。④民运工作，支持政权。⑤兵员补充。⑥侦察情报。⑦敌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兵”这个名词。此后，区党委积极协助晋冀豫军区着手在太行区组建民兵组织。

1940年黎城会议正在召开时，得悉日军向白晋路增兵，妄图加快修筑白晋铁路的速度。敌人计划中的白晋铁路北从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现属祁县东观镇管辖）起，在白圭镇和南同蒲路相接，途中经东观、沁县、襄垣、长治到晋城，正好从晋东南穿过。白晋路原是一条公路，1939年7月日军向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后在公路沿线驻扎大军，将晋东南分为太行（东）、太岳（西），给根据地造成严重威胁，增加了对敌斗争的困难。要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就必须破坏其修筑白晋铁路的计划。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在白晋路发动一起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

经过1938年、1939年两次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战斗和1940年春的反顽斗争，我们已初步取得了动员组织民



众参战支前的经验。特别是军区、军分区建立后，同地方党委、政府联系比较密切，每次对敌战斗，都有地方武装组织带领自卫队、群众参加，因此，群众参战支前的信心很足，积极性很高。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白晋战役的计划时特别强调“民众是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的主要力量。野战军民运人员，军分区地方武装科要协同地方机关，适时动员，组织民众参加破路、拆堡、搬运资材”。根据这一指示，我们组织了2万余民众，在南北100余公里的白晋路沿线，随同八路军主力展开声势浩大的破击作战。白晋战役从5月5日夜开始发动进攻，经6日一天和6日晚的战斗，将敌人经营了一年多的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了50余公里，毁大小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1列，歼敌350余人，解救了1000余名修路工人，夺取和烧毁了敌人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

经过白晋战役的锻炼，太行区的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战斗能力和协同参战支前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为建立民兵制度打下了基础。在黎城会议提出的建党、建政、建军三大建设中，建立民兵，是党、政、军共同开展的一项工作。1940年8月1日，军区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的口号。在整编军区、军分区，建立民兵过程中，明确军分区政委由地委书记兼任，加强了地方党委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这时太行区的5个地委书记：高扬、赖若愚、王一伦、王孝慈、王维纲分任1至5军分区政委。

军区扩大干部会后，刘伯承、邓小平向我通报了一个极秘密的军事行动：八路军总部准备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规模比白晋战役还大，要我和军区立即动员组织民众和民兵，像支援白晋战役一样，支前参战。他们特别要我亲自布置正太路南侧的动员工作，要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这就是百团大战（当时叫正太路破击战，战斗打响后八路军总部发布消息，才改叫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动员。谈话后，我立即进行秘密布置。由于已有白晋路破击战的经验，动员组织工作较为顺利。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开始的主战场晋中地区，地委在8月8日就发出秘密通知，地委和专署（当时叫冀太联办太行第一办事处）派出32名干部，与各县的同志混合组成4个工作队，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秘密活动。到8月20日百团大战正式发动前，在晋中区（当时包括平西、昔西、和西、寿阳、榆次、太谷6个县）的敌占区摧毁58个伪村政权，争取了18个伪村政权，发展了敌伪内线16个，建立起10个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有12594人的秘密抗日组织。同时，在根据地内秘密组织起由县委书记或县长带队的支前指挥部，动员了2万余民兵、7万余群众，准备了4500头牲口，并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羊、柴草、军鞋、电线杆等。支前、参战的民兵、群众，分别参加到破击队、运输队、担架队中，我们挑选了一批有胆有识的民兵派到各部队当向导，送情报。

百团大战在8月20日打响后，太行民众全力以赴参

加到支前中。8月26日，区党委向正太路沿线党组织发出配合百团大战的指示，强调指出：“我们目前应抓紧时机，开展沿线工作，特别是动员沿线的地方武装组织以及广大群众，扩大这一战果，参加与配合我正规军的作战，展开群众的破路运动。这成为沿线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同时也应是地委指导任务上的中心。”指示还告诫各地党委：“应该估计，这一次胜利固然给敌人以严重打击，但同时也开始了对敌斗争的新阶段与新时期，更残酷的斗争将要在华北展开。”区党委对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被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后开展的反“扫荡”事实所证实。可惜百团大战第一、二两阶段的胜利，使大多数同志只看到胜利和显赫战果的一面，未能对紧接而至的十分严酷的困难局面做充分的准备，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破击正太路的战斗以八路军获得全胜告终。从8月20日夜到9月10日，太行军民作战181次，毙伤日伪军2258名，破坏铁路117公里、公路226公里，解放被迫修路、护路群众1.33万余名。

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后，群众情绪极为高涨，纷纷自动到部队慰劳，举行庆祝大会，更多的民众组织起来参加到支前参战队伍中。在第一个阶段将近结束时，区党委于9月6日向各地委发出《关于开展沿线工作的补充意见》，指出：“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巩固与扩大百团大战胜利的直接成果，展开主动的广泛的各个铁路、公路的交通战争，开展对敌政治、经济各个战线的斗争。”11日，区党委

发出《关于配合百团大战开展敌占区工作的指示》，强调乘百团大战取得胜利的时机，“抓紧良机，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努力向平汉路、白晋路 and 同蒲路开展敌占区工作”。

百团大战在9月20日后进入第二阶段。太行军民的任务主要是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敌军据点，见机收复榆社、辽县两个县城，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歼灭从平定、辽县或白晋路方面增援的敌人。这一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战斗主要在根据地内进行。在战斗打响前，我们动员了5万余群众、民兵，随军参战支前。由于这时正处在大胜之后，动员是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的。敌人在遭受打击后已有了准备，因此榆辽战斗打得比较艰苦。我军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攻坚，打得很激烈。敌人除地面部队不断增援外，还出动飞机轰炸，在进攻榆社城时，敌人施放了毒气。经过军民共同作战，到10月5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部分撤出战斗，休整补充，地方工作准备从大规模支援战争转向生产，结束了第二阶段的战斗。在第二阶段中，太行部队在民兵、群众配合下，作战152次，毙伤敌军2564名，破毁铁路76公里、公路169公里、碉堡20余座，解放群众2000余名。

我军刚刚开始休整，敌人就开始对太行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这样，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敌人的“扫荡”早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布置动员民众进行反报复“扫荡”的工作也作了一些，但由

于对形势估计不足,胜利之后的轻敌麻痹思想在干部、群众中都很严重,特别是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大批编入野战军,后方党的组织与仅有的地方武装整个进到前方,根据地后方空虚。敌人看到我们的弱点,在报复“扫荡”于10月6日突然发动时,首先以3000余兵力扑向根据地腹心区,向浊漳河两岸用“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战术展开拉网式报复“扫荡”,实行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腹心区群众遭受到空前的烧杀抢掠,损失惨重。八路军主力部队及时展开反“扫荡”作战,在和(顺)辽(县)公路上的弓家沟设伏歼敌近百人,毁敌汽车44辆,迫使敌人于10月17日停止“扫荡”。10月20日,敌人经过短暂组织后,又开始向太行腹心区进行第二次报复“扫荡”,以万余兵力重点“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及冀太联办和区党委所在的辽县、武乡、涉县、偏城交界地区。敌人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发动对同一地区的“扫荡”,在太行区尚属首次。我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应战准备不充分,使敌人在23日、24日进入预定合击地区后,到处实行疯狂的“清剿”,抢掠物资,烧房杀人。进入腹心区后,敌人又进行分区“扫荡”,群众损失更惨。面对敌人的疯狂野蛮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决定集中主力歼敌。10月30日,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关家垸战斗,歼敌400余。其他主力部队也寻机打击敌人,迫使“扫荡”太行之敌于11月13日、14日撤回据点,历时40天的太行反“扫荡”作战结

束。

反“扫荡”结束后，我立即组织干部到各地去慰问群众，组织修复战争创伤。我们所到之处，目睹群众遭受的严重损失，非常难过。例如平（定）西范家窑的敌人把群众赶到石沟内，用机枪扫射、刺刀乱刺，一次杀害 89 人、伤 9 人；寿阳韩赠村的敌人将群众赶到破窑内，放火烧死 260 余人；昔阳县西峪村的敌人将全村男女老幼 365 人赶到一个大坑内枪杀活埋；涉县井店村的敌人杀死无辜百姓 200 余人；在和顺县石拐村，敌人将全部房屋、窑洞毁坏，有三孔石窑无法烧毁，竟用炮轰塌……一个又一个被烧的村庄，一家又一家被杀害的尸体，一个又一个受伤的民众，到处一片劫后惨景。仅据赖若愚在晋中区 6 个县不完全的统计，被杀害的群众有 1680 人，受重伤群众 206 人，有 595 户的 19241 间房屋被烧。

在百团大战中，太行民兵、群众积极参战、支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太行军区统计，在从 8 月到 12 月的 5 个月大战中，太行民兵作战 535 次，参战人数 59658 人，共毙敌 45 人，伤敌 8 人，俘敌 3 人，捉汉奸 89 人，破路 245 公里，破桥 12 座，毁敌火车头 8 个、车厢 142 个，解救民工 5210 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战斗中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如辽县杀敌英雄刘二堂在敌人进攻时两枪打死两名敌人，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表彰，在太行掀起了学习刘二堂运动；平西寺沟刘四的妻子蒋氏，在抢救八路军伤员中一连将 7 个伤员背到安全地带；昔西华泉的刘三孩在

敌人于夜间进村后，到房上搬石头打敌人，敌人以为遇到游击队不敢入村，使全村群众得以转移；榆次组织有 100 余人的自卫队，在 frontline 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打得非常顽强；和顺县长翟文田带自卫队到前线支前参战，在反“扫荡”中掩护政府人员和各教会干部；和顺县区分委委员宋虎江在榆树坪带领自卫队员抢救出 500 多名八路军伤员；寿阳县景上村自卫队长王蝉余在上湖配合作战抢救八路军伤员，在枪林弹雨中把伤员背出，自己光荣牺牲。战争考验了我们的干部、党员和群众，锻炼和成长起一批与群众紧密联系的、积极带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干部。

进入 1941 年后，根据地的困难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艰苦。首先是敌人针对“百团大战”中遭受的打击，全力对付我根据地，提出和实施针对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大大增加了太行根据地的困难。其次是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进一步实施封锁、包围和进攻，根据地被迫进行“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两面作战。第三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天灾、疾病搅在一起，更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

对太行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区党委在百团大战后期已有所认识，并告诫各级党委和抗日政府要对即将出现的更为严重的局面有足够的准备。对严重困难形成的原因，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区党委在 1940 年底和 1941 年初进行过研究，提出了克服严重困难的措施。1941 年 1 月太行军区召开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我

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目前“是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面”,要全区“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反对麻木不仁”,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对敌斗争。但是,由于严重困难的突然加剧,在一些同志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一度产生了消极麻木倾向,使太行的工作未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处在被动的状态。针对太行的严重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于4月28日写出《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我看到该文后立即决定在将于5月15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7期上发表,并写了编者按:“邓小平同志这篇文章严肃地指出本区目前的严重形势,并明确地指出克服这种严重局面的条件与方法。希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负责领导同志,能于接到本刊时,立即联系当地具体情况组织讨论,动员全党为打开目前的这个严重局面而斗争。”

邓小平的文章是专门针对太行区写的。在文章中他首先肯定了百团大战证明太行根据地“无论在军事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是使敌伪胆寒,是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后,尖锐指出,太行区目前“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如果继续下去,必将影响到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而遭致不应有的恶果”。他认为,敌人的进攻,反共顽固派的破坏固然是形成严重局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弱点”。“谁要忽视了这个事



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怎样才能打开严重困难的局面呢?邓小平提出:首先,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第二,要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第三,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第四,要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的心理。

邓小平的文章对全太行区震动很大。文章发表后,我们组织全区干部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检查各自的工作,深刻认识存在的问题,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打开严重局面。区党委在学习邓小平的文章后,决定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为此,首先针对地方武装被削弱的状况,于5月7日以区党委名义作出《关于目前武装工作的决定》,提出“组成游击集团,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开工作局面,坚持对敌斗争”的工作方针。游击集团是以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相结合的开展游击战争的组织形式。129师为加强游击集团,将一些野战旅的领导机关同军分区合并(番号仍保留),将旅属的各团分遣到各军分区作为分区的基干团。游击集团的组建和主力兵团的地方化,大大促进了地方武装发展。太行区接着开展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选举运动,从下到上建立起村、区、县、军区武委会领导机构。

游击集团建立后,立即于6月份发起对太行之敌的攻势作战。在历时1个月的游击集团攻势作战中,显示了群众性游击战的威力。攻势作战主要在敌占区、接敌区展

开,1个月中作战出击507次,参战民兵达33985人次,毙伤俘敌伪军707名,捕捉敌探、奸细、土匪、宪兵、情报站长、维持会长等572人,解救民夫57800余人。晋中民兵创造了“联防制度”,一处有事,多方支援。各地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袭击战、伏击战、掩护战、营兵作战等多种群众游击战形式。8月至9月,1、5军分区游击集团配合主力参加了邢(台)沙(河)永(年)战役,打击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10月底,日军对太行区发动冬季“扫荡”,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及军事工业基地。各地游击集团再次发挥作用,使进入太行根据地之敌处在四处挨打的局面之中。反“扫荡”胜利后,刘伯承师长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民兵发挥了极大威力,群众游击战使敌疲于奔命。”八路军总部发言人指出:“民兵、游击队埋的地雷,使敌人一进根据地即如陷入爆炸阵中,无法立足,每于不知觉中被炸死不少。”

1942年,是太行根据地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最为激烈尖锐的一年。太行根据地在1941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42年又遭到敌人更疯狂的进攻,再加上这一年的严重旱灾,使这一年成为太行区抗日战争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

日军对太行区的春季“扫荡”是乘太行军民准备过春节时发动的。2月3日(农历1941年腊月十八),集中了1.2万余日军的自称为“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扫荡”开始,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北方局、边区政府和129

师师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辽县、武乡、黎城地区。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捕捉壮丁，抢拉牲畜，搜刮粮食物资，凡能运走的东西，尽其所能统统抢夺。在反“扫荡”中，我主力部队一面掩护首脑机关，一面同各游击集团配合，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在1个月的反“扫荡”中，太行民兵毙伤354名日伪军，俘日军3人、伪军48人，夺回牲畜185头。经过这次“扫荡”，敌人进一步向太行根据地腹心区推进，在北起元氏西北的仙翁寨，南至武安的任安岭一线修筑了第三道封锁线，向前推进了10至15公里。在腹心区，敌人开始修筑武乡经榆社到辽县的公路，把第三专区分割为两块。第二专区边沿的敌人大筑碉堡，发展维持会和伪军，使全区纵横只有25公里，造成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

面对日益严重的对敌斗争局面，129师和太行军区决定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打入敌占区，一边进行政治宣传，一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寻机打击敌人。区党委于4月27日发出《对敌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与发展敌占区的工作，“与敌人去争取每分时间与每寸空间”，“在敌占区生根”。各地党和抗日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敌人于1942年5月中旬发动号称“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大规模“扫荡”，目标主要是合击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敌人在“扫荡”前派出特务混入根据地内，摸清了总部和师部所在地，集中2.5万兵力，以突然袭击的

战法，直奔目的地，在辽县麻田地区包围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华北《新华日报》社等机关。25日，万余敌人在南艾铺、十字岭一带发动突击，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率大部人员突围，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掩护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在反“扫荡”中牺牲的还有北方局的张衡宇、《新华日报》的何云等同志。左权副参谋长的牺牲，是抗战中八路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反“扫荡”中，129师在刘伯承率领下，机智地与敌周旋，从敌人的包围圈空隙处跳出圈外，损失较少。邓小平政委这时正在太岳区视察，不在太行区。

夏季反“扫荡”结束后，区党委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深了对发展、建设以民兵为主的人民武装的重要性的认识。8月4日，区党委发出《五月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与当前备战工作指示》，强调要加强对民兵的领导和训练，提高民兵素质。我写了《怎样掌握民兵组织群众游击战争》一文，详细论述了民兵的组成及其特点、战时民兵政治工作、民兵战术问题、造成普遍杀敌风气等4个问题。我在该文中提出：“战时掌握民兵，是反扫荡群众游击战争的一个基本环节。怎样掌握与使用民兵，就成为战时如何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和群众如何配合军队作战中一个中心环节了。所谓‘武装民众’，主要的就是民兵问题。”

1942年7月7日，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颁发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命令。区党委和军区根据这一命令，决定从7月下旬起，连续开展两个月的对敌政治攻

势,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日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的宣传工作,反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加强瓦解日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展开反汉奸、反维持运动。在布置对敌政治工作时,区党委和军区强调以各级党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为核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攻势以县为重点,组织党政军民各部门协同参加,把政治攻势与其他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为此,各地要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武装宣传队,深入到敌占区去。政治攻势的内容主要是展开群众性的普遍宣传运动,揭穿敌人的各种阴谋,动摇和瓦解敌伪军,提高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敌占区群众人心向我,同时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打开敌占区的斗争局面。

太行区的政治攻势从夏季一直延续到秋初。在两个多月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中,我们到敌占区、游击区的587个村进行了宣传,召开了591次群众大会,剧团演出36场,散发宣传品215623份,各种标语31024条,给16名日军、177名伪军指名写信。同时,摧毁336个村维持会,逮捕435名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了百余个抗日民主村政权及部分抗日民主县、区政权。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进行了513次战斗,毙伤日伪军574名。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敌伪大为恐慌。在据点内的日军不敢轻易外出,很多伪军、伪组织人员送情报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有的掩护抗日人员,要求抗日政府记上名字。伪军、伪人员家属主动配合政治攻势,要求亲属尽快回到抗日

人民中,不要做坏事。

太行区的冬季政治攻势是同根据地内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配合进行的。减租减息中,太行民兵和地方武装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发展新党员,使战斗力明显提高。1942年的对敌斗争是在艰苦环境下开展的。我在斗争中注意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探索对敌斗争规律。为此,我在9月16日发表《政治攻势与反蚕食斗争——反对四次治安强化与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一文,详细分析了太行区的敌情,剖析了元氏、临城两县反“蚕食”和跃进斗争的特点、经验和教训,从昔阳和元氏反“蚕食”与反维持斗争的经验教训中阐述对敌斗争的策略,对开展政治攻势和开展敌占区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0月,我起草了区党委《关于边地对敌斗争报告》,汇报和总结了太行区1942年前9个月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反“蚕食”斗争中的党的建设、组织隐藏与组织形式、执行革命两面政策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从艰苦的对敌斗争实践中,根据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的政策策略思想总结出来的。

1943年1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干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邓小平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都以较大篇幅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方针、任务、政策、策略。这一年虽然太行区的困难还在加重(主要是自然灾害加重),但是,

对敌斗争形势已经开始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根据温村会议确定的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从春季开始,区党委和军区就决定派出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展开更加广泛的游击战,建立小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加强对日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到敌据点、伪军中发展内线,在工作开展好的伪军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太行区在太原、阳泉、太谷、寿阳、石家庄、安阳、新乡、长治等敌占区建立起共产党地下支部,在若干伪军内部发展了地下党员。采取这些措施后,使太行区的对敌斗争逐步地由被动转向主动,使根据地开始走出困境,并迎来了根据地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1943年,敌伪仍把太行根据地作为“扫荡”的重点。对此,我们一直有充分的准备。为加强游击集团的战斗力,春季,129师在太行的385旅、新1旅所属各团划给3、4、5、6军分区,成为分区的基干团。各军分区的基干团(营)大部分到各县、区,与基干队、民兵组成游击集团,团、营、连各级干部参加县、区、村指挥部,统一指挥群众性的反“扫荡”。各地普遍建立起群众性的情报通讯网,在各交通要道、重要村镇设立秘密中心情报站。在群众中进行了空室清野与转移演习。在边沿区普遍实行抗日戒严,展开群众性的除奸防谍斗争。

1943年4月,日伪军2.5万人开始对太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发动进攻。为了援助友军,区党委和129师政治部于4月25日联合发出《关于南援工作

的指示》，决定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组织豫北指挥部，南下太南工作。但是，庞炳勋、孙殿英在敌人进攻面前投敌叛变，使日伪军力量加强。5月初，日伪军转向太行区北部，向根据地腹心区的三、四、五专区发动毁灭性的大“扫荡”，以梳篦队形，步步压缩合击，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及八路军主力合围在辽县、黎城、涉县间清漳河两岸狭窄地区一举歼灭。

我们事先已针对敌人的大“扫荡”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扫荡”开始，很快搞清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规律，使反“扫荡”处在主动的地位。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很快转向外线，游击集团在内线坚持斗争。敌人未能捕捉到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根据地内疯狂烧杀抢掠。游击集团在反“扫荡”中充分发挥其优势，展开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扫荡”斗争。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设在各地的情报网站及时通报给各级指挥部，游击集团很快组织进攻，使敌人处处挨打，防不胜防。尤其是到处开展的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在反“扫荡”中，太行民兵有14679人参战，作战2255次，毙伤敌伪1902名，俘敌伪26人，捉汉奸敌探445名，解救民夫771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在战斗中民兵伤亡141名，敌我伤亡比例为13.5：1。反“扫荡”结束后，李达司令员在他写的《加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之商讨》中指出：“太行区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此次五月反‘扫荡’、反抉剔清剿斗争中，发挥了过去任何一次所没有



的伟大力量。各地人民武装协同各该地基干军队与游击队,有机地与敌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击了敌寇企图摧毁我根据地物资材料与抢掠粮食的阴谋,严厉镇压了敌寇所派遣的大批奸细爪牙,使合围清剿之敌到处感到‘四面楚歌’、随地皆兵之苦,遭到我们不断的打击、饿困、伏击、围袭与追击。”

敌人此次夏季“扫荡”是抗战以来失败最惨的一次。为了挽回损失,敌人于6月中旬派出日伪军1500余人窜到武乡县蟠龙镇地区,企图在此设置据点,修筑公路,分割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阴谋,太行军区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配合下,于7月19日发起蟠(龙)武(乡)战役,一举歼敌500余。此后,武乡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围困蟠龙战役,将蟠龙周围的49个村庄、4.3万多群众转移出来,采取军事上围困打击、生产上劳武结合、打击汉奸特务、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办法,与敌展开长期斗争。围困蟠龙长达8个月之久,于1944年2月17日收复了蟠龙镇。

蟠龙战役前后,在太行南部的日伪军2万余人向林县发动进攻,企图以林县为依托向北推进,扩大占领区。为阻止敌人北进,把根据地向南发展,区党委于7月24日发出《关于开辟豫北工作的指示》,决定加强对豫北工作的领导,迅速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发展人民武装,深入进行对敌斗争,把豫北创造成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区党委和军区抽调干部到太南、豫北地区开展

工作。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中三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发动林南战役，收复太南、豫北地区。太行区动员组织了3000多民兵参战，1.5万余民众支前。林南战役从8月18日开始，历时9天，于27日结束。在八路军主力的强大进攻和民兵及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歼敌7000余，攻克敌据点80余处，解放40多万人口。战役结束后，在太南、豫北建立了七、八专区和军分区，使太行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3.3万平方华里。此后，太行区的形势走出了困境，对敌斗争由被动转向主动，敌人在太行再也未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1943年10月，太行军区和129师师部正式分开，成立了独立的太行军区，李达任司令员，我任政委，黄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廷发任参谋长。从此，太行区的地方武装有了独立的建制和指挥机关。军区独立后，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武装的领导，于11月5日颁发了《太行区县、区、村各级指挥部暂行工作条例》。条例规定：“县区村各级指挥部是分区系统下的军事指挥机关，是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直接组织者与指挥者，是党政军民各组织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的联合办事处。”各级指挥部的任务是：“一元化领导下对敌进行以武装斗争为骨干的，结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的、全力的游击战争。”在冬季，县区村各级指挥部进行了整顿或重建，使太行区的民兵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更加适应从主动发动进攻到局部

反攻和大反攻的需要。

从1943年底开始到1944年2月,太行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日军加强了对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和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新的进攻,从太行区周围调走了一批老部队,又把从国内新征集的人员组成新部队派到太行周围,战斗力较前减弱。经过1943年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和政治攻势,伪军、伪组织受到打击和削弱,战斗力明显下降。面对这种变化,区党委在1月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敌斗争,乘敌调动之机,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加强对敌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进一步扩大根据地。

1944年的对敌斗争,是在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有近2/3)参加整风,军队、群众展开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年中太行军民发动了连续的局部反攻和反“扫荡”,改变了太行区一些地区长期被分割的局面,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全年中太行军民进行大小战斗4048次,攻克据点105个,收复国土达19.933万平方华里,解放了55.7万人。

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太行区的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进行了大整训。9月中旬,区党委召开了太行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开展政治和军事整训问题,拟定了整训实施纲要。会后军区成立了以营团干部为主的轮训队,太行武委会干部也参加,培训整训骨干。对人民武装的政治整训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肃清混乱思想,坚定胜

利信心。军事整训的主要内容为射击、投弹、地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配合主力作战,在敌人火力下运动,保护群众,战争勤务等。全区参加大整训的民兵达到93%以上,自卫队达到90%以上。在整训中,民兵、自卫队不仅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而且密切了干群之间、民兵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展了民兵和自卫队。

1944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召开了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大会和太行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即太行第一届群英会)。同时举办了战绩展览和生产展览。这是总结检阅抗战以来太行区对敌斗争战绩和经验的一次盛会。会上表彰了一批杀敌英雄,其中有主力部队的李仕亮、王凤才、董富培、靳小瑞、马振歧、胡胜才、赵亨德、范治平、刘凤祥、刘兰子;有各游击部队的暴文生、何绍堂、李德合、王志栋、胡彦铭、高宏;有边沿地区的民兵宁文小、任毛小、王德荣、刘玉珍、李三奎、李旦孩、宋二夫;有根据地内的民兵徐顺孩、张小保、陈炳昌、关二如、朱银马、刘二堂、王来发等。李达司令员在杀敌英雄会上的报告中讲到人民武装自1940年建立民兵以来的战绩时指出,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28774次,毙伤日伪军5621名,生俘日伪军2872名;缴获长短枪347支,轻机枪11挺,冲锋枪26挺,掷弹筒54个;摧毁碉堡155个,毁汽车7辆,破坏公路1723里,破坏铁路65里,破坏桥梁157座,破坏封锁沟墙1403里,毁火车20列。正是由于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和积极参

战,才使根据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坚持巩固下来,并不断扩大,成为支持抗战的可靠的基地,为大反攻和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

## 十六、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与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中共中央为克服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出现的严重困难，于1941年、1942年先后提出的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1943年10月中央将这两项政策列入著名的十大政策之中，仅次于对敌斗争之后的第二、第三项，可见其重要性。我们在根据地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对于这两项极其重要的政策的实施，对于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的作用，体会尤为深刻。

精兵简政政策，主要是针对根据地人民负担过重提出来的。从抗战爆发，我党我军深入敌后开辟创建根据地起，就存在着向人民征收钱粮，供给军队、政府工作人员生活必需品的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1938年5月讲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指出要注意解决供给问题，要实行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的政策。抗战开始，国民政府按照同我党达成的协议，供给我们的军队和政府一定的资金物资，再加上从当地征收的军政费用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基本能满足需要。进行反顽斗争后，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

停止给八路军拨款和供应物资,敌人进行“扫荡”时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再加上194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的侵袭,使根据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在太行根据地内驻扎的脱产人员是敌后各根据地最多的,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机关及直属单位,众多的八路军、军区、军分区、县大队、区小队及各支队等抗日部队,还有大批学校师生以及太行本区的党政军群团学校,脱产人员所占比例比陕甘宁边区外的任何一个敌后根据地都多。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发展和走上正规,脱产人员增加很快,且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太行区社会财富却呈减少趋势,人民负担逐年增加。到1941年,军政费用和人民负担的矛盾已突出地表现出来。矛盾主要反映在全年财政任务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大约只有84%。财政收入的两项主要来源田赋和合理负担,前者完成50%,后者完成40%,没有可能保证军政费用,特别是拨给八路军正规军的军费只占总支出的37.1%。对此,边区政府讨论财政问题时曾想了不少办法,但这些办法主要在开源上,如增加征收力度,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增加生产等方面。在节流方面也想了不少办法,如紧缩开支,严堵浪费,加强支出计算,紧把报销关,查处贪污腐化等。这些开源节流措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入不敷出的困难形势。到1941年秋冬季,财政困难有增无减,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引起许多民众的不满。1941年10月,敌人在华北实施第

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中心是经济封锁，重点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掠夺和在敌占区实行配给制度。这又加重了我们从根据地、接敌区和敌占区征收抗日费用的困难。

正在我们为筹集、解决军政费用研究办法时，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17日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各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中央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中央告诫全党：“我党我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以后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著名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要求全党“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通过实施这一政策，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以使根据地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

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我们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讨论在太行区实行精兵简政的问题。129师的精兵简政早在中央指示下达前，已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安排。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对精兵简政十分重视，亲自抓落实。其实129师早在1941年初就开始了精简整编，将师部的后勤部门和八路军总部的后勤部门合并，从各级统率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充实连队。中央指示下达后，129师师部



首先在1942年1月7日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由刘师长、邓政委主持。华北《新华日报》在1月24日报道了动员大会和会后由刘师长、邓政委主持的“精兵会议”讨论大会的情况。

为了在太行区尽快部署进行精兵简政的工作，区党委于1942年1月26日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研究具体实施办法。这次会上，我们重点学习了中央的指示，研究了第一期简政的方案。会上确定先从调整机构入手，以减少行政经费，目标是每年节约2万元。调整机构主要措施是并县：将获鹿并入井陘县；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县，由专署兼理；将平顺、和顺、沙河、涉县的县政府工作分别由专署兼任。裁区：区数减少40%。合村：将小村合为大村，主村设正村长，副村设副村长，村委会脱产干部减为4人。这项简政方案实施后，太行区共设甲等县8个，乙等县7个，丙等县7个，游击县10个，加上一个新县共33个县，县的建制少了5个。简政后全区有133个区、2950个村，达到了裁区40%的目的。这次简政着重是精简人员。第一次简政减少了人员，但经过5月反“扫荡”，证明还有许多不适应战争需要的问题。再加上实行大村制后，村干部脱产，战争一来，干部在主村，而战争以自然村为单位进行，村指挥部在主村，自然村处于无领导状态，主村孤立无援，受损失较大。山区行政村地域辽阔，开会比较困难，各种问题无法及时解决。专署兼县后专署事务增多，削弱了对县的领导，妨碍了县工作的深

入，贻误了战争。因此，第一次简政不完全成功，问题较多。

针对第一次精简存在的问题，区党委认识到，简政工作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太行的实际，根据战争的特点，重新研究新的简政方案。1942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要各地报告精兵简政总结，提出16个问题要求各地回答。这16项问题，许多是我们准备调查研究的问题。在5月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太行根据地人民负担确实较重，这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出：

全区共有土地3984951亩，各阶层土地占有比例为：地主占15%、富农占23%、中农占42%、贫农占18%。

全区人口150万（游击区2个人算根据地1人）。

收入情况：当时以每亩产7斗小米（以每斗15斤计）计，应收入41790万斤。由于租地比自营地产量低，每亩实际平均产6.5斗（合97.5斤），全区土地实产38805万斤。另加商业和副业收入约8895万斤，全区国民总收入为47700万斤。

负担计算：按照当时群众的生活水平，太行根据地每个负担人口平均负担54斤小米，全区可负担8100万斤。每个抗日部队的战士一年需小米1836斤，每个干部需小米1434斤（包括所有生活、工作、战争开支）。如此计算，每94个人可养活2个战士、1个干部，全区人民可以负担4.5万多抗日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而当时太行区内

有4万多部队、2万多地方工作人员，大大超过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从调查中发现，除财物负担外，人力负担也相当重。还有全区军政机关中4000多头牲口的粮草消费。人民群众除去公粮、支差负担外，收入剩不多，许多群众已有怨声。

根据中央政策和太行实际情况，根据地脱产人员军队不能超过总人口的2%，地方工作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太行区军队不超过3万，地方脱产人员不超过1.5万，这是精兵简政的目标。从8月份开始，全区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

简政工作从制定方案、确定组织编制开始。根据调查研究后的数据，确定太行区党政民学共留15000人（不包括边区政府），其中党的系统2340人，占15.6%；武委会和群众团体系统1727人，占11.5%；政权系统10933人，占72.9%，考虑山地较为分散，增加1000人。简政的原则是缩小上级领导机关，增强县区，减少杂务人员，多留工作干部，提高工作效率。这次简政后，太行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民学工作人员减少18%，节省经费38%。边区政府机关同时进行简政，缩减人员48%，节省经费46%，每月可节省公粮52.5万公斤小米，经费60万元（冀钞）。区党委在第二次简政中连同区党委党校等直属机关共减到157人（包括工勤人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并使部门设置合理化，在组织机构上也做了一些调整。这次简政中还纠正了第一次简政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缩

小上级领导机关,充实下级机关,增加区级干部。专署兼县的体制对工作不便,又分开,仍为专、县各自办公。小区大村体制改为大区小村体制。群众团体改为各救会合署办公。第二次精兵简政的成功经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包括太行根据地在内的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进行表扬,称赞说:“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第二次简政工作结束时,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在各个根据地内实行一元化领导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领导各方面工作的党的委员会,党从政治上加强对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一切组织的领导。这种领导,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根据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在晋冀豫区新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大章、李雪峰、蔡树藩组成,邓小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后由我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晋豫(中条)、冀南4个区党的工作。10月,太岳、晋豫两区合并为太岳区。太行分局成立时,太行军政委员会同时撤销。

分局成立后,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分局机关和晋冀

豫区党委机关合署办公，区党委机关刊物《战斗》改为分局主办，区党委党校改为分局党校。

太行分局成立后，领导范围未包括冀鲁豫区。太行分局领导的太行、太岳、冀南、晋豫区这时正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1942年敌人连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加上接踵而至的严重自然灾害，使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在这严重困难时期，邓小平受命全面负责党政军民统一领导的重任。邓小平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决定召开有各区党委以上党的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抗战5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对敌斗争方针，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会上决定，会议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温村召开，由邓小平作5年来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主报告，李大章作群众运动工作报告，戎伍胜（戎子和）作财经工作报告。请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到会指导、讲话。

经过充分准备后，1943年1月25日会议正式召开，一直开到2月20日。邓小平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主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我党领导晋冀豫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人民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指出了应该记取的教训。邓小平认为，5年中应记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有10条：

1. “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后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层对敌斗争的能力。”

2. “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3. “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一切从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

4. “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也同等的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5. “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时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

据地。”

6. “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要不断的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的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的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由缝隙钻敌人空子,以争取主动。”

7. “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8. “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一元化’的斗争”,“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9. “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

10. “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的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

以上 10 条,对于以后太行区战胜严重困难开展全面对敌斗争和进行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报告中,邓小平提出晋冀豫区今后的基本方针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根据地,从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各方面去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提出三项任务:

“第一,在根据地,必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阶层的团结,大大发挥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准备足够力量,以反对敌人的‘蚕食’、‘扫荡’和来自各方面的进攻。”

“第二,在敌占区,必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型的隐蔽游击根据地,加强敌占区人民中、伪军伪组织中的组织工作,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并配合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第三,为着胜利的进行今后的艰苦斗争,必须执行中央指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进行整风工作,并实行精兵简政,改善组织形式,缩小上层机关,加强下层力量,以适应于今后的斗争环境。”

邓小平报告后,李大章代表太行分局作了群众工作报告,戎伍胜代表边区政府作了财经工作报告,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作了报告并回答了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到会讲话。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在2月20日作了结论报告,针对讨论中争论的若干问题,如对北方局工作的看法、对1940年黎城会议的评价、对武装工作(主要是编并问题)、反倾向问题、根据地巩固程度问题等,代表分局作了结论。对今后的工作,重点强



调了 7 项,即:

1. 贯彻民主政治;
2. 继续发动群众,迅即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等法令;
3. 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4. 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
5. 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
6. 认真贯彻整风工作;
7. 实现一元化的斗争。

2 月 21 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一致通过了《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对报告和结论的决议》后宣告闭幕。

这是在晋冀鲁豫边区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是使边区从严重困难中向恢复和发展转变的会议。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战胜困难,全面开展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夺取抗战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太行分局会议后,太行区进行了第三次精兵简政工作。这次精兵简政的最大特点是贯彻实行一元化领导政策,达到“一元化、群众化、军事化与简单化”(由边区政府提出)的目标。精简后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机关、地委和军分区机关、县委和县基干队或独立营合并了伙食单位,太行军区的伙食单位合并了 118 个,太行区的政民系统干部减少到 1.1 万人,边区政府由原来的 548 人减少到 100 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 129 师师部机关合并办

公,师部兼太行军区指挥机关,总部、师部、军区的后勤业务全部合并。1943年10月1日,太行分局撤销,由于彭德怀回延安参加整风,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工作。10月9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更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直属北方局领导,我仍任区党委书记,兼任太行军区政委。太行分局撤销后,分局党校更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党校,由区党委直接领导。华北《新华日报》改为太行《新华日报》,成为太行区党委机关报。分局机关刊物《战斗》改为太行区党委机关刊物。经过三次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到1943年征收的公粮仅是1942年的33.33%,减少了900万公斤。太行区的精兵简政工作基本上做到了中央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1944年5月25日延安新华社发表《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指出:“自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后,太行区即认真、周密地彻底执行了这一政策。并能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及当前具体任务,不断地改造与发展这一政策,从42年到现在,已进行了三次简政,得到了不少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该总结概括了5点,即:加强了一元化领导,提高了政府独立工作能力,增大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干部的劳动观念,干部树立了群众观念。

## 十七、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中全党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是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后,为实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同全国各个战略区、各个地区的整风运动一样,都是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整风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整风运动的成果,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整风运动的经验,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党,发挥着作用。50年来,许多事情已经淡忘,有的根本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在太行山上参加和领导整风运动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每当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就使我仿佛又回到从幼年一步一步走上成熟阶段的关键时期。那次参加和领导整风运动,使我懂得了我党内部曲折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懂得了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怎样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事后的效果看,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从党内到

党外,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党员,从延安到前方,在各个战略区、各个地区,都开展了整风运动,把许多重大路线问题,特别是把党内的路线搞清了。在解决重大路线问题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中,毛泽东创造了一套做思想工作、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使全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把全党真正拧成一股劲,夺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太行区党委领导的整风运动可分为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部署的初期整风运动,温村会议上受到批评后以党校为主进行的整风运动两个大的阶段。从时间跨度看,第一阶段为1942年,第二阶段从1943年一直到1946年春结束,前后长达4年时间。

## 初期的整风运动

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北方局的部署开始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顿三风,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党内的残余,以便使党

在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全党的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我们是2月中旬得到毛泽东两个重要报告的,同时听到中央各机关、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的消息。3月3日,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教育指示。3月23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在太行召开宣教工作会议,在罗瑞卿主任主持下以整风精神检查过去全军干部教育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宣传上的党八股作风和对战士、公务人员教育中的形式主义。3月27日,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开始整风学习,并从4月1日开始用了半个月时间举行党八股检查大会,对报纸和新闻通讯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检查。

根据北方局的分工,我在边区政府机关领导整风学习。4月4日,我在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上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过去边区工作,所以有许多缺点,不单纯是因为客观形势的敌我斗争尖锐,三风不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主观主义方面,表现在麻痹,看不见情况的变化,对新情况不了解,总是运用老一套的办法。对下级布置工作,不根据客观的工作基础和群众力量,只是任务多、决定多、指示多,而检查却少。对群众要求多,给予群众的却少,不能满足群众要求。许多正确的法令政策未能贯彻,群众的

困难未能及时解决。下去工作的人,常常只看见一些现象,不了解全实际情况便乱发指示,到处批评。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对工作估计一般化。在宗派主义上表现为小团体、小贪污行为很多,本位主义,经济上打埋伏,干部调不动,自以为是,包办工作,唯我独尊,工作方式不民主,对他人不放心,对下级用钦差大臣的态度,把自己做成模型去衡量别人,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与人发生争论时固执己见,甚至争论以后再见面都不自然。此外,军政民在工作上的配合不够,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在党八股上的表现形式很多,如文件中一大堆道理,乱引用名人字句,公式化。指示信内照例包括内容很多,文章中很少开门见山,工作报告也常常是老一套等等。开会时照例先是有总结意见,再由大家提意见,名为讨论,实际上与会者不见得了解情况,往往是主观推断,会议内容空洞无味。开会往往时间要长,内容要多,形式上把许多工作都放进去,否则便认为没有完成工作。会议多而中心不突出。上级到下级去专门找人开会,开完会便算完了。工作的决定由边区层层传达到村便算完成了任务,到村几乎等于零,成了“传达递减律”。以上种种表现,使我们的工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不能深入下去。到了战时,工作便经不住考验。我在报告最后要求全边区在整顿三风中形成一个热烈的运动,举行由上而下、由全体到局部、由工作到个人的大检查。

这次面对 200 多名边区机关干部的清风动员报告,

是我的第一个整风报告。这个报告对推动太行根据地内的整风,起了公开号召发动的作用,表明共产党人要公开进行整风运动,要求各阶层人士、广大群众批评督促和帮助。这个报告列举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报告后,许多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揭露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上存在的不良作风很是佩服。为了领导好边区政府的整风,边区政府委员会于4月6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边区政府整风检查委员会,由边区政府委员、各直属局、法院、抗战学院干训部负责人和各秘书长组成。工商管理局与税务局组成一个检查单位,公安局、交通局、法院及边区政府机关本身各成为一个检查单位,从自查开始。边区政府系统领导机关的整风从此普遍开展起来。

整风运动在太行区最初发动时,由于对运动的目的、意义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因此,未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很快就进入检查纠正不正之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查自纠停留在就事论事上。区党委发现这一偏向后,根据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有关决定、指示,对太行区的整风运动进行研究,于4月15日发出《关于如何整顿三风的指示》,具体部署了1942年整顿三风的工作,强调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把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然后运用这些武器,联系检查本部门和本人的工作,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肯定、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的东西,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人的工作作风与思想作风。为了

组织干部学习,区党委和 129 师党委在涉县温村区党委党校开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实验班。实验班学员来自全区县、团单位党员干部中,约有 190 余人,支部书记为赵仲田,支委有巫利珍、赵雨亭等。区党委党校的领导成员有:是贾久民(校党委书记),薛明(组织科长)、吴光青、彭干(教育科长)、张建国(总务科长)等同志。实验班开学时,我去作了整风报告,强调要集中精力学习好 22 个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实质,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实验班学习中,遇到敌人的 5 月大“扫荡”,党校组织学员参加反“扫荡”斗争,对学员是一个考验。实验班的学员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团结奋战,说明经过初步学习整风文件,学员们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个实验班,一直办到 9 月中共太行分局成立,区党委党校改为分局党校时结束。

区党委在领导整风运动中,很重视对文化界整风学习的领导。太行区是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这里驻有八路军前方总部及直属单位、北方局机关及直属单位、129 师师部及直属单位、边区政府及直属单位以及区党委机关和直属单位。在众多的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中,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占的比重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我国的文化侵略。在华北,敌人从 1941 年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实施奴化教育政策,削弱抗日军民斗争,扶植汉奸傀儡为目标的文化侵略,从敌占区向游击区、根据地渗透。根据地内的



文化工作者对这一问题虽有觉察,但并未引起足够的警觉,文化人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逐渐严重起来。文艺工作者中的这种倾向尤其严重。1941年10月中旬发生黎城离卦道暴动后,引起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和区党委的警觉,深感在根据地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和我商量,有必要召开一次文化人座谈会,解决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42年1月,由129师师部和区党委联合召开了有近500人参加的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参加者包括22个文化团体、太行区6个专署28个县的代表以及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直属单位、学校的代表,在太岳区的386旅、冀南军区以及敌占区都派代表参加了座谈会。邓小平和我主持了会议。参加领导座谈会的还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长王东明、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朱光、区党委宣传部长彭涛、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杨献珍等。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理论与现实及现实对于理论的要求的问题,关于提高与普及的问题,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关于文化斗争策略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及关于文化工作者的修养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有人主张“内容决定形式”,崭新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生活应有崭新的形式,有人主张“旧瓶装新酒”,争取民族的形式,更易于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有人认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会上由太行山成长起来的作家赵树

理提出的文化工作要大众化的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之一。他力主文化工作者要重视普及工作，并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大众化的迫切性。有人赞同赵树理的观点，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会议结束时，我们请太行山的理论家杨献珍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讲话。他的发言是同王东明、朱光、彭涛等研究后讲的。杨献珍在发言中，强调了对农民群众进行教育的问题，要求文化工作者发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杨献珍提出要创造新民主主义形式，要吸收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和外国文化的精华，反对不照顾群众的倾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要客观的衡量群众的水平，加强批判性，着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这次会议开在全党整风运动即将普遍发动的前夕，其目的是解决文化工作如何联系实际、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等问题。会议提出和探讨的问题，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3天时间，只是提出和初步展开了讨论，许多问题并未真正解决。但是，这次座谈会太行根据地和冀南、太岳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明确指出了文化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给广大文化工作者敲了警钟；提出了文化工作必须为广大抗日群众服务，必须从抗日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的问题。

会后不久，中央在全党发动了整风运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学习。5月下旬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区后，文化人座谈会上争论的问题，才有了十分明确的答案。

座谈会结束后，《华北文化》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对根据地文化运动“有指导性”的文章。根据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有关指示和整风文件，经过一段思考和学习，于5月份写了《关于文化战线上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在6月5日出版的《华北文化》第3期。我在文章中从根据地社会性质谈起，指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敌后社会，已经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天还在创造建设中。在这个创造建设的过程中，包含着许多对于旧社会的改造和斗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对旧社会的改造斗争中来创造与建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改造斗争中，需要文化和理论，这当然主要靠文化界的努力了，可是文化理论的创造建设以至于它的提高，也必须从参加与指导实际的新社会的创造建设的斗争——对敌的及对旧社会的具体斗争——中才能建立起来，才能提高。”这是现实对理论的要求。文化工作者要明确自己在创造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肩负的历史责任，“成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文化工作者”。从以上指导思想出发，我在文中提出现实第一，深入第一，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到农村、农民、工厂、工人、连队、士兵及学校、学生中去，从深入斗争与实践的战争中去研究、总结，来提高艺术。在根据地中，文化工作者的深入与文化的普及问题，是主攻方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敌我斗争的实际，是文艺作品的主

要的活的内容。这种内容不是伸手可拾的,也不是想像而生的,更不是“灵感”的产物,它必须从深入群众中去才能获得。无论任何艺术品,内容是第一,但形式也有它的积极性,形式只有与内容结合时才能发挥出来。在根据地中,对于群众所习惯和喜爱的旧形式可以利用改造。对旧形式下的旧剧团、旧艺人,都应该去团结,去联合,去利用,加以新的内容,通过他们去建立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使群众接受教育。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当到老百姓中去工作,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提高自己,获取力量,了解他们的文化需要,满足他们的文化要求,做群众的朋友。今天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调查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娱乐方式与风俗习惯,应当帮助群众,与他们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帮助文化工作,如改造壁报、戏曲、歌曲、小调等,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武器,来执行我们的政治任务,用通俗的形象来参加政治斗争。文艺作品要十分注意效果,文化工作要以现实为第一,为革命服务为第一。

对于太行根据地内文化人的整风学习,区党委在整个整风运动中都很重视,帮助他们从旧文化影响下摆脱出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努力学习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思想,投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在太行山中培养出一大批贴近农村,熟悉农民,热心为农民创作的文化人才,其中赵树理是典型代表。他是太行山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在根据地内,由赵树理主编的《中国

人》周刊很受广大民众欢迎。在他的笔下,以农民为中心的作品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文化人座谈会上,赵树理尖锐地提出了要搞群众爱看爱买的“地摊子文艺”,不要搞只在文化人小圈内打转转、供文化交流欣赏的“交换文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后,赵树理读了有一种“好比翻了身的农民”的感觉,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著名的文艺作品。和赵树理同一时期的文化人王春、阮章竞(洪荒)、王玉堂(冈夫)、高沐鸿等都在文艺创作上有重大突破,写出了一批优秀作品。1944年12月我们召开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时,文化人大显身手,为大会演出的58个剧目,绝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的抗日斗争、根据地建设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内容。1945年4月,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太行区文教群英会(会议正式名称是“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会议”),检阅全区经过战争锻炼和考验,经过整风运动后文化工作的成就。到会者近千人,真是人才济济、百花竞放。在开幕式上,我就敌后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关系问题讲了话,指出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就,是由于坚持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方向才取得的。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虽然集中了不少文化人,但由于没有政治的民主,没有文化的自由,也就没有文化的繁荣。从太行区文化工作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整风运动的成果。

1942年9月太行分局成立后,区党委党校改为太行

分局党校，冷楚任党校党委书记，贾久民任副书记。改成分局党校后，原办的整风学习实验班在9月份结束，准备以分局名义再办整风学习班。1943年分局召开温村会议时对整风运动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这时，全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并逐渐引向深入，延安和一些根据地的整风学习已经从整顿学风、整顿党风转向整顿文风。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向各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提出在1943年1月要完成整顿文风的学习，然后转向整风学习总结阶段。温村会议时，邓小平收到中央询问整风情况的电报，分局召开会议对整风学习情况进行研究，决定在1943年把整风运动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由各级党委第一把手亲自领导。

在温村会议上，太行区的整风运动同其他区一样受到批评。第一次批评是2月8日彭德怀代表北方局向大会作报告时讲的。他说：“去年整风运动，由于敌人‘扫荡’与我们主观上未抓紧时间进行，由于对整风认识不够，因而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一年来本区整风运动还非常差。”第二次是邓小平在2月20日作会议结论时讲的。邓小平说：“检查我们一年来关于整风工作的进行，无论地方与军队中党的组织，一般说来，读了二十二种文件，开始了学习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然而仅只是开始，还未能热烈响应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的号召与决定。各级党在接到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与指示后，也作了一些决定指示和计划，然而这些决定与计划，许多

未曾联系实际贯彻下去,而在整风本身,也曾发生了不少歪风。如从整风的范围上来讲,目前主要尚停滞于少数领导机关的工作干部中,在地方党地委以上、部队旅以上的许多主要负责干部,均未能在整风中先起核心的示范作用,多是只整别人、不整自己,或采取自流的旁观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易造成雷厉风行的整风运动,这是一。其次,从整风的内容与实质上讲,一般对于整风重点,是对进行思想改造的意义认识不够,不了解党内的一切歪风的来源,都是我们思想上有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各式各样不正确思想来的。因此,过去在整风工作进行中,无重点的‘为整风而整风’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的,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从整风的方法方式上讲,一般是偏重于书本理论(这当然是重要的)的整风,不注意同实际工作相联系。从实际工作去检讨与纠正许多三风不正的事实,因而过去的整风表现空洞与枯燥无味,缺乏生动的实际内容。总之,过去我们对于整风的意义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对于整风的领导和布置是主观主义的,所以过去的整风运动,不易向着顺利正确的开展。”

邓小平的批评,基本符合太行区整风的实际,对我们的震动很大。会上,我就太行整风学习进行了检讨性的总结。分局在开会中,专门研究了如何开展整风学习的问题,确定整风学习从头开始,首先着重学风的深入研究与检讨,主要着重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重点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抽出一批县级干部进行集体整风轮训。邓小平把以上意见向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汇报后，北方局批准了分局的安排意见。邓小平在温村高干会的结论中代表分局安排了1943年的整风学习，要求在1943年造成整风运动的高潮。

高干会结束后，在邓小平领导下，着手制定《太行分局关于1943年的整风计划》。在这之前，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2月5日发出关于1943年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分局在讨论整风计划时，根据以上指示和邓小平在高干会上的结论，具体安排了全区的整风。整风计划提出，整风暂定半年，从4月1日开始到10月作总结（扫荡时间不算）。整风对象分三类：（一）重点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军队中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二）地方党县与军队团营一级必须进行整风与反省，但分量与要求，比高级干部轻。（三）地方党分委与军队连一级可进行初步的整风。全区各级整风由分局、区党委、地委、县委等各级党委为核心，结合各同级军政民各主要负责干部共同组织整风委员会领导，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由邓小平、李大章、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李达、黄镇、赖若愚、毛齐华、杨珏等10人组成，邓小平为主任，李大章为副主任。计划中把参加整风的干部分为4类：甲种干部包括分局、师部、区党委一级主要负责人；乙种干部包括地委、旅、分区、专署及分局、师部、边区政府、区党委直属机关中的部、科、处级干部；丙种干部包括县委、团、营与地委、



旅、分区、专署一级直属机关中科以上干部；丁种干部包括分委与连级干部。对不同级别的干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计划还具体安排了整风学习的重点和进度。计划中对太行区部队的整风特别列了一条，提出：“太行区部队团以上干部学风已经读完，都作了初步反省笔记，虽有部分成绩，但一般不深刻，故应将过去学习告一结束，返回再学学风，务求精深，达到打通思想的目的，如此，也可与地方干部整风计划求得一致。”为了加强干部整风，分局将区党委党校改为分局党校，调冷楚任党委书记、副校长，贾久民任副书记兼组织科长。

太行分局的整风计划是太行区自开展整风学习以来最为详细的一个计划，把北方局和分局高干会上关于整风学习的意见具体化了。此后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展开，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都亲自领导整风，使整风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

## 以党校为主进行的整风运动

从1943年3月起，太行区的整风运动进入以党校为主进行的阶段，我的工作逐步转入以领导整风为主。下面分别介绍太行分局党校整风班和太行区党委党校整风班的情况。

### 一、太行分局党校整风班

1943年3月分局总整风委员会在研究分局党校整

风计划时,邓小平提出,鉴于冀南根据地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如果让冀南区党委在冀南根据地内集中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会有许多困难,因此要把冀南干部集中到太行山中,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带有休养与避难性质。3月中旬太行分局党校举办了两个整风班:一个是太行、冀南两区县级以上干部的整风班,一个是冀南区分委干部的分批整训班。太行区参加的干部是县委常委、县长、各救会主席、公安局长;冀南区参加的干部是县委委员以上干部能离开的都到,区分委的干部也是能离开的都到。因此,从数量上讲,冀南区的干部占多数,有100多人,太行的干部不到百人。整风班的学习分三个阶段,即:综合性文件学习阶段,由李大章负责指导;学风文件学习阶段,由邓小平指导;党风文件学习阶段,由我指导。原计划整风班学习3个月,分批整训学习1个半月,由于中间发生敌人对太行区的5月大“扫荡”,整风班一直延续到8月结束。这时,分局党校住在涉县会里村。

太行分局党校办的整风班开学后,民主选举了太行、冀南两个班的党支部,在分局党校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学习。太行支部的书记是曹幼民,当时他是抗大的政工干部。支委有余非,即庞然,他是一地委青委书记;罗晶,他是磁武县委组织部长;李修仁,他是和顺县委书记。冀南支部的负责人是粟汇川。由学员自己管理自己,由选举产生的支部协助校党委领导整风学习,能够充分发扬民主,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可以用学员本身的经验指导学习。

学员学习都很认真，领导上着重引导学员精读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结合自己的工作业务加深认识，引导学员联系思想方法、思想意识、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总结提高。整风学习中，邓小平作了学风学习的总结报告，李大章作了文风学习的总结报告，我作了党风学习的总结报告。这一期办的比较死板，民主没有很好发扬，联系实际揭发批评不够，讨论中多数发言表现为概念式或工作汇报式。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这个问题以后，有所改进。

## 二、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

1943年10月6日，中央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决定撤销中共太行分局，原分局领导的区党委归北方局领导，由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改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我仍任书记，赖若愚任组织部长，张磐石任宣传部长。分局撤销后，分局党校改名为太行区党委党校。区党委和党校都驻扎在涉县赤岸村，冷楚、贾久民仍是党校领导，增加了刘建勋为校党委常委，他仍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太行区党委领导班子组成后，立即研究全区的整风运动，决定从10月24日开始举办第二期整风班。同时决定，组成有9人参加的太行区整风委员会，成员包括：李雪峰、李达、黄镇、赖若愚、张磐石、徐子荣、刘建勋、王树声、程式兰等。这一期共有190余人，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各半，一直办到1944年1月结束。

在党校集中整风班整风的同时，区党委总结了过去

的整风工作,根据“在职干部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在职干部化”的原则,干部除参加各级党校的整风外,其余干部按照区党委的安排,在职参加整风学习。10月25日,区党委和军区联合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了区党委21日作出的《关于今明两年彻底完成全区整风任务及目前阶段的计划》,并就整风问题作了动员。我在动员中指出,这次整风的意义,在于运用文件的武器,发掘与改造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问题,向自己进行调查研究,改造我们每个同志成为自觉的阶级战士。每个干部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解剖自己,打破戒心,想到就写,写到就讲,讲了就改正。

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二期整风班是区党委直接领导的党校整风班的第一期,因在太行分局党校时曾办过一期,因此叫第二期。这一期开学时,太行根据地已经渡过了难关,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太南、豫北地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各项建设正在重新发动,精兵简政工作已告一段落,根据地走上了巩固发展阶段。因此,在举办第二期时,调来一批地委、县委以上,军队团以上主要干部参加,如邢台县委书记程式兰、临城县委书记王治平、磁武县县长江东平、井陘县长宋玉玺、抗大太行分校政委李克如、385旅769团团团长马忠全等。开学后民主选举了支部,由李克如等组成学员支部,协助校党委组织整风学习。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党委共同领导了这一期的整风。

第二期整风班是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开学的。这时，延安的整风运动已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转。太行区由于从春季反“扫荡”开始，中间经过5月反“扫荡”、8月林南战役及生产救灾运动，各级领导未能坐下来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地读文件和进行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8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后也未能进行审干的部署。因此，在第二期开学时，区党委在安排学习文件和部署全区的整风时，除要求读好22个文件外，安排了学习《评中国之命运》等文件，以彻底认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实质，并安排了审干工作。在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重点学习《评中国之命运》，实际是动员阶段。当时叫“收放心”，意思是把心收回来端正整风态度。通过学习，弄清中国发展前途，澄清政治思想，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蒋介石的思想及企图，研究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学习文件和研究问题中，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特别是在三次反共高潮中每个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澄清糊涂观念。在学习中，发现有很多人对于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统一战线等有糊涂认识，不少干部在统一战线环境中把国民党、蒋介石看作是抗战的“主体”，是国家的“正统”领导，有的在严重关头发生政治动摇。这种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的学习方法，使多数同志改变了当领导的傲慢态度，认识到参加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在进入学风学习阶段后，重

点引导大家解决如何对待理论和如何对待实际的问题，也就是整风中的正确方针和态度问题。在学风学习中，普遍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反省，对每个时期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自我批评逐步开展起来。进入党风学习阶段后，接触到了个人与党的关系，接触到了实际的问题，开始揭发思想深处的秘密，考虑自己是否对党忠诚，开始进行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学习准备，整风进入大会发言阶段，即进入群众运动阶段。大会发言从典型人开始，引导大家大胆进行自我批评，从揭发个人享乐主义到组织问题，特别揭发了有的人如何不满党、欺骗党、反对党，还揭发了部队、公安部门一些消极内幕。大会之后转入分小组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正在发动群众时，大约在12月上、中旬，从延安传来康生搞的那场“抢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区党委党校仿照延安“抢救失足者”的做法，发动了坦白运动。因有逼、供、信的“左”的偏向，有19个干部对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在小组会上时而坦白，时而推翻。约在12月中旬，党校召开坦白大会，一些人走上台去痛哭流涕进行坦白，有一个武委会的干部在小组会上说太行区有30多个国民党特务。他列了一个名单，党校的冷楚、贾久民、刘建勋看后，认为名单上的人是太行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骨干，不可信，是编造的，迅速把名单送给我看。我一看名单，根本不可信，把此人从党校送回原单位去处理。这一期开始时还发生了杨诚自杀事件。杨诚是二地委一个县

的公安局长，广东人，在“抢救运动”中被迫服自带大烟土自杀。区党委认为是迫害致死，开了追悼会平反，我讲了话。在整风小组会上，发生了逼、供、信现象。有一天晚上，张磐石在党校内散步，发现一伙人正在一个小屋内打一个人，搞逼、供、信，他立刻找我提出不能这样搞，再搞要出问题。在坦白运动中，乱咬人、胡编乱造的情况不断发生。有人指供边区有一个庞大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其领导人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有人说区党委机关内有特务，甚至说我妻子翟英也是特务。这种严重的乱怀疑、乱供、乱坦白现象，给区党委敲了警钟。我和赖若愚、张磐石商量，召开区党委委员会，研究制止这种混乱局面。会上，绝大部分委员认为应该立即停止逼、供、信。个别委员认为应继续发动群众，不能束缚手脚。大家都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由我代表区党委到整风班去讲，公开提出纠正“左”的偏向。我在大会上讲了区党委纠偏的意见，受到干部的欢迎，许多乱坦白的人承认自己是胡说瞎编，制止了逼、供、信。此后，中央也发来要求停止“抢救运动”的指示。区党委当时独立地决定纠偏，是冒了风险的。我们认为，整风就是要整不实事求是的歪风，在领导整风中发现有不实事求是虚假坦白问题，出现逼、供、信现象时，应该站出来制止。区党委有这个责任，否则就是对党不负责，对同志不负责。区党委党校的“抢救运动”和逼、供、信的偏向，也影响到全区的整风运动。一些地委党校仿照区党委党校的做法，也出了问题。区党委公开纠偏后，各地委

也采取紧急措施纠偏,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第二期整风班通过学习研究文件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也揭发出不少我们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普遍存在的享乐主义,如贪图小利,吃喝,给地主甚至给特务当工具,贪污公款公物,玩弄异性,贪赃枉法,追求安逸等等。有的人向党闹独立性,要求权力、地位。有的人自以为是,过分看重自己的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成绩,看不起上级,以抗上为荣,自称硬骨头,无组织无纪律等等。我在这一期整风班结束时作了总结。结合整风学习中揭露出来的以上问题,着重从理论上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其危害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巩固整风成果的问题。

我在总结中曾把揭发出来的问题归纳为两大类:一类属于享乐主义,一类属于个人对党的态度和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理论”支持,其“理论”为“服从真理不服从组织”,“对革命负责对党不服从”,“反对人不反对党”,“服从组织不一定服从组织的代表”,“反对走上层路线”,“反对上层但不反对接近上层”,“反对奴隶主义尊重自由思想”,“党内谁无私情?”,“食色性也,是人的最大要求”等等。这些“理论”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党、看待党内的一切事情。以上“理论”表现为自以为是的信念至上,似乎是从具体实际出发,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片面的夸大的事实,然后又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使其



系统化,结果把组织和个人对立起来,把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导致把真理和党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最高组织形式,不了解党是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战斗组织,不了解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因此,错误思想只服从抽象的组织,不服从具体的组织,只服从适合他利益的原则,不服从限制他个人私利发展的原则,实质上是只服从他自己。我在报告中还对干部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作了分析,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破坏政治机关威信,对群众不负责任,乐于行政命令,施行恩惠主义,不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思想情绪,不执行集体决定。对于少数人存在的悲观厌战情绪、政治动摇倾向,在总结中提请大家特别注意。有这种情绪和倾向,在敌人“蚕食”、“清剿”、大“扫荡”时期及政局严重时期,如三次反共高潮时期,会使敌人乘虚而入,直接导致背叛党、背叛革命。在分析了整风中暴露出的种种思想及其产生的危害和根源后,我提出,思想改造是长期革命实践,是长期的思想教育问题。整风中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还在于今后在实践中巩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觉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加强党内思想锻炼,经得起批评,在党内树立起批评的空气,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要求自己,凡事问一个“是什么”、“为什么”,真正解决立场和方法问题。

区党委直接领导的这一期党校整风,是自整风运动

开展以来我直接负责的第一次。虽然这时对怎样领导整风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中间还受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发生了偏向,但是,通过这一期整风,使区党委对整风有了进一步认识,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从领导整风中体会到,整风是一个自我觉醒运动,无论对党对个人,清算错误思想及作风,坚定自己的立场,都是共产党员的自我教育。整风中的自我批评,是全面系统的自我批评和开展批评的运动,基础是根据思想自觉及思想的指导,联系自己的问题,寻找思想根源,加以解决。整风是一场群众运动,是群众的思想运动。在指导整风时,根据群众(在党校是群众,实际上都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引导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领导整风必须有高度的群众观点,否则不可能引导整风深入进行。整风是一场思想运动,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型,因此必须加强思想领导,首先端正立场,即从端正整风态度入手,然后逐步展开。思想指导要求有高度计划性,但不是固定不变的计划,必须依照思想运动的客观发展,善于诱导,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伸缩性。整风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在具体问题上必须以无产阶级集体的英雄主义战胜个人英雄主义,以革命荣誉战胜小资产阶级的虚荣,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战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对每一个参加整风的干部,一方面要有严格的思想斗争,一方面要有热诚的感动。斗争和感动都是群众性的。在生活上,一开始就应提倡集体化、组织化,思想上

提倡自由思想,打破奴隶主义,锻炼无产阶级生活的纪律性和思想的科学性,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观、盲从,发现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帮助带动落后。在组织领导上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民主形成整风领导核心。核心要在运动中形成,领导要参加到运动中,向群众学习,经主席团集中群众意见,体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第二期总结出来的这些领导整风的经验教训,对区党委领导第三期整风班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三、太行区党委党校第三期整风班

1944年1月结束了第二期整风后,紧接着在区党委党校举办了第三期整风班。这时太行根据地已完全度过了难关,无论对敌斗争,还是根据地建设,都呈现出抗战以来最好的形势。元旦,北方局发布关于1944年的方针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利用战争与生产的一切空隙,完成整风运动,在一定时间内以大部分干部集中专门进行整风,少数人坚持工作。要把整风和审干结合起来进行,不一定在整风完结之后才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根据北方局指示,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决定春节前把未参加整风的县团以上干部大部分集中起来,举办第三期整风班。因此,第二期刚刚结束,第三期就在1944年1月开始集中。这一期有200多名县、团以上干部参加,区党委负责人全力参加领导,我自始至终坐镇区党委党校,把主要精力全部用在领导这一期整风班上。当时党校在赤岸。以后,区党委又陆续在温村举办了报社、文联、干校、联中、工会联合整

风班,由张磐石负责;在索堡举办了边区政府、工商局、交通局联合整风班,由赖若愚负责。这样,区党委三位主要领导各把一口,坐镇领导。

学员入学后,我们采取不同于第二期的编组法,即把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混合编组,按地区划分,上下级同在一个组,便于相互打通思想,打破情面深入研究思想问题。这一期同样经过民主选举建立支部,参与领导。选举结果,由救联主席池必卿任书记,6分区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和八专署专员邓肇祥为支委。这一期主要领导来的最多,除县、团级干部外,还有一些地、旅级干部。我记得部队干部有卢仁灿(385旅政治部主任、参加校党委为委员)、张国传(2分区司令员)、宋子春(8分区副政委)、向守志(31团团团长)、韩卫民(769团参谋长)、肖永银(769团营长)等。地方干部有顾卓新(五专署专员)、徐启文(公安总局局长)、霍泛(黎城县委书记)、翟英(左权县委副书记)、陈大东(救联负责人)、林朋(焦作市市长)、武振声(一专署副专员)、陈舜英(太行区妇救会党组副书记)等。

这一期学习文件的方法和反省思想的方法同第二期基本一样,先精读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反省,选择典型带动大家。这一期开始时仍有“左”的偏向,逼、供还存在,让自己否定自己,大家都处于一种沉重的气氛中。区党委指导的重点,由第二期以小组指导为主,改为以大会指导为主。搞了个把月,不能深入。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直接参加到各个小组中去,把自己放进去。这时

了解到,原订的学习讨论框框不合适,文件并没有真正成为学员手中的武器,许多思想实际暴露不出来,官腔多,不敢敞开心扉,不敢面对面批评区党委和现在跟他同学习的上级领导。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决定放手发扬民主,开大会批到区党委或各个负责人时,都可以直接点名。区党委认为这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能把不好听的话听下去,敢于吃点苦果。如果批到你,说的即使言辞激昂,而你还是思想不能动,还是脸不红,心不跳,那你就太不认真,太不负责了。如果你能对逆耳之言、不确之辞硬着头皮听下去,对于语重心长、触动灵魂的批评能够虚心记取,躬行于后,这就说明你作风有进步,敢于放手民主,听取不同意见,真正相信你曾经同甘共苦、朝夕与共的同志,开诚、亮底、交心,能够联系群众。这样才好分析研究,真正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定会收到应有的效果。经过引导,第三期整风立即生动活跃起来,大会、小会,会内、会外,到处议论开来。第三期时间较长,一直搞了一年多,到1945年4月底才结束。这当然不是说一年多中区党委没有做别的工作,只领导整风,而是以整风为重点开展工作。其他一些工作,如组织局部反攻,进行根据地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深入减租减息,推动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进行时事教育,开展拥军优抗,召开群英会等等。都和整风结合进行,并在整风中继续进行了审干工作。通过第三期整风,真正为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相互了解和团结奠定了新的基础,大大打开了整风和

党内生活的生动局面。由于整风的深入,提高了认识,增进了团结,把太行区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大步,带动了其他工作。

区党委在领导第三期整风班中,用力最多,收获最大。总体说来,第三期整风班有以下特点:

在放手民主,展开各种批评,形成人人思考、议论纷纷之际,领导上非常注意思想发动(这本来是群众运动中发展群众自求解放的口号)。那时认为叫思想教育或思想宣传都较一般,有灌输的味道,因而改为“思想发动”。当时领导上着意从思想上启发群众,把扩军改称参军,救灾改成自救或度荒。意思是站到群众里边说话。在整风班,干部也是群众,也叫思想发动,注重干部自觉,研究各个时期各个人——各方面不同经历人的思想脉络,找出一定时期有特殊性的共同问题,以至在急剧变化的每天出现的重要问题,加以集中、引导。例如,每天大会热烈讨论、批评、争论之后,由负责人作半小时、一小时的讲话。当时名曰“晚报”,不作结论,不批评任何人、任何观点,只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提出问题,谈看问题的角度,谈怎样设想,怎样回答,有时设想几种不同的观点、角度、方法,或从不同方面对同一问题作几种回答,然后加以比较、分析,并不直接作出领导认为较好的答案。因为提出的问题只是当天议论的问题,大家都熟悉,都在思考、分辩、争议之中,容易共鸣,引起干部进一步研究。往往因为大家选择的思想方法和看法大多趋于一致,也就大体上解决了

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争论。慢慢问题越集中越大,越追到根本点越同中央、上级党的正确指示归到一致处,因而也就解决了问题。不同的意见搁置起来,本人也不要再闹了,大家心情比较舒畅。

举一个例子。在批评区党委进入高潮时,有些同志说,区党委犯的是路线错误,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都是路线错误。区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能正面批驳,不要搞顶撞,泼冷水,决定由我出面回答。我在大会上采取启发式的提出问题的方式说,太行根据地是个客观存在,想多讲它的成就不对头,少讲了、贬低了也不适合,客观事实会“说话”的。我们大家一起在太行山战斗了6年多,大家都是稍前略后来到了太行山,被历史推到了现在的岗位,功过是非,或大或小,要对太行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现在有人提出,区党委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路线错误,如果大家真的都赞成这个意见,都是这个主张,我也可以赞成。我讲完,让大家讨论。结果,大家都不同意这个意见。有的同志尖锐地提出,什么路线错误!你去错误,我们不错误!一场争论就这么解决了,大家都高兴。

在领导第三期整风班中,根据整风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讨论,形成了三个高潮,各有特点,相互依序衔接。三个大讨论高潮是“历史自觉”、“革命自觉”和“领导自觉”。

“历史自觉”是在经过学风学习阶段之后,转向党风

学习时,从读文件、暴露思想到小组、大会讨论,逐步发动起来的。“历史自觉”就是每个同志大胆讲自己,自传式地谈论自己的经历、感受,谈论环境或者青少年时期的事,谈论长大以后的曲折遭遇、人情世态,以及自己思想上的迷惘、追求、曙光、盼胜利、犯错误、上当等等生活、道德、组织、政治、阶级各方面的思想。这是三个高潮中历时最长的高潮,人人都卷进去,丰富多样。通过回忆、谈论,引起每个人的回想、怀念,想起参加革命不易,革命中的莽撞,工作中的喜悦,失误时的懊悔、垂头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等等。尤其有不少经过长征的部队同志,讲他们离开家乡,踏上征途,不知底细,不明方向,随大流走,掉队着急,翻大山、涉急水,日行百里,绕圈圈,甩掉敌人,寻机作战,过雪山草地,缺衣少食,躺下就起不来……种种复杂情况和复杂心境,但由于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经过学习、总结,日甚一日地了解了全盘情况,大家认为自己的心和党和革命更贴近了。没有党,没有同志间的互教互帮,互相关心和鼓舞,那样复杂的党外党内斗争怎么能过得来呢?怎么会有今天的革命好形势?会有今天的自己?参加过白区地下工作的同志,讲他们的勇敢、慌张、恐怖、不安、监狱、出监等等大同小异而又各有特殊情况的具体斗争情况。做过学生运动的,讲他们青春时期的爱国爱校、先进落后、秘密工作、公开闹学潮、冲击反动统治等等情况。总之,每个人的曲折斗争、痛苦喜悦都同这个革命大集体,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自



然而地联结起来了，都逐渐地了解、感受到党的伟大，都理解到个人同党是个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个人是渺小的，党和革命事业却是由每个能征善战，有错能改的具体的人、干部、同志组成的，有领导，有上下左右的同志。觉悟了的人团结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个人的发展同党是密切联结在一起的，党的胜利、党的曲折、党的前进与一时的后退都是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这样引导大家从自己的实际经过中反省，解决党内问题，正确认识个人和党的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具体到每个人，收效并不一样，差异仍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基本解决了正确对待党和个人关系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同样，对区党委的缺点错误也能心平气和、公正理解了。通过大讨论，对大家共同创建的根据地更有感情了。用回顾历史的方法，以酸甜苦辣的经历自己教育自己，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经验。

“革命自觉”是在“历史自觉”高潮过去后，从讨论时局、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批判张国焘路线中逐步进入高潮的。在区党委党校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召开的纪念七一大会上，我曾专门讲了我们党 23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中国在全世界所处的地位，党的路线，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等，提出了“革命自觉”问题，要求大家放下包袱参加整风。我认为，在整风中，在毛泽东思想和正确路线指引下，不但能培养出顽强的战士，而且能挽救出犯错误的人，这是党的奇迹。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党有伟大

气魄,能克服旧社会遗留下的毒素,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次讲话,对推动“革命自觉”有帮助。“革命自觉”处理的是对待革命形势、革命现实、革命前途的问题。其方法仍是联系自己的思想,联系实际,由群众自己讲根据地6年多斗争的经验,理解党在各个时期、各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逐渐由不满意到理解,由批评多到分析讨论多,在认识上又提高一步。这一阶段中,我在“晚报”时讲道理多,讲形势多。开始转向“革命自觉”阶段时,我在会上提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处在革命时代,是革命英雄创造英雄事业,发挥英雄主义的时代。每个同志都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要怎么走?应该怎样走?你是否要做革命英雄?是否要创造英雄事业?这是整风中的“革命自觉”,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所谓“革命自觉”也就是政治自觉、价值自觉、责任自觉。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彻底胜利,中国人民的力量在高涨,这是一个大变化时期。回忆抗战初期,我党力量在全国的比重并不大,但因质量高,发展非常迅速。敌人一开始轻视我们,以后却不得不重视我们。1941、1942年中,敌人用大力搞我们,曾使我们吃了不少的苦,以至于缩小了根据地。但由于我们党的质量高,代表人民利益,所以在敌人压力稍稍放松时(1943年,特别是1944年),我们又迅速发展了。现在,我们已不是1942年以前的情况了,我们的斗争本领、军事力量与干部力量都有很大增长,敌人对我们是更无法对付了。历史给我们党提出的任务,即是组织与领

导这种伟大的革命运动,迎接新的大变化,夺取更大的胜利。为此,我们通过整风,要打下基础,担负更重的责任。今天当团长的,很快要你去当师长;今天当县长的,很快要你去当专员;今天当县委委员,很快要你当地委委员。这种重任,要求每个同志问问自己能力行不行,整风整好了没有?有哪些问题弄通了,有哪些问题没有弄通?只有通过整风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才能担负更重的任务。我这样讲,是为了鼓劲,为了使大家放下包袱,端正态度,减轻思想负担。“革命自觉”阶段解决的问题是要了解时代、革命形势、革命任务,下决心做一个革命战士。只有从自我中解放出来,放下包袱,全心全意跟党走,才能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我们组织大家讨论“你属于谁?你应该属于谁?你过去属于谁?现在属于谁?将来属于谁?”讨论这个问题,使大家明白,世界上没有无所属的人,凡人必有所属,你不属于这个阶级或这个集团,必属于那个阶级或那个集团。有所属就必然有将来,你所属的集团或阶级的命运,会决定你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也就是革命观、人生观,是在整风中要解决的问题。我在会上讲,我对这个问题有肯定的回答,我属于党,属于革命。我的籍贯原属山西,但现在属于党;我的生死、我的年龄,都是属于党。我虽然也有爱人和亲友,但我并不属于他们。确定了所属,才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才有真正的愉快。这愉快是与革命事业融化在一起的。有了以上思想,就会无所畏惧,就没有了像女孩子一样的娇气,受不得一点批评,不

愿彻底暴露自己的问题。经过大讨论,大家信心提高了,自觉地检讨对时局、对形势、对前途的认识,把个人的命运和党的革命的命运放在一起,决心当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这一段主要讨论道理比较多。

“领导自觉”高潮,是整风中必然经过的阶段。区党委在第三期整风班开学后,曾先后在6月、9月召开了两次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汇报、总结全区的整风运动。在6月会上,提出了整风中要划分“历史自觉”、“革命自觉”、“领导自觉”三个阶段。在9月会上,提“历史自觉”解决阶级观,“革命自觉”解决革命观,“领导自觉”解决革命方法,即阶级领导问题,解决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是共产党员掌握阶级领导思想的先决条件。在“革命自觉”高潮中,提出了研究毛泽东思想,首先研究了毛泽东处理党内重大斗争问题——张国焘问题,又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思想及建党思想,联系自己的立场、革命观进行讨论。由于大家都是领导干部,自然在学习、讨论、反省中,结合“领导自觉”的问题。由于越讨论越接近自己的工作,接触现实的矛盾,困难多起来。这就讨论到怎样才能工作得好些,不那么忙碌而效果好些。在“领导自觉”高潮中,我在12月11日曾就应当怎样进行“领导自觉”的学习讲过一次话。我带头从历史上回顾了太行区的领导方法。我认为,可以1942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2年以前比较盲目,虽然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但无明确的自觉;主要缺点是不了解群众,不了解群众运动

和群众路线对建党、建军有何意义与价值；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准确，因而发生过错误，如1939年第一次党代会提出发动群众为中心一环，但到1940年春着重联合中间势力，放松了发动群众。当时革命的要求对财政征收、兵员补充都很迫切，但没有发动群众，又需满足革命需要，因而偏重于向群众要东西。在领导方法上，虽创造了些东西，但都未坚持下去。1942年，发动了群众，执行了党的政策（如精兵简政、土地政策等），一般干部都有了群众观念，这是我们根据地建设很重要的一年。领导上重要的是了解了群众路线，按毛主席的话说，工作由第二个方面转到了第一方面（即从向群众要转向给群众东西为主），所以一切任务都解决了。但此时群众观念还不够完整，还未提到领导原则上来。1943年抓到减租减息和救灾两点，十分重要，否则根据地不堪设想。1943年在全区全力进行救灾是抓对了，有些地区结合生产度荒也抓对了。这仍是1942年领导方法的继续。后来读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对第一个革命任务（减租减息）与第二个革命任务（组织起来）虽有体会，但还未提到领导方法原则上来。其后见了领导方法决定（即《毛泽东选集》上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因未经革命实践，大家都未搞通，这是过渡时期。直到1943年冬才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经过对敌斗争，安定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因而党在广大边沿区获得了群众，使我们对新的领导方法有所体会，特别是经过整风与生产，对领导方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如果说

在 1942 年我们还仅是从第二方面转到第一个方面(给群众东西),这时是提高到领导方法原则上来了。

在“领导自觉”高潮中,从区党委领导到地、县领导,从太行军区首长到旅、团、军分区首长,都认真进行回顾总结,讨论的问题集中到领导方法上。大家回顾过去的大斗争、大运动,各方面的依存、配合、矛盾,还有群众运动,对敌斗争的艰难、失误,征粮、抢收、抢种,特别是扩兵困难,扩来了又逃亡,动员归队困难,群众不太积极支持反而有不少谎报、掩盖的情形发生,干部苦恼,相互埋怨,上边责备,下边抵触等等。这样就引导到讨论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党委领导要抓重点,以及各方面领导又配合又独立自主的问题。下级要求上级民主,多帮助少批评;上级感到对下边不会说服,不会发扬民主,要求多而办法少。尤其集中到了关键在于搞好干群关系,在于把向群众要和给群众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把满足上边要求和满足群众要求统一起来。要真正站到群众里边启发群众自觉,从思想上发动起来,引导到行动上来。就是说,环境日益好转,发动群众的工作必须大大深入一步,才能迎接即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时刻,迎接下一步党中央可能给的新任务。这也必然接触到如何估价和帮助基层(村)干部上来。例如,在邢台县一个山庄,原来工作不错,县委书记也常去,有联系。但那里的村干部作风不民主,爱占小便宜,特别是在 1939 年冬和 1940 年春的反顽斗争中作风霸道,压制群众,命令主义,群众意见很大。夏初要保障人

权,清算非法,领导认为这个村长变了质,民愤大,因而把他枪毙了。以为这样做是满足了群众,公正,不袒护干部。可是出乎意外,这个村以至这一带群众一下子冷了下来,工作一直做不好。事隔两年,到1942年执行中央土地政策、大力发动群众时,连那个本来熟悉当地情况的县委书记去了,群众、村干部也对他“打哈哈”,工作近两个月也打不开局面。这位同志决心蹲下去,搞“三同”,串家走户拉家常。这样才感动了村里的群众和干部,他们很感慨地说了实话:“过去我们在一块,拼着干,斗恶霸,打红枪会,大家贴着心。可是在反顽后你们竟狠心枪毙了我们的村长。谁还敢靠你们?”这句有感情有哲理的责备,使我们了解到我们只看到干部脱离群众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联系群众的一面,只看一时一事,忽略了他们与群众是一块起家的,拥护过他们的群众敢告他的状,说明关系还是不错的。而我们却是片面理解群众反映,没有仔细调查,没有和这个干部谈心,没有教育他,只是片面、简单地“执行政策”,“为民除害”,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误。工作干了快5年了,却干出了一个“你们”和“我们”,竟成了两家人!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对于区党委和有关领导是一个鞭鞑。区党委常常讲要用这种表现本质、有关作风的事教育干部,警惕自己。以后从外地传来一种“反新贵”的经验,我们就“按兵不动”,不搞这个运动了。我们是仔细调查,区别对待,领导多担担子,多谅解说服,使当时的工作有所进步,没有再走弯路了。这事也在这一段叫

“领导自觉”的整风高潮中被传诵、讨论，对于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处理干群关系，改变作风，深入实际，起到了教育作用。这时重温党的有关文件就觉得有更深刻的体会了。“领导自觉”高潮，一直持续了近100天。

三个“自觉”高潮，是在第三期整风班中获得的成功经验，一连三次，长达9个多月。这种整风方法，从思想上、方法上把干部自觉和文件精神结合起来了，比较好地做到“有的放矢”。一个放手民主，一个发扬自觉，官兵相教，生动活泼。这个办法从区党委党校影响到温村整风班和索堡整风班，也影响到各地委自己领导的整风班。当然他们也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创造他们结合实际的经验，反过来影响到区党委的党校、机关的整风。各地委的整风班，每期较短，办的次数较多。这样全区大体上成了一个大整风班，把县、区级干部以及机关干部都整顿一遍，为尔后工作的进一步转变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新开端。

#### 四、太行区的审干工作

太行区的审干工作，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从举办第二期整风班时开始的，第三期仍把审干作为一个重点，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中央早在1943年4月3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在学完党风后，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



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的作用。中央还指出,全部完成审干工作应在整风学习结束以后进行。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应灵活应用延安经验,着重自己创造新的经验。因此,在太行分局领导的分局党校第一期整风班中,并未专门安排审干的内容。但是,延安各机关的审干运动却在普遍开展。特别是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康生借机在延安搞“抢救失足者”,掀起所谓的“抢救运动”。延安的做法对太行区不能不发生一些影响。8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针对已出现的逼、供、信的错误,提出此次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叫审干,不叫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为审干明确规定了政策,避免了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无法挽救的后果。只要人在,脑袋在,即使有偏差,也好纠正。这一条十分重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审干决定中,中央对9条方针作了详细解释,使我们易于掌握、操作。

第二期整风班的审干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酝酿阶段,坚持了整风不成功不发动审干的原则,

老老实实整风,在整风中开展自我批评与批评运动,一般地解除了半条心的思想束缚,使领导与群众思想一致起来,为审干准备了领导条件。第二阶段为正式发动阶段,继续运用感动方针,选择好的典型在大会上讲,大会与小组结合,取得了成绩。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以小组为主,普遍展开,采取民主通过手续。以后转入巩固清理,发生了前面讲到的逼、供、信及乱咬现象。区党委采取坚决措施,决定纠偏。后来,中央发出甄别指示,我们雷厉风行,把容易解决的偏差很快解决了。这一期的体会是,必须正确执行中央提出的审干方针,稍有不慎,就会走到错误方向去。在三个阶段中,我们同时掌握原则与思想领导,方法上偏重于感动,因而能使中央路线与群众逐步相结合,进展较为顺利。到后来放松了思想领导,忽视了感动,偏重于挤压,由正确走到错误,在方法上辨伪订正又做得不够,走了弯路。好在区党委发现后采取了坚决纠正的措施,才没有铸成大错。审查干部开始阶段实际上是反奸细斗争,必须在党内斗争与思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发动依靠群众进行。不能伤害有问题的人的情感,以便以后争取。审干是非常复杂与艰苦的工作,要把调查研究贯彻始终,严格辨别真伪。同时,要坚持在整风中进行。

到第三期整风班进行审干时,我们接受了第二期的经验教训,先集中整风,在第三个高潮的“领导自觉”阶段,才开始审干。由于这时延安的审干已走上正规,纠正了由于“抢救运动”带来的恶果,注重材料的研究,纠正了

扩大化,对我们的审干起了示范作用。太行区的审干工作总的看是成功的,对了解使用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和整风学习相比,审干中的缺点较多,有些是严重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左”的扩大化。虽然多数只是怀疑、质问、盘查不当一类的错误,一般也多是在整风高潮时“自觉”、“坦白”出来的,但是全区先后也“审”出了大约四五百人。虽然“左”的扩大化为时较短,区党委和各单位领导纠正的快,也及时、反复地当面、当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错误,赔礼道歉,但终究伤了被误审同志们的心,也留下了整人与被整同志间的一些隔阂和伤痕。有的人的问题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还是由别的组织、别的同志给解决的。这当然有当时环境的客观限制,但主要是领导上“左”的错误,特别是在审干工作方法中有错误。那时提出过要“知人论世”,更要“论世知人”,就是说要调查、研究,设想被审同志当时所处的地点、时间、环境上的不同,甚至同一事情可能有相反的现象。但是,人、事、社会现象是很复杂的。被隔、被围的根据地很难拿“论世”道理为例穷追尽问。在群众运动高潮时,往往有貌似沉痛的坦白、控诉,实际是在群众性舆论压力下编造出来的违心之谈,看来“很像”,却是“非实”。我们也曾经提过定点设防。例如要选一批历史清楚、一向可信的同志作“中流砥柱”,遇到问题涉及他们时,不要怀疑,倒应去怀疑是否有逼、供、信,有株连、乱攀现象,以此防止扩大化的错误。但如果仍未顶住。虽然提出过一时弄不清的先挂起来,但不能不在

一定时间里影响这些同志的任用、提升，不能人尽其才。总之，批判过逼、供、信的历史错误，却又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重复了逼、供、信，甚至在小组会上发生过打人逼供的事。虽然一经发现立刻制止了，但没有发现、没有立即制止的现象还是有的。个别人也有含冤去世的，有至今还未得到彻底平反的。审干中的错误是整风中的不正之风。好在不久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把错误的影响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因而取得整个整风后干部士气旺盛的结果，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以后的事实证明，太行根据地经过整风、审干，有了更大的发展，干部的团结更加增强了。

### 五、太行区党委召开的高干整风会

第三期整风班结束后，区党委召开了一次有地委书记、专员和相当地级的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的目的是重点解决区党委的整风问题。以整风精神学习党的路线，对区党委的工作和区党委领导提意见。这次高干整风会开了约半个月时间。这时，中央已经要我们准备让东北籍的干部全部回东北参加夺取东北的斗争。原来为了抗战这个同一目标，大家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太行山上，现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要撒向五湖四海去。我在会议开始时要求大家对区党委，对区党委的领导进行批评，把过去没说或未畅所欲言的话说出来。由于都是高级干部，又经过整风，有的同志又即将离开太行区，因此发言很踊跃，批评也很尖锐，无论在会上或个

别谈话，都是面对面毫不含糊地讲出来，都很诚心诚意。例如有人批评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我，不民主，听下面的话少，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过分强调纪律、团结，只责备下面对军队、地方之间有的关系没搞好，这是奴隶思想；有的同志说：“区党委负责人和党委系统来往多，和政权工作同志交谈少，我当专员8年，没有同我谈过一次话。”这些批评许多都是好的，区党委作了自我批评。当然，对有些事情提得不合适的，也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涉及到另一方的还要反复分清是非轻重、时机和方式，着重讲团结，讲谅解，讲照顾大局；对原则问题不能和稀泥。如一个干部说，区党委是奴隶思想，在区党委领导下我们都是奴隶思想。领导只听上面的。我听后当即说：“这话不对。守纪律不能说是奴性，下级服从上级不能说是奴隶思想。你说区党委民主不够或者不民主，这可以，但不能认为听上级的话不对。照你这样讲，我们应该反中央、反北方局，包括刘、邓在内，都应该反了。”我这样讲有我的道理，大家都支持我的意见。实际上，在太行区，我们和上级、和军队关系一直处的很好。和军队的关系，各根据地普遍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太行区处理的比较好。陈毅到太行后说：“你们太行山是幸福的，全国各地差不多都发生了跟军队闹的情况，你们没有。”我们始终按照毛主席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有问题检讨我们自己，不允许跟军队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比较自觉。从一开始创建根据地我们就讲，过去我们拥护红军、苏维

埃,拥护了多年,他们来了我们能不拥护?军队来了,帮助我们发展党,教我们打游击战,和我们一起创建根据地,没有军队不行。这些道理,我们一直讲了8年,因此太行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军地、军政矛盾,相处一直很好。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因为是整风,是提意见,就可以随便讲。在高干整风中,我们同每个同志都进行了个别交谈,交换了思想。后来大批干部南下,大家仍很怀念太行山上的友谊、同志式的友谊。正在开会时,七大召开的消息传来了,我们在5月2日以太行区党委高干会的名义发了贺电,刊登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

#### 六、太行区党委党校第四期整风班

太行区党委高干整风班在1945年5月上旬结束后,5月10日即举行第四期整风班开学动员,办起最后一期整风班。这一期集中了140名军队、地方干部,其中军队干部56人,包括李德生(31团团长)、钱信忠(八路军前方总部卫生部部长)、吴世宏(28团团长)、杨绍曾(4分区副政委)、穰明德(2分区政治部主任)、刘昭(1分区政治部主任)、马芳廷(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胡立新(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余积德(5分区保卫科长)等;地方干部84人,包括皇甫琳(二专区各救联主席)、张维翰(四专署专员)、马兴元(昔阳县委组织部长)、王炎(临城县委宣传部长)、徐林汉(一专署副专员)、白涛(辉县县委书记)等。本期适遇党的七大召开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两件大事,一直延续到1946年3月15日结束。我因工作忙,没有像

第三期时始终蹲在整风班,主要靠区党委党校和民主选举出来的支部具体领导。我主要靠听取汇报和去作报告来参加领导。党校主要靠刘建勋(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贾久民(校党委副书记,刘建勋调走后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武振声(校党委常委、组织科长)等,民主选出的支部由张维翰(任书记)、杨绍曾(任支委)、穰明德(任支委)、皇甫琳(任支委)等组成。

第四期整风班开学时,正值党的七大召开之际,每期的《新华日报》太行版登载大量的报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报告及时传到整风班,对大家鼓舞很大。区党委在领导这一期整风班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整风的灵魂。整风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克服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是整风的一个根本问题。过去整风中常常有些同志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当成无产阶级观点,以经验主义反教条主义,以“左”反右,以盲目性反独立性,以极端民主反家长作风,以平均主义反首长特殊,以清高正派反贪污腐化。实际上,许多同志并不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因此,在整风中我们十分注意引导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检查领导,检查自己。学习七大文件,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一期,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更加有意识地引导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因此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会较好,对小资产阶级

观点批判较深刻。

到7月份,参加七大的同志陆续回到太行区。他们在七大前早已去了延安,整风是在延安进行的。曾任五地委书记的王维纲(七大代表)回来后,在区党委机关和党校传达了七大精神,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情况。后来张鼎丞(原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延安整风期间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路过太行时,给区党委机关和党校作了关于七大会议和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区党委汲取延安整风的方法,决定在整风班开展民主运动,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检查领导是搞好整风的关键。为了动员群众给区党委提意见,给领导人提意见,10月4日我在党校作了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动员报告,提出“开窗户、通空气”,用“大放大收”的办法,放手发动干部对领导展开批评。我在动员中提出,领导人思想原则的错误,会影响到每个人,从检查领导会更好帮助检查自己,所以检查领导是必须的,这是整风最主要的一环。在整风班中,有权利批评一切领导者,这不是“非组织意识”。要放开思想,敢于批评。我举了一些事例说明群众的错误与领导的关系。如大家普遍检查到的享乐主义,过去许多反省中的材料,有很多是正当的要求,有的本不是自己的错误。就贪污问题来说,有些人不过是私自留了一些东西,怕病、怕残废、怕退伍。当然,小贪污也不对,但是如果生活有保证,又何苦去贪污些小东西呢?贪污带群众性,就与领导有关。群众团体生活苦,是领导上未给予解决。因此,要从领导上找原因。再如对



待恋爱婚姻问题,我们只要求大家严肃对待,用苦行僧办法,不从积极方面想办法,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一般的婚姻不批准,领导上应该检查。对闹荣誉地位的问题,有许多人感到不提拔不满意。应该说,个人伸手要荣誉、地位不对,但是领导上提拔干部是否合乎干部政策?是否使群众心服口服?造成一些干部不称职,应当从领导上来检查。还有领导上用集中来压制别人民主,强调服从上级,用集中反对批评,上边不民主压制了下级民主。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把大家的发言权抹杀,使大家不能讲,不愿讲。领导上强调要求下级自我批评,但领导上却缺乏自我批评,好像怕自我批评有损领导者的面子等等。动员之后,整风班放手开门“大放大收”。区党委党校的“收”,不是收场,“放”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更加放手发动干部,开展批评,更充分地走群众路线。连同开始学习文件和党规党法,打破顾虑,前后有近9个月时间,其中5个月就搞“大放大收”,放了两个月,干部扬眉吐气,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由干部(群众)自己参与领导,小会大会天天发言。以至到了要否定一切的时候,才由群众自己起来纠正,来了个大转弯,转到了“收”——转到了展开由群众讨论、争辩、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逐渐集中起来。这个过程,要有充分时间,这也是一种取得好效果的方法。指导要有耐心,要细心,不失时机小引小导,“放”中有“放”,不能着急,不能匆忙转弯。有许多意见,提的有理,即使言辞重一些,尖锐一些,但区党委领导都可接受,都作了自

我批评。一些过头、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批驳，让群众自己讨论，自己鉴别，最终引导到正确方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放”到接近极点时，有一个“勇敢分子”起来煽动说，区党委都干了什么呢？敌人自行退回去了，却大吹我们如何粉碎了“扫荡”，如何获得了大胜利；打游击、捉特务，杀了多少无辜人？区党委的包袱里，究竟包了多少人的血和泪？大概这一位是错估了形势，低估了太行山的干部，他以为这样人们就会起来“造反”。然而恰恰相反，群众说：“怎么能这么说？这哪儿是党的整风！”批判这一类错误思想的风气眼看要展开，有急转直下之势。这时领导上又犯了个小小的错误，忘记了总是中间分子占多数，需要逐渐地收，让它瓜熟蒂落。群众说，不是民主吗？人家刚讲了，想批判了，正在放就要收，不对的话我们自己会分辨，会批判，急急忙忙怕什么呢？校领导立即总结经验，分析了形势，于是把脚步放慢了。结果又“放”了两个月。这时的形势是理越讲越清，站起来批判错误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说错话、无限上纲的人在群众性的批判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使整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终于把要学的文件，要弄懂的道理，要总结的经验，逐渐大体解决了。抗战胜利后，发动保卫胜利果实的上党战役，参加党校整风的李德生等军队干部去参战，提前离开了党校。

12月12日，在两个月民主运动后，我到党校总结了前一段的“大放大收”，指出民主运动是太行党历史上空

前的民主,大家敞开思想,发表了心中的积愤与不平,批评了领导与许多同志的思想,实行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官僚主义大吃一惊,民主检查改进了领导。但也带来盲目地反领导。为此,提出今后运动主要是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提出讨论的重点放在以下一些问题上:照顾干部与干部服从组织,服从人民与党的利益问题,民主集中制与自我批评,山头问题,盲目性与自由思想等。此后的重点即在群众检查自己,起到了提高认识,清理错误思想,较全面的认识自己的作用。在第四期整风班结束时,结合审干,根据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及4条干部标准,进行鉴定,圆满结束了第四期整风班的学习。至此,太行区的整风运动全部结束。

## 区党委领导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

太行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春开始到1946年春结束,前后长达4年时间。在这4年中,我以区党委书记的身份,同区党委其他委员一起,领导了太行区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自己也参加进去进行了整风。在整风运动中,我既是领导者,又是参加者,既领导别人,也主动把自己放进去整自己,确确实实地经过了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收获较大、进步较快的时期之一,也是我的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时期。回顾领导和参加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许多经

验教训至今仍不能忘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领导整风中,必须吃透中央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从发动普遍整风,规定整风学习的内容,提出整顿三风的要求,到总结历史经验,开展审干,党中央、毛泽东都有明确、具体的指示。例如,整风一开始,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就规定了整风的任务,提出了整风的内容。普遍整风开始后,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和整风学习的方法,以后又规定了整风学习的总结办法,指导各地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规定了整风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规定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在作结论时采取宽大的方针、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既不含糊敷衍,不丧失原则,又不损害同志,给同志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在审干中提出9条原则,特别是“一个不杀”这一条,避免了重犯历史上的扩大化的错误,给实事求是地审查干部和纠正审干中的错误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我们在领导整风中,在每个阶段、每个步骤上,都要认真钻研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一步一步地引导整风运动顺利进行。

二、在领导整风中,党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挂帅,深入

了解整风实际,从整风的实际出发确定领导方法。中央规定,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负责,运用中央规定的文件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与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开始时,由于太行区战争频繁,困难严重,区党委的主要精力并没有完全放在领导整风上,致使全区的整风运动未能按中央的要求及时开展起来。温村高干会上彭德怀、邓小平批评后,区党委把整风作为中心工作进行部署。由于作为第一把手的我仍未能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整风运动,全区的整风仍开展得不太好。太行分局撤销后,区党委独立领导全区的整风运动。担子压在肩上了,再加上根据地形势好转,从1943年10月起,区党委全力抓整风。特别是在第三期整风班时,由于区党委的三名主要领导都各自坐镇一个整风班直接领导,因此第三期整风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带动和推动了全区的整风。区党委领导深入整风第一线,实际了解情况,根据运动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历史自觉、革命自觉、领导自觉三个阶段,改进了领导方法,使全区的整风走向深入。不亲自参加到整风中,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不能抓住整风运动中的症结,更不能提出切合太行实际的整风方法。

三、整风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因此要高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整风中,区党委面对的领导干部当时处在被领导的位置上,成为整风中的群众。他们和一般意义上的群众一样,需要组织,需要发动,需要做工作,需要打

通思想,发动起来后需要正确引导。区党委经过第三期整风班的实践,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体会。在领导第三期整风班时,我到党校作了5次报告,15次“晚报”,都是为了发动群众联系实际,使群众自觉地参加到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一般都存在先进、中间、落后三种情况。我们注意对三种人进行详细分析,同时注意三种人之间的相互变化、转化,尽量扩大先进面,用先进带动中间,教育落后。到第三期时,能够比较好地运用运动规律。到第四期“大放大收”时体会更深。当群众起来激烈地批评区党委时,我们采取鼓励的态度,让大家把话讲完,气出够。出现了反领导的严重倾向时,不忙于制止,让群众去识别,相信群众的辨别能力,让群众自己去讨论。结果,大部分群众、尤其是占多数的中间群众在讨论中分清了是非,使错误意见暴露在广大群众面前。这时,区党委再引导对这些错误意见分析、批判,使群众从中受到教育,把整风引向深入。作为领导,最忌讳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总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对群众不放心,包办代替。这样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并不能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也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四、在领导整风中,遇到问题,出了偏差时,第一把手敢于负责,表明态度,站出来坚决纠正出现的偏差。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总体上偏差不大,但由于受康生“抢救运动”的影响,在第二期快结束时和第三期开始阶段,曾出现过偏差,表现为乱怀疑、逼、供、信,甚至出现打人的现

象。在发现后,我立即召集区党委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我在会上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关于审查干部决定中提出的9条原则,特别是决定中关于批判逼、供、信问题的指示和规定,我们下决心立即公开制止小组会上逼、供、信及打人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关于立即停止在党内反特务的指示下达后,我们坚决执行。军区司令部执行的更快,李达宣布全部平反,纠正了偏差。做这样果断的大胆的决定需要有勇气,敢担责任。区党委在做出决定时,首先依据的是中央的政策,其次是发生在整风班的事实,区党委一班人按党性原则办事,共同做出决定。

五、在领导整风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提高领导艺术。区党委在以党校为主领导全区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及时总结,每期都有各自特点。1942年办整风实验班时,没有一点经验。我去作动员时,依据的只有中央发的有关整风学习的文件,主要是组织学习,并没有触动思想。到举办太行分局党校整风班(即第一期)时,由于温村高干会上对整风进行了讨论,明确划分了综合文件学习、学风学习、党风学习、个人系统反省4个阶段,整风学习开始触及思想,联系个人实际和本地实际,展开讨论。学习文件时,开始只在名词上打圈子,反倒把文件精神弄糊涂了,在概念上争执。邓小平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学习方法。他在党校报告中联系太行、冀南的实际进行引导,强调把文件学好,在精读中反省,然后全面有系统地反省自己,每人给自己做一个历史小传,展开自我批

评和相互批评,毫无顾忌地赤裸裸地“脱裤子”,使整风触及到思想和工作实际。但这一期发动群众不够,没有形成热潮。第二期整风班时,区党委明确提出要能主动、能钻、有斗争精神、要客观这几条方法,强调进行自我思想斗争,帮助积极分子首先打通思想,然后推动他们帮助中间与落后者。在这一期提出整风,是群众的思想运动,要采取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法促进自我批评。从这期开始,整风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第三期整风班的特色更明显,三个“自觉”高潮,把领导和群众都调动起来,一个接一个,从个人到领导,从思想到立场,从工作到路线,从整风到审干,环环紧扣,步步深入。我们总结,思想指导是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一环,收放运动是自我批评与批评运动,放要放得开,收要收得紧,掌握好整风发动、引导群众运动的规律。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真正体现在群众性的调查上,才能使领导者不脱离实际,掌握好火候。到第四期时,采取“大放大收”的方法,完全相信群众会自我教育。作为领导者,必须根据发展了的实际不断总结,提出适合变化了的的情况的方法,才能把整风引向深入,真正解决问题。



## 十八、开展生产度荒与大生产运动

以山区为主的太行区，历来十年九旱，自然灾害不断。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靠天吃饭”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环境特征。共产党、八路军进入太行区后，经过推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但并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自然条件。农业收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靠自然条件。抗战前期(1940年前)，太行区的自然条件基本正常，对以农为主的根据地没有造成大灾难。加上初期社会积蓄还较多，军需民食并不显得特别困难。

1940年战争在根据地内频繁进行，敌人对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人为地破坏了太行区的经济，社会积蓄已大部用尽，因此，到1941年时，根据地的经济已感困难。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物价高涨，粮食开始紧张。这年春天，两个月内物价涨了1/3，根据地内流通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冀钞(冀太联办发行)开始贬值。冀太联办和9月成立的边区政府为扭转财经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1941年的军需民食基本得到了保障。

1941年秋、冬季，太行区雨雪稀少，降水量低于正常

年份,导致 1942 年春旱,许多耕地下种困难,麦收无几。直到 7 月上旬才开始下雨,麦收仅三四成,秋庄稼长不高。到秋收季节时又遭阴雨,谷子倒伏,秋收仅二成左右。农民在山中种植的柿子、核桃、花椒、棕子(木本油料)收成大减,豫北、冀西灾情日益严重。1942 年太行区粮食、山货大幅度减产,军需民食发生困难,全区灾民最多时达到 36 万人。秋后,旱灾继续蔓延,1943 年春旱更加严重,从冀西、豫北发展到晋东南,直到 8 月才下了透雨。长时间的干旱造成河流断源,水井干涸,土地龟裂,禾苗枯死。这一年夏收无几。夏秋季晋东南遭受雹灾,秋季阴雨发生洪灾,更加重了灾情,仅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区左权、偏城、涉县、黎城、潞城、平顺等县,灾民就超过 35 万。另一项灾害是蝗灾。从 1943 年 6 月开始,豫北、冀西发生蝗灾,仅有的庄稼大片被吃光。1942 年 5 月和 1943 年 5 月敌人对根据地两次大“扫荡”的进攻破坏加剧了根据地的灾情。到 1943 年冬,太行区灾民占到全区人口一半以上,因灾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灾害带来的疾病到处蔓延。1944 年春蝗虫大量繁殖,到 5 月开始形成大蝗灾从豫北、冀西蔓延到晋东南,飞蝗遮天蔽日,田地庄稼一扫而光,全区 23 个县、879 个村遭受蝗虫危害,有 27 万亩地庄稼被吃光,29 万亩地庄稼受到损害。面对旱、雹、水、蝗等自然灾害,太行区党组织、各级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领导全区军民展开了长达 2 年半的抗灾救灾,发动全区人民开展生产度荒运动,并在全区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终于战

胜了灾荒,根据地逐步出现了丰衣足食的局面,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紧接着开展的保卫胜利果实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

太行区战胜灾害的斗争,分两个阶段,同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起进行。

第一阶段是1942年春发生旱灾后,从6月开始的抗灾救灾、救济灾民的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到1943年6月。

1942年旱情出现时,太行区正遭到敌人连续“扫荡”,特别是5月大“扫荡”。全区军民全力反“扫荡”,没有来得及开展救灾工作。反“扫荡”胜利后,6月2日,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出紧急训令,号召所属部队立即帮助驻地群众挑水抢种。边区政府展开灾情调查。7月中旬太行北部下了大雨,华北《新华日报》立即发表《抢种、锄苗、防旱》社论,全区抓紧时机乘墒抢种,引水、担水浇苗,救活了一批禾苗,在空闲地上补种了一批杂粮、蔬菜。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伍胜到灾情严重的五、六专区视察后,立即召开会议,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9月1日太行分局成立后,把抗灾救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要求灾区各级党政军群团都要把抗灾救灾看作和对敌斗争一样重要的中心工作抓紧抓好。10月9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组织运输救济灾民的命令》,命令在五、六专区发动群众组织合作社运输粮食,以解决群众吃粮问题。10月10日,边区政府成立了以杨秀峰为主任委员的“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并要求各专区也成立

相应委员会，领导救灾工作。同日，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联名颁发抗灾救灾布告，号召全区“各界同胞发扬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精神，共度难关”。紧接着又公布了救济灾荒办法，拨10万元冀钞用于五、六专区的救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抗灾救灾斗争。这一期的抗救灾斗争，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安定人心，调查灾情，减免灾区负担。1943年秋，边区政府一次给五、六专区减免公粮675万斤，1943年夏又减免公粮232万斤，并颁布了减免地租办法，使灾区民众得以维持生存，并提高了对抗日政府的信赖。这项措施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由于在宣传上、政策上过分强调了政府救灾决心和政府出台办法，使一些灾民过分依赖政府和上级救济，主动抗灾救灾不够。

二是掌握粮食，开展对敌斗争，实行粮食调剂。救济灾荒最主要的是解决粮食问题。灾情发生后，在1942年度，太行区缺粮2250万斤。为解决这一问题，太行区确定开展对敌粮食斗争为掌握粮食救济灾荒的第一个步骤。太行区历史上就有“东人吃西米”之说，粮食价格东贵西贱。在对敌粮食斗争中，从西线购回3150万斤粮食。购粮运粮是一场严重的对敌斗争和复杂的组织工作。沿途二三百里路，政府组织，军队护送，人民支援，冲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胜利完成了任务。

三是安置灾民，组织移垦。灾情发生后，在重灾区出现大批灾民，急需安置救济。安置灾民的原则是尽可能坚

持灾民不移动,以便在原地生产。但对在本地无法生存者,由抗日民主政府有计划组织,负责选定安排村庄,沿途设招待站。向外安置的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这种安置是临时性的,大多灾民后来又回到本地。在临时安置灾民中,根据地腹心区人民发扬互助风格,如和顺松烟、左权寺坪一带,安置灾民数多达当地居民的1/3。组织灾民移垦是救灾中的一项长期迁徙措施,带有调剂人口性质,返回的很少。为了移垦,边区政府颁布移垦办法,拨出225万斤粮食帮助移垦。在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帮助下,从五、六专区移到二、三专区的3500多人,从一专区移到二、三专区和山东1500多人。现在,许多豫北、冀西移往山西、山东的灾民后代现在仍在当地生活。

四是组织生产,实行以工代赈。抗灾救灾和生产相结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其办法是政府拿出一部分贷款和粮食,资助组织灾民生产,通过发放报酬的办法,救济度荒。主要的以工代赈项目有运输、兴修水利、纺花织布等。在1942年度救灾中,灾民通过运输得粮525万斤,通过兴修水利得20万斤粮和235万元冀钞,通过纺织得50万斤粮食。另外拨出81万斤粮食310万元冀钞支持救灾。以工代赈还改善了灾区的生产条件,如修建了长22里的黎城漳北大渠、26里的涉县漳南大渠,开垦1万余亩滩地等。在组织以工代赈中发展了许多合作社,到1943年时太行区的各种合作社有416个,其中297个在灾区,占70%。合作社基金一部分是社员入股,一部分是

村公产资助，一部分是政策贷款。

五是厉行节约，推广募捐，广泛开展社会互济运动。太行军民历来注重节约，过着较为艰苦的生活。灾荒发生后，全区脱产的党政军民群及学校发动每日节约一口粮支援灾民的运动，部队每人每天节约 2 两米，地方每人每天节约 4 两米（当时为 16 两 1 斤秤），1942 年度太行区共节约 126.7 万斤小米，全部救济灾民。同时，还在全区发起募捐，不仅在非灾区，而且在灾区有积蓄的也参加募捐。社会互济主要在灾区灾民之间进行，是有代价的借粮借款，含有周济、调剂两种作用。

抗灾救灾不只限于根据地。在游击区、敌占区的受灾地区，我们也开展了救灾工作，吸收、安置敌占区灾民达 2 万多人。这一工作对争取敌占区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太行区的抗灾救灾工作在 1942 年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巩固了根据地，安定了民心，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学会了如何把救灾和生产结合起来，为 1943 年度的救灾提供了经验。

太行区抗灾救灾的第二阶段是 1943 年 7 月灾荒继续蔓延，太行分局在 6 月召开研究太行区经济建设会议，提出在救灾工作中把生产作为中心环节，提出开展生产度荒后，一直到 1944 年 9 月扑灭蝗虫为止。

1943 年是太行区在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同其他大多数根据地有所不同。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一是敌人继续集中兵力在太行区“扫荡”，特别是发动了

1942年5月和1943年5月的两次大“扫荡”；二是投敌当了伪军的原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从太行南部向北进犯，与日军形成南北夹攻太行根据地的局势；三是严重自然灾害继续侵袭根据地，先是旱荒，后是水雹灾，又发生了蝗灾，灾害越来越严重。因此，1943年度除对敌斗争任务仍十分繁重外，救灾工作仍是一项中心工作。

1943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引起太行分局的高度重视。在年初的温村会议上，提出救灾是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春旱夏荒发生后，太行分局于6月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6月21日，会议通过了《太行分局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在谈到救灾工作时，肯定太行区“成绩也是很显著的，在粮食调剂方面，供给了灾区最低限度的粮食，除个别县（磁武、涉县）以外，调剂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广大灾民能以比较平稳的价格购到粮食，组织灾民运输，纺织棉花及修渠等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同时指出，“根据地的物力财力，经过六年的抗战，已经很大的削弱，社会积蓄在灾区可以说已经消耗殆尽了。在其它区域，存粮也已经非常贫乏”，“灾情严重”。决定中强调，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应把生产当做一切工作中心环节”。会后，邓小平于7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指出太行区目前正处在“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救灾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

这时,太行的灾情已扩大到太行全区,灾荒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在给北方局和中央关于太行救灾报告中谈到 1943 年春夏季节的问题时说:“当青黄不接,旱的最严重的时候,发生好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认为天旱,蝗灾,是‘天定劫数’,绝望地去‘祈雨求神’;有的认为‘有再一,不能再二,政府不能再管咱了’;有的认为与其将来饿死,不如现在尽其所有,大吃大喝,饱餐一顿;有的大量拍卖衣服、农具、家中杂物;有的出卖牛、羊,宰杀牲畜;有的指地(土地管理的一种形式)或出卖青苗换粮吃,小偷盗窃之案件,普遍发生。偷盗抢劫公粮,偷盗青苗,生吃玉米南瓜山药蛋的事,也不断发生。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大变了,各顾各的生命,离婚事件大为增加,双方都是被迫‘自愿’的。有拿儿换米吃,有妇女沿村找寻出嫁对象以图一食者。粮价飞涨,工匠艺人大批失业,小手工业开张困难,乞丐讨吃流亡者随处可见。灾民体力已到疲惫不堪程度,又由于吃野菜过多,瘟疫到处流行,加以敌伪和特务破坏分子会道门等趁机挑拨煽动,猖狂活动,干部则表示厌倦,失望情绪浓厚,眼看‘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流之四方’,‘父母妻子离散’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又要摆在我们面前了。”

这种严重的困难和社会状况,对太行区的党、政府、军队是一场极其严重的考验。紧急救灾,成为和对敌斗争同等重要的大事、要事、急事。分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后,我和区党委其他同志又深入灾区进行了调查,并同当地



党委、政府一起研究了救灾问题。回到赤岸区党委所在地后,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研究救灾形势,于7月20日以晋冀豫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救灾防荒的紧急号召》,号召太行区“全体党员与全区人民起来,像反对敌伪和反对内战挑拨者一样来向灾荒作斗争,必须足够地认识不克服灾荒就无法坚持抗战夺取胜利”,“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起积极的模范作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说服群众,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开展有效的自救运动,顽强地战胜灾荒,度过难关,准备反攻。”在这次会上,区党委强调在今后的救灾中要纠正过去主要靠政府救灾的倾向,重点放在发动灾民开展“自救运动”,开展“生产救灾”上。7月24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克服连续灾荒的号召,强调自救和生产救灾。7月31日,北方局发出《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主要依靠党的支部在群众里面起核心作用,提高群众的积极性,打破群众中已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打破依赖政府、军队心理;要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只有替民众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可能帮助每个人来生产。大家要活下去,必须依靠自己动手才能自救。”“所有共产党员,在这严重的困难关头,必须起生产救灾积极的模范作用。”

1943年度的救灾工作由于吸取了1942年度的经验教训,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力有效,将救灾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将救灾和生产统一起来,将救灾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将救灾和根据地建设统筹安排,取得了救

灾、生产、教育、对敌斗争、建设等多项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和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因灾害引发的社会问题，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1943年救荒工作和整风运动结合进行，重视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用抗战以来，特别是1942年度救灾的事例，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合作，努力生产，党和政府完全可以领导、帮助大家克服困难。我们提出“打破迷信，人定胜天”的口号，鼓励广大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9月召开边区临参会太行会议时，整个会议以发动群众开展生产度荒运动为中心议题，通过参议员广泛做群众工作，形成全区上下一条心开展生产救灾的高潮。同时边区政府向太行区发放1900万元冀钞贷款，以扶持生产救灾。边区政府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安定社会秩序、扶植群众生产的法令，使太行根据地在重灾中社会安定，群众生产救灾的积极性高涨。

其次是动员组织群众力量对灾害作斗争。1943年度的灾害主要是旱灾和蝗灾。同旱灾作斗争的关键是解决水的问题。为此，发动灾区群众一边采用“人海战术”，组织军民担水抢种、浇苗；同时组织军民大搞水利建设，继续采用以工代赈办法，增加水浇地。这两项措施，大大缓解了灾情，显示出群众救灾的威力。群众性抗灾救灾规模最大的是对蝗灾作斗争。蝗灾的特点是来势凶猛，规模大。最大的蝗虫群飞来时有几十方里一大片，一落地几百

亩上千亩庄稼被吃光。1943年蝗灾初起时，我们发动群众采用扑打办法，组织成百上千人捕打、火烧、毒杀蝗虫。1944年春发动群众挖蝗虫卵，政府用小米换卵奖励挖卵（先后拨出15万斤小米），抑制了蝗虫再生。但到5月后蝗灾再起，我们组织剿蝗指挥部，打破村、区、县界限，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接连开展剿蝗运动。每次飞蝗到后，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剿蝗队伍，在剿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自带干粮工具，奔赴打蝗战场。在连续几个月的剿蝗大战中，太行区群众出工756万多个，军队出工7万多个，取得了扑灭蝗灾的大胜利。1944年9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剿蝗经验》一文，盛赞太行群众性的剿蝗运动，指出：“太行的剿蝗运动，不但对于太行来说是救灾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全国来说也是一件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太行剿蝗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人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可能无敌于天下。”“把人民组织起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在今天的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讲到解放区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斗争时，举了太行剿蝗的例子。

第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把救灾和大生产运动联系起来组织发动。在1942年度的救灾中，太行区已开始组织发动全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兴修水利、开滩修地、组织运输、开展纺织运动。太行

区最早的各种生产合作社就是在这时办起来的。这时，太行区的八路军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开始搞生产运动，地方的党政民学在严重灾情面前，都自己动手，开垦小片荒地，种菜种粮，以补不足。在1943年6月1日，我在《战斗》第48期上发表《为什么开展生产运动是贯串全年各方面的中心环节》，提出“生产运动是支持战争最基本的环节，是战争实际提出的要求；同时是继续改造社会经济和深入群众运动的中心一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群众运动的必然发展”。要求各级党委“紧紧掌握生产运动这个中心一环，才能推动整个运动、整个社会、整个工作的深刻发展。”在生产救灾中，生产运动一直是我們抓的重点。为了领导生产运动，区党委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制定了奖惩劳动生产办法，给各级机关提出生产任务要求，对个人业余生产也作出规定。1943年度太行区的党政军民学把帮助群众生产和自身生产结合起来，大大推进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活动》的指示，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指示下达时，太行区的生产救灾已经形成规模，党、政府和军队及群众团体、学校都已在组织各自的生产，全区围绕救灾开展的生产运动收到显著的效果。为了贯彻中央指示，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4年1月，区党委主持召开了县

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把大生产运动、防荒救灾作为同整风一样重要的中心工作。这时,太行区对敌斗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敌人已无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而我军已有能力主动向敌人展开进攻,根据地已趋向稳定,大生产运动和抗灾救灾能够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进行。

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开展起来的。1944年到1945年,全区的大生产运动通过生产救灾、组织起来、生产与战斗相结合、党政军民学脱产人员组织生产等途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贯彻实施八路军前方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制定并颁布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主要内容有“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得到一定比例的收益,生产得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私人积蓄”。该方案实施后,进一步调动了部队、机关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1944年,太行区政民机关种地1.03万亩,生产细粮21万斤、蔬菜150万斤,每人平均可有2个月的自给粮食,蔬菜全年自给。太行部队中的个人积蓄达到167.3万元(冀钞)。这些成就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机关生活,密切了军民、政民关系。在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中,我们于1944年11月21日到12月7日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了太行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召开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大会,统称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同时举办了生产展

览和战绩展览。这次大会和展览展示了太行根据地建设的成果,特别展示了救灾和大生产运动的成果。1944年,太行区获得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收获粮食达12.03亿斤,开荒33万亩,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亩。在贯彻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中,互助组发展到2.3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劳力达到21.9万个,占总劳力的20%。组织起各种合作社1100多个,入社社员达25万人,资金达3.4千万元(冀钞)。副业、民用公私工业、军工业等都有很大发展,大多数日用品本区都可以生产,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并支援了其他根据地。同时,也为大反攻准备了充足的物资。12月5日在招待劳动英雄的会上,我代表区党委和军区发表了讲话,重点总结了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度荒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我在讲话中指出:“两年来,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农民群众方面,实行了‘个体经济下的集体劳动’的方法,证明了组织起来,由穷变富的真理。在部队方面,实行了‘集中领导下的共同劳动’和二八分红的‘滕杨方案’,达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标。”我总结了“组织起来”的三条不同途径:一是经过生产自救和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道路;二是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中按毛主席提出的办法组织起来;三是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发展互助合作。我在讲话中特别介绍了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指出:“李顺达同志既领导民兵,又组织互助,许多民兵都是既生产且战斗的双全人才。他

们的互助组就成了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无事生产，有事战斗，转移生产又转移战斗的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组织。”李顺达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坚持团结带领平顺县西沟人民走依靠集体力量共同富裕的道路，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 十九、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在最困难的 1943 年，由于前半年忙于对敌斗争，应付敌人大规模的“扫荡”，下半年开展生产救灾，没有把 1942 年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继续下来。10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下达后，区党委开会讨论，提出根据中央指示的“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的精神，在全区开展一次普遍的检查减租减息政策实行情况的工作。这项工作，同调查全区社会经济状况一起布置，并责成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李友九负责。10 月 13 日、10 月 27 日，区党委两次通过太行《新华日报》社论的方式，发出检查减租减息工作的意见，强调：“不把减租进行彻底，不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减租，想推动明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减租，才好帮助贫农、佃农实行安家计划，实现中央土地政策扶助农民的原则。”在 1943 年秋冬，由于救灾任务很重，太行区未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但调查社会经济状况和检查减租减息政策执行情况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李友九从各地、县选择了若干典型村，进行访问，查资料，查账，收集



了大批材料。新调查的材料,加上1940年春耕运动发动后对农村问题的调查,1941年研究农民负担问题、制定实行统一累进税的调查,1942年精兵简政开始后对民力的计算及全区收支负担的调查、救灾情况调查等材料,对农村的状况基本上搞清了。到1944年初,调查室把掌握的材料分类整理。我对这些调查材料很感兴趣,我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这对加强全区工作的指导很有帮助。

1944年1月,邓小平为答复延安来电所询问的有关根据地的若干问题,要我供给若干材料。这时他已搬到左权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院内,主持总部和北方局的工作,同时主持129师师部的工作。邓小平在麻田镇办公室对我说,彭德怀、刘伯承从延安来电,中央正在研究党的历史,要我们的材料。他说,太行的材料由我收集送,太岳的材料由安子文、薄一波送。他并把他写的《对几个问题的意见》给我看。共写了10个问题,第一个是对根据地发展阶段、巩固阶段的评价。在这部分中,邓小平评价减租减息时指出:“我们忽视了减租减息的工作。”第二个是统一战线状况,第三个是党的建设问题,第四个是政府工作,第五个是群众工作,第六个是人民武装,第七个是对敌经济斗争,第八个是整风审干,第九个是一元化领导,第十个是今后方针。最后邓小平还写了一笔“雪峰处材料,事后即送上”。我表示,回去后立即把现有的材料先送延安,同时抓紧整理其他材料。

回赤岸区党委后,我让李友九把他和刘毅已经整理的太行党史和国民党、敌伪及农民思想的材料立即送给邓小平。这些材料包括邢台党史简编、武乡党的发展、磁县党历史调查、武乡农民思想意识调查、豫北国民党、敌伪情况等。我让李友九着手整理编写《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写《太行区 1944 年国民经济调查初步研究》。

1944 年春,太行区蝗虫再起,打蝗工作非常紧急。由于对敌斗争形势已有利于我,局部反攻从 2 月开始拉开序幕。整风运动正处在关键阶段,需要加强领导。这三项大事,使减租减息在 1943 年冬、1944 年春未能继续进行。7 月 6 日,中央发布《关于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第 15 条口号为:“坚持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没有减租的彻底减租,发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驱逐日寇而奋斗!”看到中央的意见,我们感到在减租减息问题上已拉下了差距,必须很快部署赶上。

8 月初,邓小平再次把我叫到麻田,让我看 7 月 28 日毛泽东主席发给他和其他中央局负责人的电报,要各地很快答复 10 项重大问题。这时,正是太行山中难得的下雨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因雨阻隔,邓小平很着急。因为中央急要 10 项重大问题的答复,是为了在秋季到来时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工作作出“恰当指示”。邓小平要我把太行的情况收集起来,他想先就太行情况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这时,李友九编的《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一集)已编出,我正在写序言,材料很多。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包括“三三制”、减租减息、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民兵工作、沦陷区接敌区工作、城工工作、人民负担、大生产运动、民众团体工作等10项。我立即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让大家提供10个方面的材料,同时讨论全区的工作。我强调今年秋后必须把减租减息工作抓起来,认真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会后,我把收集到的材料送给邓小平,他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于8月24日给毛泽东写了答复,用电报上报。答复所用材料全部为太行材料,全文如下:

毛主席:

关于所询十项问题,因雨交通阻隔,未能及时搜集材料。先就太行情形,答复如次。

(一)减租、减息、简政和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现有政权中,党外人士太少了。在反奸中,有些参议员坦白了,在些被罢免,还自杀了两个(邢台、偏城)。邢台李参议员,自杀时,留下一个遗嘱,里边说:“国民党放毒,共产党整风,国民党完了。”一般党外中间人士认为:反特务,就是反国民党。有些认为:减租是慢性共产。认为:三三制,是利用党外人士,非党人士似是傀儡,实际还是一党专政。这与各地对参议员问题的不慎重,不严肃,与对非党干部不够尊重,宗派主义作风有关。可

是，他们一般认为：上级比下级好。经过时事教育和整风，他们看到我们提倡自由思想与自我批评，加上中原战役及最近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舆论的空气之下，比前好转，较进步的，想入党。这一现象，还不是个别的（有的是投机思想）。生产运动以来，开劳动英雄会，不开士绅会，有些人说：“咱们吃不开了”。但阶级关系，在生产运动中，是比较稳定。太行对此问题，区党委拟定的调整办法是：

（子）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

（丑）对政权中党外人士整风的方法，加以改善。加多时事教育，不要勉强，纠正生硬方式。

（寅）准备今冬改选参议员，召开参议会。届时，准备多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中间人士参加工作，宁肯工作人员多几个。

（卯）党内整风，克服宗派主义，讨论统一领导和三三制政策的运用。

（二）减租减息问题：太行区减租，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作了一些，但极不深入。真正执行，是在中央土地政策指示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做得轰轰烈烈，基本群众大大发动起来了，根据地面貌完全改观。尔后，一切工作，都好做了，一切任务完成，都容易了，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密切了。如去秋公粮，人民自动缴纳，超过了计划。又如今年扩兵送延安，两

次约二千人,每次回去就完成了。但在减租减息中,左右偏向都是存在的。在大减租息运动中,左的现象表现在:

(甲)退租过多。有退五年的。榆社,实际上变成了折地分青,不少地主破产。

(乙)不少地方,租额规定过低。一九四二年底,虽改为退租不超过两年,也显得太多。

(丙)有些地方,以反贪污、退贪污款,代替了减租。没有减租,地主就坍了。所以,真正贫农得利益不多。

(丁)减息,也是发展到普遍的清债、算老帐。利息超过二倍者,大部都退。不足二倍者,补足二倍退了。典地都无偿退还了。

这些左的现象,在一九四三年初,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中,提出适当的纠正。当时,虽也提出了贯彻减租,克服不平衡,但强调坚持到底不够,多少为左的现象所迷惑,丧失了贯彻力。加之,从去年二三月起,就形成了严重的灾荒,一切力量,集中于救灾、生产去了。而灾荒区,多是工作薄弱地区。灾荒中,又不可能进行继续减租。所以,太行区直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去冬,因集中力量整风,虽也照中央指示作了一些检查,但不普遍,不深入。现在太行状况,大概是这样的:原六个分区,大约真正减了的,是十分之五,包括更好的县分(如武乡)在

内,这些更好县分中,也还有百分之十没有减。新开辟的七、八两分区,为时已经一年,还未开始减租。我们曾经多次催促,据区党委说:两分区领导同志,思想上有毛病,认为两区问题复杂,恐怕影响团结,这也是右的观点。而在已减租区,又发生下列现象:

(甲)明减暗不减。先进区也有,落后区更多。其中,有虽订约而无租额规定者,有在文据约定外,另有口头约定者。

(乙)地主随便收地。因在法令上取消永佃权一条,地主则借口出典、出卖或收回自种,收佃户的地。农民恐怕收地,向地主屈服,形成明减暗不减。也还有怕变天,而屈服的。但这种心理,自孙、庞投敌后,大部消失了。

(丙)减租办法,极不一致。有的地方,存在着虚租(名义租额)、实租(实际租额)之分。虚租减了,实租未减。在这些地方,死租变为活租,实际是抵抗减租(这种现象,五、六分区还很普遍)。不少地区,因灾荒收成大减,所收粮食,大部交租,甚至有全部交了租还不足的。

(丁)农民不了解政府法令,而被地主欺骗了的,也很不少。

以上是太行区状况。据我所知,太岳与太行,情形差不多,深入程度,尚不及太行。因此,今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运动,贯彻减租。工作中心,是在

群众中进一步进行政策法令教育,和保障佃权。依太行情况,未减租者,一九四三年的多交部分,应退还农民。至于新发展区,则应以减租发动群众,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此外,还有一个赤贫户问题,太行区,无地(不是佃户,或佃得很少的地)的赤贫农,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减租减息,对他们均无利益。过去长期是终年劳苦,永不翻身的阶层,我们也长期忽视他们了。大生产运动,有小部分开了荒,加入了互助组,情况略有变更。但替他们想的办法,还不多。这是今后必须特别照顾的问题。

(三)民兵问题:民兵工作,在太行有进步。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曾作两次训练。太岳比较差些。近来,太行在数量上无大发展,质量上则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边沿区,战斗力增强,组织严密,行动亦较积极。地雷战有发展。去年,全区制造石雷几个,因未遭遇大扫荡,尚未见其效果。又发明了磁雷,据说,效果比石雷还大。总之,民兵对地雷信心是有的,问题是训练与使用。今天民兵的武器,最有效验的,还是地雷(铁、石、磁三种),应大大发挥。步枪,在太行有八九千支,太岳不足一二千支。过去经验证明,步枪杀,不如地雷炸死之多。至于旧的武器,亦应提倡。惟除土炮外,其余效果不大,但比没有武器好的多。而在发挥尚武精神上,尤属必须。近日群众发明了一些小土炮,土迫击炮,不断的有创造。太行民

兵现存缺点是：

(甲)洋枪主义未完全克服，不愿使用旧武器。

(乙)缺乏白刃搏斗的训练与锻炼。

(丙)宗派主义还很普遍，有些自高自大，不注意团结广大的自卫队。

关于民兵的发展，仍有可能。太岳则有大大发展可能。太行，现约五万余名。最好县份(武乡)，占人口百分之七。中等县份，占百分之五。据过去研究，发展到百分之七，一般是达到了饱和点。所以，太行原有区，还可发展约两万。如加上新区，将来可达到十万左右。区党委提出，今年发展百分之六，明年到百分之七。今年冬季，仍着重民兵训练。明年，则加强自卫队工作。至于生产与战斗结合，一般有了进步。在初期，民兵游民化的倾向是严重的。经过几年不断纠正，特别是今年大生产运动，把广大民兵卷进去了。边沿区民兵的生产与战斗结合，也有一些经验，如战斗与生产的变工互助形式，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互助组到边沿区、敌占区卖工，既保护了生产，又得利益。中心区的民兵，多参加一般互助组。也有民兵就自己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也有以民兵为骨干组织起来的。至于在战时如何结合，还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看起来，战斗与生产的变工形式，会大大发展起来。

(四)沦陷区、接敌区的斗争问题：赤白对立的现



象，一九四一年以前，曾在某些区发生过。一九四一年以后，就没有了。过去形成的原因，是敌人挑拨甚至鼓动群众到根据地抢掠烧杀，我游击队纪律不好，抗日政府只要粮食，不做工作。其结果，使游击队不能在敌占区立足，形成根据地严重退缩状态。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弱点。加之敌人对沦陷区的无情压榨，我政治攻势发展，敌占区人民对我一改旧观，态度甚为亲切。现在，许多老沦陷区，都能进入武装活动了，游击区有很大的开辟，平汉线也大体恢复到一九四〇年以前的状态。

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相配合，在运用上，一年来也有发展。举二分区几个例子：

(1)平定西小商工作。平定西南下商人很多，商人成份多系失业矿、磁、染工、雇工及小知识分子，常来往于敌区我区之间。我经过工商系统，加以买营业证，每月一换，加以组织教育，离城五里的村庄，都有人参加。他们参加的条件是：(甲)保守抗日秘密；(乙)组员互保，防止奸细混入；(丙)遵守贸易法令。他们做了很多事，如出口粮食四百石(至去年七月)，都未落入敌手，并输入很多必需品，建立了除奸网、秘密游击小组和秘密宣传员，开展了一些伪军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组织。

(2)太谷反抽丁同盟。这一组织，本来早就存在，但无作用。去年夏荒时期，群众想向大户借粮，所以

配合公开武装,把敌人吸引到公路点上,其他地方就借粮。借粮时,先由反抽丁同盟讨论,然后村政委员会(以合法形式存在的,名字叫工作组)讨论,然后召开座谈会,地主们提出三个条件:甲、保守秘密;乙、不借给料子鬼;丙、秋后归还,由政府担保。然后,当面写约,穷富之间,改善了关系。经过这些工作,同盟中也建立了秘密游击队小组和除奸网。

(3)榆次反毒救国会。这一组织,是伪区公所批准的,但完全在我掌握之下。各阶层都赞成,它真正在开展灭毒运动。同时,在里边掩护了秘密工作。

(4)榆次战斗生产合作社。这是接敌区的组织,土地、劳力以及民兵的武力,都算股份,按股分取收获物。

(5)寿阳卖工队。接敌区青年组织起来,到游击区做短工,带着武器,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就种地,并且做宣传工作。这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敌占区工作。

(6)今年夏季屯粮时,太谷敌占区群众分散的往山上送,遇见敌伪时,就佯向据点前进,并称给皇军送粮,一转眼,就又上了山,这样一千五百石粮食,不到一礼拜,就都屯齐,而且都自己送上来了,未用部队掩护。

(7)这样例子,各分区都有不少。

(五)民众团体问题:民众团体在减租减息之后,

转为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十分需要。惟保障农民佃权，调解人民纠纷，还仍是农会必须经常注意的事。在组织方面，太行同志认为这样一转，工农青妇都可统一起来（或统一于农会），因为生产、卫生、文化等事业，没有系统分立之必要。惟文化教育上，还可以分开做。此点，他们亦未考虑成熟，只是一个初步意见。

（六）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较前均有进步。去年冬季及今年年节，普遍进行了教育，军民都进行了反省。一般来说，太行军民关系，在减租运动后，即有进步，经过这个运动，更密切了。军队对群众态度，比前更好。一般都积极参加了救灾、打蝗工作。节食救灾，自己生产，并帮助人民生产，都给群众影响很大，视军队为救命恩人。爱护军队的例子很多，参军热情很高。如武乡扩兵，每个新战士，都带有民兵或农会的介绍信和鉴定表，即其一例。在进行生产运动中，部分队伍与人民实行互助。军队作战时，人民自动帮助军队锄草，这种例子很多。近九月来，民众不和的事很少听到。即有，多能相互原谅。对于抗属，政府一面动员帮助他们生产，建立家务，一面优抗工作，也做得比前切实。在社会上，抗属地位提高。现在的缺点，在军队方面，违犯纪律现象，还未消灭。特别在生产运动中，还有占民众地者。有为改善自己生活，向人民放高利贷者。也还有个别违犯政府

法令者。在拥军方面，无论政府、人民，个别缺点，均很难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七)军队轮番训练，非常必要。太行军队任务还是繁重，正规军数量也很不够。此次抽出四个团到太岳作战，抽出两个团向南发展，加之准备工作不够，故须整训时间略为延迟，大约十一月才开始，军区正从事准备工作。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确吃了长期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亏，政工缺点，较之任何部门特别厉害。这个工作，尚未总结。谭政同志报告，已开始引起前方注意。

(八)城市工作，我们及区党委均已讨论。北方局着重帮助太行积累经验，以帮助其他各区。太行区已确定抽出七个地委级干部以及其他一批干部来进行这个工作。最近准备召集一次城市工作干部会议，打通思想，总结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估计这批干部下去时，可以干些成绩出来。余尚无可报者。

(九)今年大生产运动后，估计太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已于八月三日报告，不赘。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太岳历年负担比较太行轻得多，今年因百物昂贵，预算较过去还得增加一些。

(十)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但仍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青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但从十一月起，生产品收入多，供给

标准提高,即可大大改善,前亦已报告。农民自麦收后,基本上已经渡过灾荒。今年互助合作运动,都有开展。惟命令主义与形式主义还是严重。这个,尚待材料收好,再行报告。

关于根据地自给,在太行的困难,是棉盐两大问题。两项入口,年需一万万二千万元的伪钞。准备明年扩大种棉地到十六万亩,则可达到棉布百分之八十自给。盐非到外面买不可,但亦准备从冀鲁豫土盐找出路。其他工业品,大致可以自给。现从敌占区进口的,除棉、盐、布、火柴(火柴入口量不大)四项及军工、医药、电料外,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入口了。

邓 小 平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答复后,很快批转各地。批示中说:“十个问题答复,内容极好,转各地参考。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告知太行区党委十分感谢。答复给今年生产指导有了依据,是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我从邓小平处看到批示后,一方面很高兴中央肯定了太行的工作,特别对“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非常重视,这是对太行工作的极大鼓励。太行工作,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指导下进行,所以才会取得稳步发展的成就。另一方面,深感我们的工作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在减租减息问题上,邓小平在答复中指出的“太行区减租,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作了一些,但极不深入”,“左右偏向都是存

在的”，“太行区直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邓小平要我在今秋后必须按照中央的政策，真正把减租减息工作搞好，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左右偏向，扎扎实实地解决好统一战线大政策下的农村土地问题。

关于太行区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右左”偏向问题，中共中央早在1941年11月5日给我的电报中就已提出。中央是在接到我给中央送的关于太行区减租减息情况汇报后复电时提出的。我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据太行11个县统计，共解决土地纠纷6721件，减租彻底，地主富农土地正受收回押地、赎回典地、保障承佃权与典买优先权等影响，大量流入贫农中农手中，晋东南土地关系及阶级关系，已发生剧烈的变化，地主大大削弱等。中央认为，上述情况说明：“你们的农民土地政策还是有过‘左’之处，你们觉得如何？”中央在电报中还强调指出：“今天我们的农村政策，必须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才能发动群众的抗战积极性，才能有力量去推动其他阶级坚持抗战；同时又必须从巩固农村统一战线出发，使日寇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孤立起来。应该把地主阶级看成今天坚持敌后抗战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在策略上争取、联合它，应该采取妥善谨慎的改良政策，去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马上消灭封建势力。应该指明，这种能团结各阶级抗战的改良政策，才是今天真正革命的政策。应该把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地主的政策完全区别开来，最大多数地主，是抗日的同盟者，我们现在在抗日根据地的政策不

是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而是允许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央的批评和指示,在1942年研究贯彻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时,我曾强调过,并在区党委的文件中将中央的上述意见重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开展后,“左”的偏向未能遏制住,一些地方又发生了上述邓小平指出的右的偏向。因此,在准备开展1944年的减租减息运动时,我们十分重视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1944年8月,我在审查修改李友九编的有8.6万字的《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一集时,对抗战以来太行区减租减息的经验教训,通过材料分析,加了一些内容。这本调查详细叙述和分析了太行区经济结构、地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战后太行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变化、游击区社会经济的变化等等,还对1942年减租减息运动后太行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对运动中发生的“左”右偏差对减租减息实际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在为该调查写的序言中,提出要研究本区发动群众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指导思想 and 政策策略上的经验教训,以便从中探索领导发动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序言中我强调了调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从这本材料中,可以获得鲜明的教训,我们是走过曲折的道路的,付出过不小的代价,许多同志摸索过很长的时间,而问题的正确解决又明白借助于调查研究。相反,摸索与吃亏,又显然在于缺乏系统的社会调查。”

1942年5月开展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中,发生过什么偏差和有什么应记取的教训呢?调查材料显示,在已开展过减租减息运动的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正如中央和邓小平给中央电复中指出的,是减租不彻底。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太行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地主仍然以夺佃威胁农民,抵抗减租,方法是多样的,有的收回自耕,有的以交公粮为名出卖,有的以高价让佃户而以低价卖出,有的且欺骗区村干部,取得合法。②地主不收租等待‘变天’,佃户只看眼前利益不交租。③未订租契的还很多,或即使形式上订了租契,实际仍按口头约定交租。榆社初步检查的结果,且发现有个别加租者。据黎城检查,一般的大中地主都减了,非斗争目标的小地主未减,外村地主减了而本村地主减的不彻底。在群众中印象恶劣刻薄佃户的地主减了,较好比较开明的地主减的不彻底;佃户方面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同干部关系好或沾亲戚关系的佃户大部都减了,不敢说话的、地位不高的与干部关系不好的佃户以及客民佃户减的不彻底或根本未减。”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解决减租不彻底,是1944年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最主要的问题。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根据中央强调的在减租减息中不能搞“恩赐减租”而是要“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的精神,从整风中得到启示:要发扬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启发农民的



自觉性,由政府“我要让你减租减息”,变为农民起来“我要自己减租减息”。这里,最关键的是从思想上启发农民更加自觉地参加减租减息斗争。

1944年秋收后期,区党委就开始部署减租减息,于11月17日发出《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区“必须进行普遍与彻底的减租运动”,在领导方法上“要学会站在群众中领导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经过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具体的运用一般号召(必须号召)与个别指导(如深入一个村、一个斗争、一个事情)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贯彻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进行说理进行斗争”。该文件下达前后,全区各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先后开展起来。

这期运动开始后,区党委很快发现平顺县路家口思想发动的经验很有典型示范性,立即派人进行总结,推广到全区。路家口村的经验主要是汲取了干部整风中打通思想的经验,创造了“算账、对比,进一步弄清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农民和地主究竟谁养活谁”的经验。12月下旬,区党委把这一经验向全区推广,使全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很快从老区、半老区到新区,从先进地区到工作薄弱地区,深入开展起来。路家口村的经验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45年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减租》。社论指出:“本报今日发表的《太行平顺路家口村检查减租经验》的通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已经减过租但不彻底的地区,如何重新发动群

众解决问题；在尚未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如何迅速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求得减租减息政策在各个解放区普遍彻底的贯彻”。路家口村的经验说明“只有当农民不仅了解减租是应该的，而且为着自己的利益理直气壮直接行动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时，问题才能解决的彻底，群众才能提高一步”。社论把路家口村的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使其更加有典型示范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减租运动，区党委发现，除一部分地区减租比较彻底外，多数地区问题还比较多。问题主要是有的没有减租或因减租而丧失佃权的农户竟达50%，有的甚至超过50%。过去减租比较差的地区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比较普遍。减租比较好的地区发生许多夺佃现象。这种状况说明，1942年运动中的恩赐减租问题仍在严重影响着全区减租运动的深入发展。路家口村的经验还没有在全区真正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接受。为把运动引向深入，区党委在春节前开会研究后，于1945年2月5日发出《关于继续开展减租运动准备春耕生产的指示》，指出：“目前的经验证明，凡在减租运动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都是经过从思想上发动群众，使群众逐步觉悟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而又经过群众自己的行动（斗争）锻炼，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真正组织起来。这说明群众路线的思想指导与行动指导，是领导减租运动的重要方法。反之，目前的经验又证明，凡在减租运动做得不好的地方，都受有恩赐观点的影响，都由于恩赐的办法在作怪。恩赐观

点、恩赐办法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正是目前运动中两种基本的不同思想，不同路线，不同作风，我们应该发扬后者而克服前者。”区党委还指出：“当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在发生一些错误倾向，其性质有‘左’的也有右的。为克服这种偏向，就要在干部的思想弄清减租的目的是贯彻减租、发动群众，重点要放在真正减租和减租之后的订立租约以保证农民佃权上。只有依约（或习惯上的永佃权）保证了佃权，才能使农民安心生产，巩固减租。”“碍手碍脚，为群众的激昂行动所吓倒的表现，是右倾错误，必须加以克服。”“害怕群众的‘左’不敢引导群众充分斗争是不对的；不认识依靠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群众路线去克服‘左’也是不对的。只有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上才能把两者统一起来，正确达到两个目的。”在这一指示中，区党委还强调要在减租运动后组织起来进行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开展新的生产运动。

指示下到各地后，正值春节期间。各地把减租运动作为春节后全力开展的中心工作。根据区党委的安排，各地都集中培训了干部，重点学习了区党委的两个指示和平顺县路家口村的从反省中打通思想，发动群众检查减租的经验；平顺县在减租运动中打通群众思想的经验；黎城县通过群众纠正处理地区夺地问题上的过火现象的经验等，并让干部学习了减租算法，使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仅了解政策、策略，而且掌握具体的减租办法。各地在集训讨论中又提出一些问题，区党委于2月下旬发出给七地委

并抄送各地委的一封信，重点强调了斗争策略和防右反“左”的问题以及密切干群关系等问题。在信中特别强调：“必须了解，一种倾向特别是‘左’的偏向是带有群众性的、有顽强性的，所以必须经过群众路线、思想解决，并结合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指出究竟怎样做才好，否则必产生另外恶果。”在整个这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我们一直十分注意引导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干扰，使减租减息健康深入地开展。

这次运动，到春耕结束时的5月份告一段落，前后历时半年多。运动中注意发动农民自觉起来开展减租减息（主要是减租），因此实际效果远比1942年好，基本上克服了不彻底、不平衡的问题。关于这期减租减息运动的过程和经验，延安新华社在1945年根据赖若愚的《一九四四年冬以来的减租运动总结》和于一川的《关于减租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两文整理成《太行区一九四四年冬季减租运动基本经验》，向全国各根据地介绍。1946年3月，区党委出版了《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二集，更加详细地记述了过程、结果，并总结了经验。从实际效果看，减租减息所要解决的太行区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以下重大的变化：

一是农村土地占有变化的总趋势是地主（包括经营地主）继续被削弱，带封建性的富农亦被削弱，小农经济自耕的土地迅速增加，贫雇农的户数继续减少，中农户数增加。到1945年时，太行区小农经济自耕的土地（包括中

农、贫农、雇农)占到全部耕地的 80%以上,地主、经营地主、富农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 20%弱。雇农在农村已占很小比例,约占 0.45%左右,许多雇农上升为贫农、中农。贫农户数也在减少。约占总户数 25~30%左右,趋势是向中农发展。中农已成为根据地(尤其是老区)力量最大的阶级,约占总户数的 55~65%之间。富农的队伍变化较大,旧富农一部分在下降,转化为中农(极少数转为贫农),新富农在增加,主要是由地主、经营地主转化而来,极少数由中农上升而成。经营地主被削弱、下降,有的转成富农,有的降为中农。地主一直被削弱,其经济地位一直在下降,加上分家,不少转为富农、中农,有的甚至破产。

二是减租减息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情绪高涨,投入生产费用增加,使 1945 年太行区获得了比 1944 年更好的收成,粮、棉、油及副业都是大幅度增产。农田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有了新的进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还大大促进了社会改造,农村普遍存在的懒汉、二流子被组织到斗争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组织也吸收他们参加,把他们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特别是种租地的农民,在租佃权稳定后,积极增加农具、畜力、肥料,深耕细作,并参加互助。减租搞得好的平顺路家口村全部农户都参加到互助组中,出现了同心合力搞生产的局面。

## 二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进入 1945 年后,太行区已成为华北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根据毛泽东 1944 年 12 月 15 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精神,太行区党委在 1945 年 1 月 6 日作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工作方针的决定》,提出 1945 年要“从各方面去准备反攻”。为此,区党委提出:“一、加强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解放区,大大发展民兵和军队,发展生产,积蓄民力。二、准备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广泛组织沦陷城市与乡村的人民,准备组织地下军。三、援助大后方人民——援助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和接近战区的人民游击战争。”为完成上述任务,根据太行区的实际,确定 1945 年的工作方针是:节省民力,发展生产,造成全区普遍的生产运动热潮;扩大解放区,发展军事力量;普遍的发展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深入组织沦陷区人民;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开展拥军优抗、拥政爱民运动;贯彻干部培养计划,开展文教工作;改善组织工作,贯彻党内外干部作风改造。根据区党委提出的任务和确定的方针,全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准备反攻,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为总目

标,展开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对敌斗争的中心是发动局部反攻,猛烈扩大解放区。局部反攻从1月开始,先是从道清线发起反攻,收复了2000余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75万同胞,在道清路以南新解放区建立起4个抗日民主县政府。紧接着在太行山中以拔除敌据点为主开展反攻,把太行腹心地带的各个敌据点大部攻克,收复了3000余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近10万同胞。在局部反攻中,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的消息传到太行区,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更多地歼灭敌人,更大地扩大解放区,征得在延安参加七大的邓小平、刘伯承的同意后,我和李达司令员研究,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夏季作战攻势。攻势作战按规模分为安阳战役的主作战和元(氏)获(鹿)战役、武(安)沙(河)战役的支作战。这是抗战中由区党委和军区共同组成战役指挥部的第一个大战役,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和我(当时任太行军区政委)统一指挥,党、政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均参加了战役的组织工作。安阳战役共集中了太行军区所属的9个团,分成3个支队并配以地方武装及民兵。我不懂军事,更不懂战役部署和具体指挥,主要靠李达,我负责政治工作和协调地方支前。3个支队都有地方党委领导任政委,参加指挥部。这些政委和我一样不懂军事,起的作用和我一样。一支队由黄新友、张廷发、高扬指挥,二支队由韦杰、陶鲁笏、马忠全指挥,三支队由鲁瑞林、王一仑指挥。在安阳战役前,全区进行了总动员,后

勤物资在民众的全力支持下准备充分,并有3万余民兵、自卫队分配在各个支队配合主力参战。战役从6月30日开始,到7月7日结束,历时8天,共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的日伪军25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25万同胞。安阳战役表明,我军已有能力发动攻坚战和运动战,为大反攻积累了经验。为配合安阳战役,太行区发起的元获、武沙两个战役同时发起,解放了元氏、获鹿、赞皇和武安、沙河大片地区。

战役结束后,李达司令员在接受太行《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战役中,我军士气旺盛,动作神勇,组织非常周密,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压倒了敌人。在此次作战中,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敌伪大为震惊,彻底粉碎了汉奸李英对其部下所说八路军‘行不行,两点钟’的欺骗谰言。”“这样大规模的民兵和自卫队,随同部队有组织的配合出击,在太行区还是第一次。他们从游击战、麻雀战进入进攻的野战范围,获得了许多新的作战经验。至于地方工作与军事的密切配合,后勤工作与前方作战协同动作,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在此次战役中,党政军民领导机关都参加到战斗行列里来,实行了党政军民全面大进军,真正体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这次战役领导的最大特点与最大收获之一。”

李达的谈话,延安《解放日报》在7月29日转载。

1945年,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为了使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规和更加完善，在大反攻前，连续召开了全区性的推进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会议。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上，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太行会议。早在1944年6月，边区临参会就提出在全区进行普选，召开参议会。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从11月份起，各地开始县参议员和边区参议员采取分区、分职业直接选举的办法选举。从推荐协商到直接选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进步。太行区的参议员选举和民主选拔第一届群英会的英雄模范同时进行。选举采用差额选举办法，竞选很激烈，最后以选民投票结果选出参议员146名，其中共产党员53名，占36.3%，体现了“三三制”原则。这时，太行区有450万居民，每个参议员约代表3万余居民。边区参议会采取分区召开办法，太行会议于1945年3月2日至3月19日在涉县温村召开。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讲了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大生产、大练兵、发扬民主三大任务。李达作了军事报告，戎伍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申伯纯作了临参会报告。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在发言中就边区政府过去的成绩和今后的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这时兼任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因此对政府工作参与了解的比较多。我在发言中指出，1942年以后，政府的领导一般是成功的，并举出组织对敌斗争、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生产救灾、时事教育等事例加以说明。对政府今后工作，我着重强调了搞好以农业生产为

中心的经济建设,搞好互助组,开展沦陷区工作和培养教育干部等项。会议最后选出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驻会委员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太行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健全。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上,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会议后接连召开了6个重要会议。第一个会议是3月26日召开的太行区工商局银行经济路线检查会议,会上作出《太行区经济工作历史初步研究》。这个总结将抗战以来太行区经济工作的历史分为4个阶段,即:1937年7月开始至1940年4月黎城会议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太行区的财经工作保证了当时的供给,克服了当时的困难。但由于政权没有统一,限制了工作的开展,使全区的财经工作没有能够更有效地展开。1940年4月黎城会议至1941年8月边区政府成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由于冀太联办的成立,政权走向统一,逐步克服了经济的紊乱,开始抓经济工作,为以后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但在这一阶段中忽视了对敌经济斗争,重视财政而忽视发展生产,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1941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至1943年7月边区财经扩大会议为第三阶段。这是根据地处在严重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对敌经济斗争很激烈,组织群众力量反对敌人的封锁、掠夺,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对根据地内的经济建设抓的不好,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增加了根据地经济困难。1943年7

月边区财经扩大会议至1945年3月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是太行区经济工作成绩最大、路线基本正确的时期，整个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二个会议是4月5日至25日召开的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会议暨文教展览会(习惯上称太行第一届文教群英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178名模范文教工作者。我在会议开幕时代表区党委向大会表示祝贺，并讲了抗战形势和文教工作者的任务。我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是代表着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一个侧面总结。我们建设一个根据地，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也要有一支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还需要有一支文化大军。这三者都是和根据地的建设不可分离的。前两个侧面在去年的群英会上已经初步总结了，总结后一个侧面就是这次大会的任务。”这次会议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誌石主持，他在会上代表区党委作了总结报告。与会议同时举办的文教展览吸引了许多人。这个展览共展出3955件展品，分教育、卫生、对敌宣传、出版发行四个部分。会议和展览向人们展示了太行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就建设和发展前景。

第三个会议是5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太行区造纸手工业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中造纸手工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今后发展的目标。当时全区已有造纸池515个，能生产双印纸1.39万块，行纸3.37万块。造纸工人发展到4122人，基本上满足了本区需要。今后除扩大生

产规模外,主要是改良工具,改良技术,提高质量,并发展互助变工。为支持太行造纸业的发展,边区决定增加550万元(冀钞)贷款给各纸区。

第四个会议是5月20日至30日召开的太行区矿业代表会议。会议在总结全区矿业发展时指出,矿业生产在支持战争、坚持根据地、建设根据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煤、铁、硝磺等战略矿产,发展很快。会上提出,今后矿业生产的总方针是扩大生产,推广销路,降低运费,降低成本。

第五个会议是6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太行区纺织代表会议。纺织业是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工业。支持根据地军民最基本的物质是粮食和棉布。吃和穿是所有抗战条件中最重要的两大基本条件。因此,在根据地极端困难时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第一是农业生产,第二是纺花织布。太行区的纺织业在历史上就有传统,根据地在困难中发动纺织运动规模很大,收效也大。这时太行区已有纺织妇女24万,纺棉花90余万斤。会议总结了抗战八年来纺织业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抗灾救灾中组织起来发展纺织业与把纺织业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调剂男女劳动力的经验,提出要进一步发展纺织互助合作组织,提高生产速度和提高质量,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实现根据地穿衣自给自足的目标。

第六个会议是边区政府于6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财经会议。这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财经会议。这次

会上决定,为准备大反攻,边区政府拿出1亿元(冀钞),以5000万元在新收复区吸收棉花,以5000万元在根据地内投资手工业。同时决定大量收买银元,以备大反攻用。会上决定成立财经学校,培养财经干部,准备战后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

以上6个会议的召开,充分显示了太行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大反攻从思想上、物质上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在太行区的各抗日部队一边发动局部反攻,一边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并加强了城市工作,区党委成立了城工部,为大反攻进行全面准备。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人民军队向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日本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太行山。当时,我正在左权县,李达参谋长在涉县赤岸。他立即通知我赶回赤岸。11日一早接到通知,正是下雨天气,我立即冒雨赶回赤岸师部和区党委同住的院中。

一进到师司令部作战室,李达就拿出朱德总司令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和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三人10日发给李达、杨立三、宋任穷、王宏坤、杨勇、苏振华、谢富治、王新亭和我的电报指示,指出:“日本可能继续抵抗,亦可能投降,我应迅速准备一切,夺取城

市。”李达和我商量,要根据上述指示立即集中太行部队,发起大反攻。同时动员民兵、自卫队参战支前。11月19日,李达、我和黄镇以太行军区司令员、政委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我们所有武装部队及人民武装,应遵照朱总司令本月十日第一号命令,迅即全力出动,向当面敌伪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使敌军缴出全部武装,使伪军伪组织投诚反正,否则坚决消灭之。我民兵及自卫队尤应紧急动员,积极参加此最后胜利的行动,保卫与扩大解放区,收复沦陷区。”当晚24时又发布第二号命令,命令石志本为上党地区进攻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指挥所属部队受降和对拒不投降者发起进攻。根据以上命令,从11日开始,太行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民兵、自卫队组织随军参战支前,开始了大反攻。12日,太行军区司令部对本区周围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令立即停止抵抗,缴出全部武器,命令伪军立即反正听候编遣。同日,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布紧急政治命令,立即在全区进行紧急政治动员,向敌伪军发起政治攻势,严防敌人的阴谋,揭露和打击一切窃取人民胜利果实的阴谋诡计。

大反攻开始后,区党委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前参战为中心展开。这时,全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参加到欢庆胜利,支援、参加大反攻的热潮中。8月17日,区党委和军区联合发出迅速动员参军指示,号召广大青年参军当兵。在“为父母兄弟姐妹报仇”、“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口号下,仅半个月时间,太行区就有3

万多青年参了军,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反攻力量,许多县的民兵、自卫队都是整连、整营地向部队输送新兵。在参军运动中,共产党员、干部带头,翻身农民争先恐后报名。在3万多新兵中,共产党员占19%,干部占14%,中农贫农青年占93%以上。全太行区参战民兵(指随主力军参加战斗)达455124人;支前用工910万个,按当时全区350万劳力计,每人平均2.6个工。各级政府拨付给参战民兵、自卫队的粮食达1350万公斤。在整个大反攻中,太行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共产党员一直起着核心领导作用,时时处处走在参战、支前的最前面。太行8万余共产党员是太行区的中坚力量,是抗战和建设的骨干。

大反攻开始后,太行区的另一项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朱德总司令关于抽调东北籍干部赴东北的指示,组织人员向东北进军。首先出发的是由朝鲜友人武亭率领的朝鲜义勇军。他们在8月25日离开太行时发表了充满深厚感情的告别信:“我们是在以你们的血肉筑成的、不可战胜的革命圣地——太行山上,在你们爱的热怀里抚育下,才有了今天的踏上‘打回祖国’的征途之光荣行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太行的东北籍干部迅速集中,随同挺进东北的大军向东北进发。建国后许多太行干部在东北工作,大多是这时去东北的。

## 二十一、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 与巩固新区的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之后，随着日本投降和抗战最后胜利的实现，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矛盾首先直接表现在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上。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时就明确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日本政府刚刚宣布投降，还未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就已在太行区的上党地区突出地表现出来，迫使我们在太行首先发起抗战胜利后在全国的第一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大战——上党战役。

上党地区在山西省晋东南的上党盆地内，是太行根



据地的腹心区，八年抗战中一直是敌我激烈争夺的地区。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前期曾在这里驻扎，1939年7月日军发动第二次围攻后大部退出，百团大战后驻军更少。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鉴于日军力量在八路军打击下日削渐弱，开始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推进。日本投降前夕，同日军一直有联系的阎锡山提前得到日军将投降的消息，从其盘踞的晋西南向晋东南推进。因此，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在8月10日给我们的电报中就指出，要太行、太岳部队主力集结于沁源以北地区，准备打击进犯的阎锡山部及阻止蒋介石部队从南向北进犯晋冀鲁豫边区。8月14日，又发出《关于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北犯之蒋阎军的指示》，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蒋积极布置夺取抗战果实的情况下，“我为争夺抗战果实，坚决争得同蒲线太原(含)以北、正太线全线、平汉线黄河以北、陇海线黄河以东及原有广大乡村根据地之任务，必须迅速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北上之蒋阎军，保障太原石家庄及平汉线之控制”。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各军区要“在部队中人民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说明蒋阎以内战方式夺取抗战果实，我之方针是消灭发动内战的蒋阎军队，巩固八年抗战民主之成果，号召全区党政军民为此艰巨任务紧张工作，保证前线胜利，完成每一个具体任务”。我们根据上述指示，在部署向日军展开大反攻的同时，积极部署保卫胜利果实的有关工作。8月16日，阎锡山按蒋介石密令，命令其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

1.6万余人向上党侵犯,意在夺取上党,为国民党军队北上创造条件。得到以上情报后,8月18日我同杨立三、黄镇给刘、邓发电,指出阎锡山军队和蒋介石军队要“争夺上党”。正在前线指挥对日军作战的李达也在18日给刘、邓发电,报告阎军两个师已在向上党地区进犯的情况。蒋阎的意图很清楚,他们就是要乘日军投降退出上党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战术抢占上党,以此为基地消灭占据平汉路中部、太行山区的晋冀鲁豫主力部队。虽然这时蒋介石在唱“和谈”高调,三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是,蒋介石谈判的意图只是为了拖延调兵和抢占地盘的时间,真正目的在于抢占八路军和人民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的地区,为其在中国建立独裁的国民党专制政权创造条件。

但是,蒋介石、阎锡山只是一厢情愿。他们在密谋向上党、平汉线进攻时,都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在华北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区内,经过局部反攻和大反攻,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已基本上连成一片,80多个城市已在人民之手,解放区内有2400万人口,八路军主力近30万,还有40余万民兵。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在八年抗战中结成了血肉联系,这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现实是蒋介石、阎锡山无法估计到的,也是决定其在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中遭受惨败的主要原因。

这时,中共中央根据晋冀鲁豫边区的形势,为加强统一领导,对领导机构进行了新的调整。8月15日,决定成

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和军区,同时决定撤销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129师师部。8月20日中央局和军区宣布成立。中央局委员由中共中央指定,共21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常委8人: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书记邓小平,副书记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副政委薄一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军区成立后,李达不再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改由秦基伟担任,我仍任政委。边区政府人员没有调整。

中央局和军区成立后,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于8月25日乘飞机从延安回到太行。他们一回来,立即部署上党战役。在刘、邓指挥下,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3个新组建的主力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于9月10日发起上党战役,到10月12日结束,歼敌3.5万人,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为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增强了实力基础。上党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盛赞此役执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时“‘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并说“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根据中央指示,上党战役后,刘、邓

又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发起平汉线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在10月21日至11月2日历时13天的战斗中,歼敌1.7万余人,争取了高树勋新8军等部起义。此次战役中高树勋率新8军起义影响很大,对国民党军震动也很大。11月12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两次大规模的歼灭战,给进犯晋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国民党军从南向北进攻解放区的战略企图,巩固了原有的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革命的斗志和信心。

我军在华北粉碎敌人的进攻后,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同时,要抓紧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借以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发展解放区的经济。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央局于11月中旬在邯郸市峰峰煤矿召开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扩大)会议。除中央局全体委员外,4个区党委的委员、4个军区和6个军区直属的纵队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

峰峰会议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到区党委、军区和纵队一级。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从1945年11月11日开到13日。会议在传达了中央11月7日指示后,结合本区的实际着重讨论了扩

大军队、整编主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和扩大生产运动、财经工作等。会上全面部署了扩大、巩固和建设根据地、保卫根据地的斗争。针对上党、邯郸战役后干部中存在的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而产生的厌战情绪和在胜利面前产生的居功骄傲的倾向，会上强调一切要从长期支持着想，事事要作长期打算，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进攻。

会议结束后，我和参加会议的太行区的其他人员立即赶回涉县，贯彻会议精神。

首先，根据中央局和军区调整军区的命令，调整了太行军区领导：

司令员：秦基伟

政治委员：李雪峰

副司令员：黄新友、赵辉楼

副政治委员：黄 镇

参谋长：何正文

政治部主任：袁子钦

政治部副主任：周光坦

军区新组成的同时，已经迁到武安（后迁到邯郸）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不再兼太行行署，正式成立独立的太行行署。11月25日，太行行署在涉县正式成立，太行区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区，行署领导人为：

行署主任：刘岱峰

行署秘书长：武光汤

边区政府同时决定调整太行区行政区划，将原 8 个专区调整为 6 个专区，并任命了各专区的专员。调整后的专区区划为：

一专区：辖内邱、临城、邢东、赞皇、元氏、井陘、邢西、高邑、获鹿、邢台、沙河等 11 个县和邢台市，专员马适安。

二专区：辖榆次、寿阳、太谷、榆太祁、左权、榆社、武乡、昔阳、平定、祁县、和顺等 11 个县，专员杜润生。

三专区：辖襄垣、黎城、潞城、壶关、长治、平顺等 6 个县和长治市，专员范文彩。

四专区：辖博爱、陵川、沁阳、武陟、修武、温县、修获武等 7 个县和焦作市，专员杜毓沅。

五专区：辖林县、辉县、汤阴、汲淇、新乡、辉嘉等 6 个县，专员邓肇祥（即邓辰西）。

六专区：辖涉县、武安、磁县、林北、安阳、武西、偏城等 7 个县，专员田裕民。

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各地委、军分区也作了调整，全区设 6 个地委、6 个军分区，领导人为：

一地委书记冷楚，兼第一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胡震。

二地委书记刘建勋，兼第二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鲁瑞林。

三地委书记于一川，兼第三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为韩卫民。

四地委书记刘毅，兼第四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

由黄新友兼任。

五地委书记谷景生，兼第五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崔建功。

六地委书记陶鲁笏，兼第六军分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

在机构调整中，区党委机关及下属单位重新核定了编制，共 227 人（不包括太行《新华日报》社）。

12 月 9 日，在太行军区成立后的第一次会上，我在讲话中除强调团结一致，准备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大规模的进攻，保卫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外，着重讲了如何在新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问题。因为参加会议的各军分区政委都是地委书记，要他们回去后立即部署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我提出，巩固新区最重要的是开展减租减息，削弱封建势力，发动一切农民群众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并把减租减息运动有组织地转到生产上去。在运动中要团结中农，中农也是农村中我党团结的基本群众。在运动中建立农会时，不仅要以贫农为骨干，而且要团结中农，造成农民大团结，建立强有力的农会。在运动中必须采取群众路线与思想自觉相结合的方法，贯彻群众自求解放和领导群众相结合的方式与方法。要克服少数积极分子关门主义倾向，或向中农关门的倾向，并要及时地不停地以最好干部改造与掌握政权。在运动中要有意识地大量培训农民干部，发展新党员。发动群众必须党政民一起努力，军队要支持和帮助地方的减租减息运动。

军区会议后,我把地委书记留下,和区党委一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峰峰会议精神,研究 1945 年冬与 1946 年春的工作问题,确定在全区重点搞反奸反霸、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支部整风与时事教育等五项工作,工作的重点是巩固新区、准备反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工作刚刚部署下去,形势就发生变化:1946 年 1 月 10 日,我党代表同国民党代表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正式达成停战协定。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1 月末,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和保障国内和平的五项决议。我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政府三方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全国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开始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和改组政府等问题的谈判。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老区的工作和巩固发展新区的工作,成为摆在区党委面前的重要问题。为此,区党委决定在 1946 年 1 月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局的有关指示,确定 1946 年的工作方针。

这次扩大会议是太行区成为独立的行政区,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离开涉县来到太行山东面之后,由区党委独立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在中旬召开,由我主持。会上,学习了中共中央、中央局关于形势、任务和 1946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了形势的特点,重点讨论了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和开展生产运动的问题。其中



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以巩固新区是讨论的重点。

这里说的新区，是指从 1945 年春扩大解放区进行局部反攻和大反攻至停战协定前新解放的地区，占太行区面积的 2/5 以上。

新区的阶级斗争比老区复杂、尖锐。由于敌伪汉奸长期统治，中农、贫农丧失了大量土地，封建势力和新兴的恶霸、汉奸、土匪等互相勾结，利用和发展会道门，掌握有一定的武装，对农民进行肆无忌惮的欺诈压迫。冀西和豫北新区更为严重。1945 年 10 月后，新区从反奸反霸开始，在军队支持、帮助下，对作恶多端的首要分子进行狠狠打击，稳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发动群众起来减租减息，在新区农村树立农民的政治、经济优势。在老区主要是进行查减运动，巩固以往减租减息成果，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到扩大会议召开时，新区的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会议开始后，我重点就新区群众运动讲了意见。我在发言中首先提出：“新区发动群众，是巩固这个战略要地，是战略性的工作。”接着分析新区群众运动的现状，指出“目前新区只有局部地区打开了局面，而一般还未造成大运动，或正在运动而尚未形成规模”。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一是由于从民族战争转到阶级作战、民主斗争，怎样把握转变后的特点，尚不完全明确；二是新区的时局尚在动荡中，“变天思想”在威胁着群众。特别是停战协定签订

后,国民党特务到处造谣,使一部分干部不能放手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在会上,我强调在发动新区群众运动中,要首先打击敌伪统治时的残余势力和影响,通过诉苦反奸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同时要进行政治动员和时事教育,坚定群众跟共产党、人民政权一起争取解放自己、开展减租减息的信心和决心。会后,区党委于1月18日发出《关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春耕前放手发动群众,在新区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老区普遍地进行冬季生产并结合生产进行查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46年1月和2月,太行新区的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运动的规模、速度、深度都超过了老区。从老区派往新区的干部把老区发动群众的作法,结合新区的特点灵活运用,特别是注意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再加上消除了顾忌国民党的思想,领导运动更加得心应手。老区的查减运动,同生产紧密结合,使冬季的生产朝气蓬勃,为达到“耕三余一”进行准备。到春耕开始时,太行老区生产掀起高潮,新区通过减租减息和反奸反霸使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太行区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 二十二、贯彻“五四指示”， 开展土地改革

我在太行区工作 10 年，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根据中央颁布的“五四指示”，领导全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我在前面介绍太行区 1944 年减租减息运动时曾指出，太行区一些地区的减租运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中央规定的政策范围，一些农民经过减租减息，从地主手中已获取了一部分土地。抗战胜利后，在 1945 年冬至 1946 年春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要求突破原规定的政策界限，直接分配土地的呼声更强烈。特别是在新收复地区，在反奸反霸中，从汉奸、土匪、特务、恶霸等手中收回了一批土地，这些土地的分配成为农民关注的问题。因此，在运动中一些地区已经在分配土地。分配土地的范围不仅限于被没收土地的汉奸、土匪、特务、恶霸户，而且扩大到地主、富农。据区党委 1946 年 6 月在 19 个县的 72 个村庄调查，这一阶段地主的土地减少了 80% 以上，富农的土地减少了 50% 以上，中农的土地增加了 20% 以上，贫农中有 1/3 的户由于得到土地上升为中农。另据新区 3 个县的 11 个村调查，经过除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

在1946年5月前,地主和经营地主所占土地已由每人平均10.1亩和7.3亩,下降到1.78亩和3.32亩,并且动了中农、小商和作坊主的部分土地。在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的苗头开始出现。这种形势说明,中共中央1942年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日本侵略者已被赶出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已经满足不了广大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要求。要使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到人民革命斗争中,在农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就必须实行新的土地政策。

中共中央对解放区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在分析研究了各地反映的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要求后,经过反复讨论,于1946年5月4日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认识分歧和各阶层对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不同态度,指示强调:“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中央宣布:“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要求各个解放区的党组织“必须以最

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指出,目前的清算减租运动不是全部改变1942年中央的土地政策,“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但是对原有的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

接到“五四指示”,我立即主持区党委开会,讨论这一最新指示。讨论情况整理成座谈纪要下发到县委以上党委。纪要全文如下:

## 区党委对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座谈纪要

区党委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后,于5月18日开始座谈了4天,兹将座谈记录摘要整理,以供各级领导同志研究中央指示时参考。

### (一)对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的了解和认识

这个指示,是1942年土地政策指示的发展,是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群运实践的结果。中央1942年的指示是5年抗战的结果,从1942年以后,由于群众的实践起了变化,我们的政策也随之而有若干变化。1942年的指示主要是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则联合地主抗日,策略上明确打而又拉。经过几年来的减租清债合理负担反贪污等运动,大大削弱了地主,有的地主已经垮了。1943年高干会议批评了过“左”,但以后每年查减中我们一般不过分强调交租,这说明已有了变化。反攻以来,8月11号指示中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联合中农,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对

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自反攻以来，中央一贯强调放手，批评右倾，因之，才能够在这段放手的发动群众运动。中央根据运动的结果，加以集中，批准合法化，也就是群众的创造经我们批准，这是根据党的总的路线新民主主义土地纲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及运动实际的发展而来的。

当前革命推进一步，运动深入了一步，因之党的政策也必须变更。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形势有了极大变化，统一战线内部组成上，与抗日时期有所不同了。今天是反对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力争民主和平的统一战线，反封建已成为今天的重点。因之，消灭封建势力，解决土地问题，是党在目前的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政治上十分需要，我们要改变七分之一的形势，必须斗争。那么解决了土地问题，群众就可以坚持长期斗争而不疲惫。

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包括消灭封建发展生产、巩固统战、争取和平民主几方面，即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发展资本主义，奖励工商业，用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来团结农民与争取中间势力。因之不怕自由资产阶级中间人士暂时不满和动摇，不怕平均土地，就是说已经推平的地方，不去批评群众的平均主义。这种彻底的改革应该批准，但不可无止境的推平，老区没有推平，不提倡推平，如不照顾应照顾的人与团结中

农，则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在我党周围。

今天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减租减息的继续，实质上与内战时期土地革命相同，但也有不同，因未全部废除减租，而且农民站在有理合法地位。

我们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有理由的，将来准备在全国宣传实行。根据这一改变，凡是没有实行的地方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不用内战时的方法而用群众所创造，为中央指示所总结了的那些方法来实现。这样，从而使群众处在合法有理地位，分化地主反动派，对地主反动派的叫嚣，要处理、驳斥；拿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政协决议作根据来解释农民的行动是合法的。争取全国承认，并取得多数人同情，并教育干部向中间人士解释，在农民中作教育，要把消灭封建与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十分重要的。

## (二)党的策略

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动农民，但又得照顾各阶层各种人，这是为了团结更多人，使我党和贫农雇工不陷于孤立，不至冒险。根据这一目的，中央又做了十余条具体规定，要研究执行，否则将影响团结更多的人。对于中农，则要肯定认识，中农的向背，将决定革命的胜负这一重要事实。在执行这一指示时要有革命的精神与气魄，这是帮助放手的，如中央提出的要不怕反动派叫嚣，不怕中间派暂时不满和动摇，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有坚定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中间派的动摇是必然

的。对顽固派的大骂，必须给以回击。

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取得力量，而又给中间人士以适当照顾，这就可以克服中间派的动摇，要有肯定的路线及政策，照顾各方面，就能够达到拆散反动力量的结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不致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

### (三)革命观点与群众路线

我们在执行中央指示时，要放手发动、启发、诱导群众树立劳动者自求解放的思想，过去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证明走了群众路线。从领导上讲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各方面，不只在发动起来的时候，诸如：说服、照顾各种人，分配果实，解决干部与群众关系等，均要群众路线，这一点在深入运动中，必须着重提出。特别是积极分子当了干部更应注意，过去经验证明，放手发动是群众路线，但发动时，尤其在以后即往往发生干部脱离群众的路线，没有发动的地区即应着重放手启发诱导。

要掌握上述群众路线，必须使干部有革命观点与策略思想，这样可以回答各种曲解群众路线的观点，因之，党内各种错误观点必须加以纠正，要他认识群众行动是正义的合理的，建立真正的革命观点，要党政军民全力进行才能把运动搞彻底。

总的说来，现在谁也赞成放手发动群众，至少是口头上没有人反对。但我们也要看到从各方面攻击群运的情况，研究这种分歧思想的原因是：



首先是阶段斗争的发展,要考验社会各阶层与革命的关系,以及考验党内思想。这种思想最主要的是地主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或者先是诚恳的帮助群运,当打到他们有关方面时则过不去。同时表现了本位主义思想,党政军民的干部都有,只从关系上提出问题,忘了革命任务,忘了自己不了解群运是整体革命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忽视,军队、政府尤应值得注意,反之就会被地主所利用。

另一种因路线思想不明确,强调约束在“统战”内(这句话在本区常是当作联合运用的),或不了解减租政策上发展与变化,说发动群众过火了,这些错误一般是不自觉的,但必须指明,大体说有以下几种情况。如:

1、一面赞成群运一面强调不要越轨。所谓轨就是说的政策。我区1942年以后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之时,才好教育群众适当照顾;但在今天仍有这种想法存在,他们理由是群众会左,怕引起恶果,这是不懂群众运动的规律与忽视过去经验的。

2、群运好、放手对,但方式不好,这种认识历来就有。我们要认清某些地方在方式上欠妥当,但又要认识对汉奸、恶霸,因在群众痛恨之下有些过火行动是不可避免的,群众运动的烽火是不可挡住的,真正广大群众的行动无所谓错误的。方式问题是领导上应该注意教导群众的,但首先应了解革命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不是温良恭俭让,当群众起来时,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3、借口“照顾”或作风,反对积极分子与村干部。他可

以歌颂农民的行动,但他们对带头的人是打击的,这是中间派惯用的手腕,如历次参议会所表现的那样,这种思想是最危险的。我们对积极分子与村干部,应扶植培养,一面撑腰,一面教育。

4、看到分配果实有些不公,干部多得,不照顾抗属,要求纠正,事实上打击了干部。有些部队同志对抗属照顾上认为不够,所以表示不满。确有些村干部比抗属得利多,我们应一面说服村干部注意,一面也不应扩大。过去转弯时,只看见村干部缺点的一面,忽视了其与群众联系的一面,结果打击了不少干部,这个痛苦经验应吸收。中央指示,应首先照顾贫苦抗属,这是一面;另一面,部队也应参加群运,从运动中提高阶级觉悟,巩固部队,并便于了解部队中地主阶级的成份与思想,便于教育。武安团经过参加群运和开展反省运动,部队内部的地主成份,全部暴露了,这个经验值得发扬。

在今年新区运动中,不少部队参加了运动,也创造了些经验,因为我们部队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要发扬其光荣传统,部队的本质是人民的军队,就应尽量参加群运。其方法:(1)部队集体参加群运。(2)成立小组回村参加群运,返回介绍翻身经验。(3)地方干部讲话介绍群运,地方同志要欢迎部队干部参加,并尊重其意见,使部队成为支持群运强大力量,同时也给部队以最大教育。政权也应积极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政权的主要责任是:当群众行动起来以后,表明态度,使之合法化,要注意克服官僚主

义及条文的唯法观点,同时还应在说服中间力量上起一定作用,对群众团体、党务系统等等直接负责搞群众运动的也必须加以教育,这在深入阶段,更为重要。

#### (四)党的土地问题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的总方针问题

党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总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主要表现是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只有我党土地纲领,才是最彻底的依靠群众亲自动手取得土地。与孙中山的土地纲领不同,他是不让群众起来的,如土地征收法、使用法、地价税法之目的就在于和封建阶级取得妥协,不要农民自己起来取得土地,粉碎封建势力统治。我们的政策在各时期有一定的变化,主要根据外部变化与内部条件而定,从历史上比较看:

大革命时代,我党的土地纲领是彻底的,那时与国民党一起发布减租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搞减租与今天不同,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自己动手要土地,同时客观情况需要,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懂这个道理,结果犯了错误。今天时机也类似,只有历史阶段不同,那时没有军队政权,今天有了,今天经过减租解决土地问题,更使农民斗争合法合理,客观需要,内部条件允许,党应批准并加以领导。

与内战时期有其相同点,消灭封建是一样的,主要区分是方式上不同,如要与苏维埃后期比,差别则更大,那时政策上有过“左”错误,今天最有力的创造了新的方式,这与路线不可分离。这可以使农民合法有理,这对壮大我

们力量更有好处。

与抗战以来比：

农民获得成果与经验发动了人民战争，农民对民主改革有了经验，在发动农民后，壮大了农会，并且不停留的改造政权，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民主改革。今天是农村革命势力，战胜封建势力，这将推动全国前进，抗战中让步是对的，那时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发动农民又联合地主抗日（使敌人得不到社会基础）是对的，今天的改革也是对的，过去在总结群运时缺乏超出规定范围向更大方向考虑问题不够，今后应求改进。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民族民主革命，今天中心是民主民生，即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的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些区别，而有政权、军队，又与大革命时不同。今天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历史意义的，解放区的历史任务将要转变，今天解决土地问题，是解放区的历史任务，将来势必成为全国性的历史任务。

从反奸到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走向生产，注意商业的发展，就是这个历史任务的几个环节。群众创造，除中央指示的四种方针以外，还应随时总结提高。

### （五）几个问题

#### 1、土地政策与商业政策：

发展农村经济与发展城市工商业有同等意义。发展

农村经济,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现在组织起来,将来机器耕作,省下劳力,农民一部由农村走向工厂,为城市工业化作准备,因之党的土地政策与商业政策,是一致的,忽视则犯大错误。要提倡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的办法,具体区别,这对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又正确地执行政策是很必要的。在发动群众中,农村反封建与城市应区别,今天看来资本家兼地主者不少,要在运动中不侵犯其资本部分,即是很具体很艰苦的事情。对坏分子的斗争也应是有区别、有限制的,应使其不致影响工商业资本的发展。

## 2、老区如何执行:

经过 1942 年和 1944 年的减租,老区地主和经营地主大大减少和削弱,富农增加了,每次减租之后,地主要减少,富农要增加,有些富农是新兴富农,老区富农是新兴富农,因之老区富农与地主更应严格分开。现在老区地主占人口由 3.25% 降到 1.98%,土地占有则由 24.63% 减到 4.2%,这说明老区基本上已将要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因此,我区今天应依然以生产为重点。不彻底的村庄,个别发动用查减贯彻。

中央指示执行的重点应是新区。

老区富农应团结照顾,一般不应打击,因老区一般已减租。人民“圪佬户”思想普遍存在,如对富农过分打击,则影响中农发展。

## 3、领导上应注意到:

这一指示是推动当前运动的有力武器,领导上应很

好掌握执行,当前在执行中可能发生的是右倾思想。在群众起来后,地主在叫骂,我们有些干部会反映开明地主的情绪,群运以来就有些受不了,将来会更吃不了,内外结合压力很大,应特别注意。

另外,冒险主义、左的情绪,也可能发生,应在放手发动的精神下及时注意引导。

在发出以上纪要后,区党委根据太行区的实际,研究了根据“五四指示”中中央规定的 18 条具体政策,在本区贯彻执行时应注意的问题,于 6 月 6 日发出《太行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强调了必须注意的 5 个问题,以使土地改革运动按照中央的政策进行。这 5 个问题是:

1、应分清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农民自己相互之间的纠纷,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应让他们参加运动并得到适宜的斗争果实。遇有对中农的纠纷,须采取兄弟间互让的调解方式,不能乱斗乱清算,伤害自己人,混乱了自己阶级的阵营,给地主阶级以乘隙反攻的机会。本区的运动中,某些地区由于对这一阶级思想不明确,在斗争中侵犯中农不少,甚至有地方涉及全部对象的一半,这是极应注意的情况。运动中已被伤害的中农,应提出问题发动群众讨论,划分内外界线,打通思想,适当退还,或予以补偿。即使是地主或汉奸的狗腿,如果其成份为中农或贫农,也应采取唤醒其悔悟坦白,争取其重返自己阶级队伍的政策,只要其土地不是欺压霸占而来,即

不要侵犯土地。

纠正此种偏向,决不可简单从事,治一病损一经,而必须是贯彻群众路线,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

2、“耕者有其田”不是财产富力无差别的平均,只是消灭封建剥削关系。已经推平了了的,我们要肯定的承认这既成的事实。就是某些正在发动着的地区,如果真是广大群众自己要推平,我们也应该赞助群众的要求,准备给予承认。群众已经发动过了,果实已经分配过了了的地区,我们应该肯定承认已成的事实,决不能发动再次的推平运动。

3、我们总的经济方针是改革土地,改革工商业,因之斗争地主不能牵累其工商财产部分(大汉奸除外),各地已发生不合此原则情况的,应迅速具体调查研究教训,必要时设法予以补偿,即使汉奸的工商财产,亦应具体分别与抗日关系如何及功过大小,也不是一律没收。

发展工商业与发动工人、店伙群众应统一进行,取消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发挥劳资东伙协作,劳资东伙两利以发展生产的原则。只有这个方针才能与外国及垄断资本作斗争,立于不败之地。在资方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必须适当增资,改进职工店伙待遇及相互关系,组织工人的消费合作,家属生产互助互济,认真改善工人店伙生活,这样才能提高工人店伙生产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劳资东伙协作。吸收工人集体的股本,或确定店伙劳动力股,保证按期分红的办法,也应承认是劳资协力发展生产的好制

度好办法。任何超经济的股权(如好汉股)都是不应有的。

处理劳资间的纠纷,除某些封建性的待遇,需要群众斗争外,一般应采取民主协议方式解决,并需向工商资本家说明,土地改革发展农业于工商业有利。要进行政治教育,打破“变天”思想,使其放手发展营业,提倡工人店伙技术业务学习,奖励东伙劳资模范,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同时要注意增资问题的明增暗不增。

农村兼有土地关系的产业工人,同样有参加农村斗争,分得农村斗争果实的权利。工人因工作不能种地,可请求农会协商互助。

在公营产业中也必须发动群众,领导上主动改善工人生产,走群众路线,评定工人职员工资等级,协助工人举办合作社及其它有利于职工的事业。吸收工人参加厂工管理,公营事业作为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一方面克服不照顾工人生活的思想上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工人的责任性和生产积极性,保证搞好生产。

4、反奸清算斗争中,群众痛恨要求处死的罪大恶极分子,应按正当审判方式处理,必须纠正乱杀乱打死人的现象。纠正的方法不是压制群众泼冷水,而是在处理之前申说利害,发动群众来讨论,克服群众单纯报复和害怕“变天”的斩草除根思想,以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与组织性,克服落后思想,求得干部与群众的进步。这有赖于思想指导的深入与组织指导的密切。粗枝大叶,行政命令,必然形成泼冷水,影响运动的发展。



5、老区应以生产运动为中心,1942年以来减租减息不彻底的地区需要查减,但要在生产运动空隙中进行,不能因查减妨害生产运动。1942年以来群众运动中翻了身的农户,即经过减租减息后转向富农生产的农户,亦应鼓励其生产(除其封建性的剥削部分须予查减中解决外),不该再斗,必须给予保障,并扶助其再生产,再发家,走向致富方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侵犯其新兴财产。

我们正在学习文件,部署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接到中央局召开土地会议的通知。这时,区党委领导人已作了调整,张磐石调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冷楚担任宣传部长,赖若愚任组织部长,何英才任城工部长。我和赖若愚一起去邯郸参加中央局会议,留副书记王维纲在家主持区党委工作。

中央局的土地会议于6月10日开幕,邓小平主持,刚从延安回来的薄一波副书记传达了“五四指示”和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时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会上决定,在贯彻“五四指示”时,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以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方式,使贫苦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腹心地区,用3个月时间(7、8、9月)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在边沿区,集中力量斗争汉奸、恶霸,坚决打击“还乡团”,把汉奸、恶霸、“还乡团”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发展民兵和游击武装,一手拿枪,一手搞反奸清算斗争;既要坚决地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又要团结中农,同时注

意不侵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

这时，内战危险已经十分严重。邓小平、刘伯承要求各地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对付全面内战。要坚决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尽快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取得广大农民群众对自卫战争的支援。

会后，回到涉县，召开区党委会传达会议精神，讨论时局，准备战争和土地改革问题。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在积极准备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新的内战，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发动自卫战争。6月23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备战紧急指示。因此，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部署广泛深入的备战动员，组织全区军民参战支前。

7月中旬，区党委召开地县委会议，传达中央局邯郸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7月会议后，全区各县根据会议精神，抽调集训干部，组织翻身队下乡，土地改革在全区展开。到月底，全区有1700余名干部参加的翻身队深入农村，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办法贯彻“五四指示”。在老区，主要依靠各县干部自己开展查减，解决土地问题，只向薄弱村派少数工作队。在新区，以派工作队的方式为主。老区的查减运动以对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进行抽动的办法，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对那些一向对农民态度较好，特别是积极抗日的开明地主，允许保留多于每人平均数的土地；

对暗中高价出典或保留押地继续出租的地主,通过清算收回其土地;对于伪装进步,暗中捣鬼以至做了特务的,在查有实据后按规定没收土地。由于采取以上分别对待的办法,许多开明地主主动献田,带动了大部分地主献田,孤立了少数顽固地主。这时,地主中的大部分人已看到“耕者有其田”是大势所趋,因此阻力并不大。再加上老区农村中的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已不再占优势,因此运动开展较为顺利。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五四指示”前经过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在不少村庄已经开展向地主剥夺土地,但运动发展很不平衡。翻身工作队入村后,重点在深入发动群众,讲解“五四指示”。新区特别强调加强领导力量,注意团结中农,在农村形成农民的优势,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

在贯彻“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中,区党委发现有少数干部,特别是县区干部,乘机以权谋私,攫取群众斗争果实。有的干部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错误行为,而是认为革命成功理应享受。这种行为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及时制止这种行为,区党委于10月11日作出《关于群众翻身运动中县区以上干部对待斗争果实的决定》,严正指出:“此种恶劣现象,必须严加纠正,否则必致脱离群众,损坏干部,引起党内混乱,地主反攻,翻身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区党委公布了必须严格遵守的5条决定:

一、群众斗争果实,一概分配给群众,虚心领导群众,

由群众自己处理。贫苦本地干部，应与群众一样分配给果实。一切县区以上干部不得以任何口实或形式多分或加以扣留。

二、凡县区以上干部用贱价收买或“拥护”的形式(及其他形式)取得斗争果实者，一律退还群众(退还原村)，不得有任何保留。已经使用或浪费者，酌量加以赔偿。

三、凡不服从决定坚持错误者，按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四、本决定应在干部会上传达讨论，发动全体干部响应这个决定，表扬模范作风，批评与反对恶劣行为，号召每一干部珍视自己历史与党的荣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实际行动实现这个决定，并努力贯彻群众翻身运动。首先正确领导分配果实，教育村干部与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

五、各级党委应进行一次清查，按本决定精神一一处理，然后将区级清查材料报送地委。县级材料经地委(或市委)报送区党委。坦白检讨、公正处理之模范思想与事实也一并写入，不得刺伤任何知过即改之干部。但不得借口“照顾团结”，“照顾干部”不进行清查。这种借口实质上是损坏干部，应为大家所反对。

区党委决定下发后，各地委立即下去认真检查，凡是有决定所指出的问题的干部，都能主动退赔并做了检查。其中几个县委书记公开做了检查，纠正了运动开始时发生的这股歪风。

贯彻“五四指示”的土地改革运动经过 8、9 两个月，在老区和新区形成了高潮，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据统计，到 10 月初，全太行区已有 200 万农民翻了身，1400 多个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了解决运动中出现的問題，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解决土地問題，区党委在秋收之后的 11 月中旬，召开了地委书记、专员会议，研究部署 1946 年冬季和 1947 年春季的土地改革及支前問題。

这里，有必要把 1946 年后半年太行区的形势简单介绍一下。全面内战爆发后，太行区在战争开始阶段还没有大战事，因此，能够在 7、8、9 三个月集中干部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地改革。与此同时，从 7 月份起，掀起热烈的增产、献金、节约运动，全力支援前线，并在 9、10 两个月掀起参军热潮，3 万余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军队。在这期间，太行部队于 8 月份先后发起孟县战役、正太路战役和辉县战役。在边沿区，太行军民开展反“蚕食”斗争，扩大解放区，并把武装斗争和翻身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巩固了新解放的地区，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对敌斗争。10 月中旬，国民党以 3 个师向太行区的豫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了部分城镇，使豫北的形势趋向紧张。豫北军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积小胜为大胜，在 40 多天时间内歼敌 6000 余，支援了主力军的作战。在内战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太行军民一面保卫根据地，一面建设根据地，把太行建成支援爱国自卫战争的基地，为支援前线准备

物资。为此，一面加紧民兵训练，开展备战支前工作，一面深入开展翻身运动，解放农村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提出进一步增产粮食、棉花和日用品，达到自给自足和“耕三余一”的口号。太行区地委书记、专员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从11月14日开到11月26日。我在这次会上有两次发言，主要讲群众翻身运动。

第一次发言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主要讲关于如何发动贫雇农和团结中农的问题。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这一问题呢？因为1945年12月在军区、行署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讲了两条：发动农民反封建，发动贫农团结中农。这两条，在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运动中都有过教训。“五四指示”中，在强调放手发动广大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时，同时指出要注意发动贫雇农和团结中农。根据中央的政策和太行的实践，我重点讲了这两个问题，主要内容是提高对依靠贫雇农，以贫雇农作骨干和团结中农，壮大农民力量，彻底消灭封建，支持长期战争的认识。

第二次发言是在会议结束时的11月24、25日，讲的内容较多，总题目是《论土地改革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个长篇发言整理成文字下发时有2万多字。发言分五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讲一年来群众运动的几个主要经验。从抗战胜利以来，太行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

封建；以贫雇农为骨干，广大农民自求团结，自求解放；群众自己动手，摧毁封建奸霸；掌握政策，给各色人等以适当照顾。”

第二部分发言的题目是论深入阶段。重点讲土地改革运动深入阶段的策略问题，就是以什么策略在农村中从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反复给封建势力以坚决打击，达到彻底消灭封建与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深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一步)发动贫雇，培养贫雇骨干，团结中农，以发动全体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完成这一任务，方法是思想发动与群众路线，这是抗战中1944年深入减租减息运动时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成功方法。“整个的翻身运动，都可以说是农民团结与自觉运动，也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与提高的自觉运动，是领导农民随我党所指道路的运动。它是贯彻全运动过程而内容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的方法。这是几年来太行区群众运动特点之一，有极重要意义与生动丰富的经验。”思想发动的内容，我提出4个方面：一是通过回顾农民翻身的历史，启发阶级自觉(历史自觉)，提高到“自为”上来；二是通过时事教育，认识翻身运动与反蒋介石、阎锡山反动势力的关系，提高对地主恶霸斗争的自觉性；三是宣传教育农民只有搞好翻身运动，才能翻身发家、生产致富，才能“挖了穷根安置富根”；四是使农民进一步了解只有跟上共产党、毛主席走，才能翻身解放。这4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要结合当时当地群众的思想问题

去进行,不是机械地去一条一条地进行。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主要依靠农会,农会的支柱是民兵,领导农会与民兵的是村党支部。

在第三部分中,主要讲边地群众运动。在边沿地区,由于离敌人很近,因此重点是从对敌斗争上去发动群众,从土地改革上发动群众支持与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一地区,在政策上要照顾中小地主,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摧垮蒋阎势力所依靠的社会基础。

第四部分讲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城乡关系问题。在土地改革中,首先要联合城市工人及贫苦市民,共同摧毁封建势力的土地基础及城市巢穴,防止与纠正群众内部的磨擦。同时,要照顾城市店员家属,保护工商业。既要反对以城市观点去做农村工作,也要反对以农村观点去管理城市。

最后我讲了如何在土改中加强党内团结的问题。太行党是在抗战环境中,强调统一战线时代发展起来的,许多党员干部、军队干部来自地主、富农家庭,或其家属来自地主、富农家庭。因此,土地改革发动后,涉及到这些同志的家庭。土改中一方面教育干部按“五四指示”精神自觉地让自己家献田,不允许与农民对立和隐藏财产,破坏土改;另一方面从政策上对在抗战中有贡献的地主,对参加人民军队的军人家属中的地主给予照顾。

此次会议后,我于1947年春节过后的2月又在五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上再次讲了土地改革运动



深入巩固阶段的经验与目前任务。在讲话中,我把深入巩固阶段的经验与任务概括为:“面向落后,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地主,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后把广大群众的翻身胜利,从立法上(政府法令与群众立法要求相结合)、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其领导核心——支部的建立与建设上给以巩固。同时,给富农、地主兼工商业者,地主医生,知识分子(干部抗属)及各色地主等以坚决而适当地照顾,使他们安心生活并进行生产,从而在农民全体发动与满意的基础上,稳定新的阶级关系,大踏步转入组织起来的生产运动,并系统地建立支部,培养领导群众的党的核心。”

从我的思想认识上讲,在领导太行区贯彻“五四指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政策和策略,注意吸取了抗战中领导减租减息的经验教训,注意研究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使运动健康地发展。事后看,太行区这一段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也没有大的反复。到1947年5月,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全区有330万农民得到利益,共取得376万多亩土地,贫雇农每人约得2亩,中农每人约得3—5分。这时,太行区贫雇农每人平均有土地3.3亩,中农3.5亩,地主3亩,全区人均土地3.4亩。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民,在政治上也翻了身,农村干部绝大多数为贫雇农和中农。土地改革的成就,更加鼓舞了农民参军、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瓦解

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军队中的农民子弟纷纷投奔到人民军队中。这一时期的运动也有不平衡的问题存在,少数地区群众发动的不平衡,部分贫雇农没有彻底翻身,这在我离开太行后的土地改革中继续加以解决。一些地方发生了“左”的偏向,虽然没有1947年夏秋以后的严重,但也影响到这些地方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

土地改革正在太行轰轰烈烈地进行时,为了检阅抗战胜利以来太行人民在根据地建设中的胜利成果,总结经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有力地支援爱国自卫战争,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共同研究决定,召开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同时举办展览。

1946年12月2日,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在长治城内莲花池隆重开幕。出席群英会的有从全区农村、工厂、商店和民兵中选出来的英雄、模范、能手、代表等共430人,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专程赶来出席大会,太行区党政军领导主持大会,冀南、太岳参观团和边区参议会驻会委员等也应邀参加大会。在开幕式上,到达会场的代表、领导、来宾及祝贺的各界代表、人民群众多达3万余人。大会一直开到21日,同时举办了内容丰富的太行展览,以绘画、图表、泥塑、实物、模型等多种形式,把杀敌、生产、翻身三大运动和当前形势的特点表现出来,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大会选出边区英雄模范110名,在会上介绍交流了经验。大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全区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开展杀敌练武运动;继续努力贯彻执

行“五四指示”，在全区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继续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群英大会主要由赖若愚(代表区党委)、李一清(代表行署)、王维纲(代表军区)和杨殿魁(代表武委会)领导召开。我于12月3日到会讲了话。我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前线人民爱国自卫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人民的参战备战也在紧张进行中。前线在打仗,后方做着两件事:一是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大生产。第一件是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彻底翻身;第二件事是要组织起来生产致富。身翻了,有了家当,还得好好保卫,支援前线。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人民战争。我们要像自己做饭自己吃一样,供给军队,支援前线,打胜仗。我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后太行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向英雄模范提出了要求,要他们在参军、参战、支前中,在翻身运动中,在大生产中起带头作用,积极准备明年的反攻,以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

大会后期,赖若愚作了总结讲话,总结了抗战胜利后全区的翻身运动、参战参军杀敌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会后的任务和要求。在大会闭幕式上,一致通过了《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指出“英雄要永远与群众结合,我们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时时刻刻为群众翻身、生产、保卫胜利想办法。只要我全区五百万同胞一致努力,再加上毛主席和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我们一定会胜利”。

第二届群英大会是太行区历史上最后一次群英会。第一次群英会后 8 个多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第二次群英会后 6 个月，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把战争从内线引向外线，太行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之一。

## 二十三、结束在太行的工作， 随同刘邓大军南下

1947年春，内线战场上的爱国自卫战争已经开始向更加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兵折将，已经无力再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越战越强，在半年多的内线作战中歼敌70余万，解放区不仅得到巩固，而且进一步扩大，不少解放区联成大规模的解放区，为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国民党被迫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将重点置于解放区的山东和陕北，妄图压迫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移出陕北，然后调集兵力进攻华北，以达到各个击破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目的。

中共中央在分析了战争形势后，于2月1日发出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

其胜利而斗争。”中央军委根据解放区各个内线战场上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豫北、晋南和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部队,依据各区的具体情况,举行战略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逐步恢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确定除继续完成土改和组织大生产运动外,本区作战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全区军民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的口号下,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展开战略性的反攻,并积极完成战略进攻的准备工作。在太行区,准备以野战军主力和太行、冀南军区主力及冀鲁豫军区一部举行豫北战役,发起反攻。

豫北地区原为国民党军妄图打通平汉线的前进阵地,敌人重点进攻开始后,更成为其联系陕北、华东战场的枢纽地带,国民党在这里集中了大批部队,有近10万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集中兵力,在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起豫北反攻。集中的主力有60个团10余万人,动员的民兵有10万人,另有20万群众参加支前。太行区专门成立了后勤指挥部,制定了民兵自卫队和各级参战干部的立功标准,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立功竞赛运动。在3月23日至5月25日的豫北反攻中,歼敌4万余,解放了9个县和南北长150余公里、东西宽100余公里的地区,控制了平汉铁路150余公里,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太行在反攻中有6万余新战士和大量民兵、担架队、运输

队、宣传队等到前线参战支前。反攻中还组织了“太行豫北前线慰问团”，携带 60 大车慰问品和慰问信到前线慰问，向刘伯承司令员献花，极大地鼓舞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

在准备战略反攻的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培养干部，于 3 月对太行区的行政区划作了新的调整，这是我离开太行前最后一次调整专区区划和任命专区党政军干部：

一专区：辖内邱、临城、赞皇、元氏、井陘、获鹿、高邑、沙河、邢台等 9 个县和邢台市。专员武旋声，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武成，军分区政委胡震。

二专区：辖榆次、寿阳、太谷、榆太祁、左权、武乡、平定、昔阳、榆社、祁县、和顺、襄垣等 12 个县。专员樊雨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于一川，军分区司令员空缺，副司令员韩卫民、邹善芳。

三专区：辖黎城、潞城、壶关、长治、平顺等 5 个县和长治市。专员孙竹庭，地委书记王谦。第三军分区未设立工作机构，未配备领导人，由武委会代行军分区职权。

四专区：辖博爱、修武、武陟、温县、沁阳、陵川、修获武等 7 个县和焦作市。专员杜毓沅，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维翰，军分区司令员何正文。

五专区：辖涉县、林县、辉县、汲淇、汤阴、武安、安阳、磁县等 8 个县。专员李毅之，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陶鲁笏，军分区司令员陶国清。

在豫北反攻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另一部分主力部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民兵和人民群众支援下发起晋南反攻，歼敌 1.4 万人，解放了 22 座县城和晋南 300 万人口的地区，控制了南同蒲线 230 余公里。

豫北、晋南反攻的胜利，使晋冀鲁豫解放区太行、太岳内线的敌人主力大部分被歼灭。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 5 月 4 日决定刘邓十万大军开始休整，准备渡河南下经冀鲁豫出中原，把战争从内线引向外线，建立中原根据地。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这一战略的实现，将为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夺取全国胜利奠定基础。

为了挺进中原，建立中原根据地，中共中央于 5 月 16 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二、三副书记。李先念任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这样，地方工作由郑位三和我负责。

接到中央的通知，邓小平让我立即准备随军南下中原，并挑选到中原工作的干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从太行区调出百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到中原地区开辟新区，调集 8 万民工随刘邓大军南下支前。同时决定我走后，由赖若愚任区党委书记，冷楚任副书记，陶鲁笳任组织部长，赵时真任宣传部长。当时通知我在 6 月初南下，时间十分紧迫。



这时,我手头正有两件紧事:一是在3月29日区党委发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与转向大生产运动问题的通知》后,领导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包括检查与调剂土地、稳定中农、安置地主、处理打死(或自杀)地主、干群关系、少数民族的土地问题等。这项工作工作量比较大,我交给赖若愚负责。我走前,区党委在6月15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局写了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的报告。这个报告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情况和经验。报告在指出成绩的同时,分析了部分贫雇农没有彻底翻身的原因,指出一些地方发生的不给地主生活出路、侵犯中农利益以及乱打人杀人的“左”的偏向。报告还介绍了广大翻身农民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积极参军参战和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情况。在为准备刘邓大军南下的参军热潮中,太行区在几天之内参军人数达35222人,老区参加互助组的人数达到48.4%,不少农村已达“耕三余一”。这是我在太行时关于土地改革的最后一个报告,我的意见都反映在报告中。

另一件事是为落实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在解放区公开党组织的指示做准备工作。太行区的共产党组织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敌人包围的根据地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在尖锐复杂的环境下,党不得不采取秘密的形式。在贯彻1942年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指示中,老区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开始公开,群众也知道有些主要干部

的党员身份。抗战胜利后，党员在村中大部分公开，但全部党员的面目群众并不了解。为了准备公开党组织，早在4月份区党委已作了部署，采取逐步公开的办法。先公开区委以上领导机关，县委书记的政委称号一律取消，并在先进村试点，听取群众反映。7月1日发出《中共太行区党委为全区党的公开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通知》，宣布“我们中共太行区的党，在今天党的二十六周年纪念日——七一——和太行全区人民公开见面了”，“从今以后，我们党在全区六百万人民的眼睛前公开了，我们每个组织、每个党员的一言一行，都将直接受人民监督和批评”。通知宣布太行党员都要做到“对人民无限忠心，走群众路线”，“英勇斗争，不说空话”，“虚心坦白，勇于自我批评”。这是我在太行工作10年中最后向全区发出的一份文件。

在这同时，我将准备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集中编组训练。这次随军到中原的干部分组成4个地委、20个县委的班子，准备到中原后解放一个地区，马上派去全套班子开展工作。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奉命将太行军区独立1、2旅和太行1、4、5军分区基干团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随刘邓大军南下。太行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鲁瑞林任司令员，赖若愚任政治委员。

6月30日夜，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国民党统治区发起进攻，揭开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的序幕。

我正准备随刘邓大军南下时，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

要我于7月中旬到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全国土地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各解放区有107人参加，内容主要是讨论整党和土改两大问题。我记得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薄一波、胡锡奎、张稼夫、王从吾、张晔、李林、赵德尊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开的时间比较长，前后近两个月。会议从7月17日开始到8月底是第一阶段，各解放区代表汇报各地土改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存在的问题，重点讨论党的组织、农民组织、农民民主问题，研究怎样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改造党政军民(兵)组织与干部。第二阶段从8月底开始到9月13日结束，集中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最后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中间，会议主席团同晋冀鲁豫代表团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话。

我到西柏坡后，因已决定南下，因此在开会期间，向朱德、刘少奇去告别，并请示对南下工作的指示。他们提出：“群众工作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工作，其他一切都是临时的。6个月内不能大体完成土改将可能遭受大困难，须用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发动群众，时间为大问题。”刘少奇特别嘱咐我，到新区后要马上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要快。谈话后，我立即于8月24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刘子久发去一封电报，传达了朱德、刘少奇的指示。在电报中，我根据朱德、刘少奇的指示精神，结合会议讨论的土改政策，提出：“在军队打开局面控制一块地区时，即撒开干部

发动群众，普遍的又有重点，配合军队与行政力量，充分发挥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一切做土改工作的干部，以农会名义出现，依靠贫农组织贫农小组，召开贫农（包括雇工与手工工人）会议及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贫农小组，建立农会。贫农优秀分子要起支部作用，暂不发展党员，使贫农成为土改运动的农村指挥官。上级党政要在农会、农代会中工作，起参谋部作用。农会必须掌握在忠实能干分子之手。强调群众路线、群众民主，反对强迫命令、贪污自私。要反复申明纪律，坚决处分坏分子，反对自由主义、要求照顾、闹情绪和不诚实工作的坏分子。军队参加土改，制定几条工作办法与纪律，抽一批人去参加做民运队，每到一地即寻找真正贫农了解情况及进行宣传。在战场与转移频繁地区，不发布告标语，不嚷传土改，以免打草惊蛇。发现贫农积极分子，组成分散的小组或者组织介绍去工作团。”

土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太行，参加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武安县冶陶村召开的全区县以上干部大会开幕式后，即全力准备南下的工作。这时，太行区抽调的南下干部已增加到 1600 多名，分成地、县党政班子，进行南下前的训练，进行最后的准备。

1947 年 11 月中旬，我率领的地方干部队离开太行，渡黄河进入中原地区，这时正好是我在 1937 年 10 月进入太行区的 10 周年。想想 10 年前和李菁玉率平汉线省委从石家庄撤出进入太行山中创建太行根据地时仅有几

个人的情景,看看今日千军万马渡河南征,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历史使命,心中非常激动。太行人民哺育我们,我们随太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而逐步走向成熟。在太行的10年里,我从一个幼稚的党的干部成长锻炼成党的高级干部,奠定了我一生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基础。在太行10年中我最难忘的体会是:

任何时候,都要下苦功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钻细研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领会精神实质,使自己在大的政治问题上,在重要的战略转变中,在执行政策策略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自觉性,避免盲目性。

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在取得成就胜利的情况下都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吸取力量,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任何时候,都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建设党,使党组织保持先进性,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只要各地的党组织本身能够根据当地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党委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素质,战胜困难,搞好工作。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自己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特别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党组织的领导,都要时刻想到自己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自觉遵守党规党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

入调查研究,勇于改正错误,求得不断进步。

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党内团结,搞好党政军之间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团结出智慧,团结出经验,团结出效益。

太行时期,是我经历中党政军团结最好的时期,是工作最顺心、心情最愉快的时期。我永远感谢太行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永远怀念太行10年中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日日夜夜。

## 后 记

这本回忆录(上)记述的内容,主要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0月,我从河北到太行山,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辟创建根据地,至1947年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出发,在大量歼灭敌人后,挺进中原,揭开人民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我于11月间离开太行区跟随大军南下的经历。整整10年间,我一直在太行根据地工作,因此把书名副标题定为《太行十年》。为了说明我参加革命工作的过程,我在回忆录的开头部分简要回顾了我的青少年时期,重点讲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太行10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时期。10年中,我从一个比较幼稚的党的干部,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在开辟、创建、巩固、发展和建设太行根据地的工作中,锻炼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做了应该做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每当我和在太行工作过的老同志回顾当年在太行根据地的战斗、工作、生活时,都激动不已。许多熟悉的同志建议我把太行10年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但是我保存的太行根据地的材料在“文革”中已丢失,只靠头脑中的记忆,很难准确地把我在太行工作的往

事记录下来。

1980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李志敏同志带田酉如同志来看我,告诉我:省委已把研究编写太行根据地历史列为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由田酉如同志负责。田酉如同志带着一份采访提纲,很详细,要求我系统地介绍太行根据地的历史。他已查阅了许多档案资料。这样,他问我讲,一连七天,前一天准备第二天讲的内容,第二天上午讲。当时我手头没有录音机,他全靠手记。采访完后,田酉如同志把整理的记录送我。这次采访的记录,为写这本回忆录准备了基本材料。

1986年,在张磐石同志指导下,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共同组成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写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送我阅看。我对其中第三章写太行整风一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写了一篇《关于太行区党委党校的整风》,供总编委会参考。这是我执笔写的第一篇回忆太行根据地历史的文章。

1992年夏,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向我约稿,要我写一篇关于太行根据地党的工作的回忆文章。由田酉如同志根据我的回忆,并查阅有关资料,整理出两篇回忆录:《回顾中共太行区党委领导的整风运动》、《关于太行区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回忆》,送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希望我写一本系统回忆我在太行区工作的书,并得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同志的支持。

1994年夏,我和田酉如同志拟出了编写提纲,由他



帮我整理回忆录。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又查阅了大批档案资料，于1996年12月写出第一稿，先后送请在北京的陶鲁笳、高扬、王谦、池必卿、翟英、张磐石、李琦、李友九、谷景生、杨珏、张铁夫、黄道霞和在山西的霍泛、李修仁、赵雨亭等太行老同志帮助订正核实材料，征求意见。

这本回忆录由田酉如同志根据我的多次口述，并参考太行根据地档案执笔整理，特别请长期在中共太行区党委工作过的陶鲁笳、霍泛和李庄同志详细订正修改。李丹林和赵春伟同志为编辑出版此书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大家的意见，于1997年6月修改出第二稿。最后由我定稿，并请原太行区党委最后一任书记陶鲁笳同志写了文章作为代序。这本回忆录的编写工作，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和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支持，还有许多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特别是得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李 雪 峰

1997年12月

封面  
目录  
正文